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12年

上下互动 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田纪云：1988年访美印象

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追忆朱厚泽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目 录

群言堂

- 1 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本刊座谈会摘要 杜明明 整理

春秋笔

- 8 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何 方
16 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崔 敏

沉思录

- 23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尹保云

访谈录

- 29 吴忠谈抓“四人帮”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怀人篇

- 32 追忆朱厚泽 杨继绳
39 “文革”殉难者邓拓 袁 鹰
42 怀念诗人方然 彭小莲

求实篇

- 48 寻找张国焘墓地 桑宜川
52 “破四旧”的表与里 米鹤都

往事录

- 57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晏乐斌
60 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中的悲剧 杨崇诚
65 听胡耀邦谈诗和民主 张万舒
67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 熊先觉
68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黄家南

亲历记

- 71 1988年访美印象 田纪云
74 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 武健华

一家言

- 81 苏联灭亡的六个原因 高 放

忏悔录

- 84 违心的报应 何琼玮

古今谈

- 86 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 侯宜杰

海外事

- 90 美国的党争 董郁玉

编读窗

- 93 读者来信摘登 魏永征 平乃彬 赵平江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 俊	义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 岂	之 清	张 希	张 荣
张 光	杜 导	正 (召)	李 一	李 大
李 冰	李 宝	光 民	杨 天	杨 奎
杨 继	绳 (副)	召 志	华 碧	陈 敏
邵 燕	祥 瑞	金 冲	及 德	胡 德
保 育	钧 沛	钟 道	晖 中	资 筠
展 江	徐 小	岩 秦	晖 鹰	袁 伟
高 放	高 尚	全 陶	斯 亮	钱 理
萧 蔚	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
鲁 淳	雷 颀	魏 久	明	

社 委 会 杜 导 正 (主 任) 吴 思 (副 主 任) 杨 继 绳
李 晨 徐 庆 全 胡 竞 成 张 晓 鸥

社 长 杜 导 正
法 定 代 表 人 常 务 社 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 继 绳 李 晨
社 长 助 理 胡 竞 成 张 晓 鸥 杜 明 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 总 编 辑 徐 庆 全
执 行 主 编 洪 振 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 总 经 理 兼 网 络 总 监 张 晓 鸥
财 务 总 监 胡 竞 成
发 行 部 孔 屏 (主 任)
办 公 室 王 海 印 (主 任)

理 事 长 杜 导 正
副 理 事 长 莊 其 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 秘 书 长 杜 明 明

主 管 主 办 单 位 中 华 炎 黄 文 化 研 究 会
本 刊 常 年 法 律 顾 问

张 思 之 (吴 栾 赵 阔 律 师 事 务 所 010-68083211)
步 凌 云 (北 京 市 华 一 律 师 事 务 所 010-85869163)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均 可 订 阅
国 内 总 发 行 北 京 报 刊 发 行 局
国 际 标 准 连 续 出 版 刊 号 ISSN1003-1170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11-2817/K
国 内 邮 发 代 号 82-507

社 址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月 坛 南 街 69 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 辑 部 邮 箱 yanhcq@sina.com

发 行 部 邮 箱 yanhcq@gmail.com
电 话 发 行 部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 行 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 辑 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 务 部 010-68525374
办 公 室 010-68522852 (兼 传 真)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京 西 工 商 广 字 0296 号
印 刷 唐 山 市 润 丰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单 本 定 价 8 元 全 年 定 价 96 元

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本刊座谈会摘要

○ 杜明明 整理

编者按:4月5日,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下边是发言摘要。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有所呼应,上下结合,把滞后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地加速推动。

李锐: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



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何方: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

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高度合一。在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党政必须分开,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现在不仅没有做到,比1989年还倒退了,很明显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学校原来已经改成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又改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不是倒退吗?最近我们学校任命一个副校长,首先是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来任命,因为副校长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为党委委员就要党组来批准,而且把党组还摆在了教育部的头。

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没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第二,严重妨碍了法治。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真的法治,我们是党治,以党治国。在党治的情况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险。所以现在法院、检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关心谁当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书记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第四,责任不清。本来是应该谁有多大的权力,谁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权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权力的人反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有的群众问：我现在到法院去告市委，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因为我们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你告党委肯定不行。实际上就是党权过大。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党政不分的问题。

十八大的动向关系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盼望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作为我们十八大的一个方针，而且要落实到实际中，作为方针提出来。

顾骥：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普世价值观，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宪政民主。李锐老写过“何时宪政大开张”，写了多少年了。我比较悲观，像我这个年龄是很难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因为谈改革谁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全面的改革路线，就是既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为本这种“人的现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以后实际上政改已经停止了，倒退了。

一开始这个改革路线是以胡耀邦作为旗帜，牵头的。胡耀邦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确实错了，当时有可能会按照过去那种习惯思维谈“旗帜”，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也确实出了一条“凡是”的路线，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遵从毛泽东的。

1980年邓小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限制一党专政，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如果按照邓小平指的那个方向走的话，这30年我们会前进很多了。1984年12月20号开文联第四次代表会，耀邦在筹备会上讲话，当时文联、作家协会在组织新领导班子，有人给了一个名单，我们协会不知道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就问耀邦“这个名单到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他说，你们是一个群众团体，你们自己选谁就选谁。他甚至讲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应该这样，干部自己选。耀邦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迂回地从群众团体这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民主选举。耀邦下台马上就有人批这个

代表大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选上来。

陆德：对于薄熙来的事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反应，有些基层支持薄熙来。为什么，他们说改革开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败，但没有一个地区真正搞过，这个说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如果不厉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后的局势将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和抉择。所以，我不太同意“文革重演”的预测，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从上到下，由中央牵头搞全面阶级斗争，最后是国家乱套；而如果是党风腐败，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则是社会震荡，很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乱套。所以，如果我们仍不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种前景都要预测到。当前，我国的“维稳”费用已超过了国防开支，不得了啊！

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2017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2017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将要逼近0.6，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2017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华：首先，我同意大家说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我们这个党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想扭转这个惯性非常困难。第三，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这方面很不够。要是查过去的文件，没有文件赞成联产承包，后来通过实践，看到结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来。这也说明，大凡改革，都是从下往上推动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

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们讲:我希望最终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冯健:我重读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已经政治局通过。31年过去了,讲话中提出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个人崇

拜现象等问题,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还有诸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建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等等,进展还不尽如人意,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希望上上下下都来求索,发挥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张宏遵:其实政改我们不需要提什么新口号,把中央承诺过的,把有关文件拿出来,落实了就很好。现在是述而不作,说了不做,说得很好听,不去做。我们总得考虑操作者方面的可行性,在话语范围内操作,不用冒风险就可以做的事。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吴思: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应该搞?如何搞?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恐怕永远有不同意见。在今年这样的换届之年,从政策到人事,不同意见肯定很多,很重大。面对重大分歧,如何决策?

过去,毛泽东一言九鼎。邓小平不能一言九鼎,五鼎六鼎大概还是有的。现在,面对重大分歧,如果无法拖延不决,如果无人追求一言三鼎

四鼎的特权,恐怕只能票决了。一言一鼎的票决。票决制代替一言堂和家长制,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逼上门来,不是想不想搞的问题。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票决?每张票的分量是否相等?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在我看来,目前的很多纷争,都是在这套规则交替的背景上发生的。

我希望十八大开成一个发扬党内民主的大会,按照党章规定,把重大问题提交代表大会票决,每张票的分量相等。有分歧很正常,如果像列宁曾经搞过的那样,在党代会上有主报告,还有不同主张的分报告,让不同主张在党内竞争,由代表大会裁决,那么,中国就迈出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第一步。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功绩。



二、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杜导正:我觉得要看重的是重庆事件的本质,我看这不仅仅是个违法乱纪的案件,恐怕还涉及我国要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薄的唱红打黑,有一些正确的部分,但是他的实质、他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东西,是毛泽东晚年专制,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便侵犯和剥夺人权的路子。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道路的问题。

重庆模式如果推广到全国,搞下去中国就进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下继续革命,整个的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否定了。

袁鹰:温家宝总理讲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分量是很重的。“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35年了,尽管有不少的文章,不少的有识之士经常讲到“文革”,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不仅是年轻人,还有高层人士,对“文革”已经淡漠了,甚至有的人念念不忘地怀念“文革”。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从巴金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说起。这个话到现在已经30年了,也有不少人响应,包括一些老同志建议建文革博物馆。巴金讲的是在全国都建立,到现在并未实现。有一个两个是民间建立的,内容不完全一样,是搜

集纪念章、语录本之类的。有一个老同志曾经建议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建议正确,但是十年以内不会实现。

这个时候再来提巴金提的文革博物馆,很有必要。有人花上亿的公款吃喝旅游,有些区级的行政大楼,可以媲美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能建文革博物馆?像清华附中最早产生红卫兵的地方,那些女孩子把校长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至少要立一块碑。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残害。我的老伴被单位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她不同意《中国少年报》登毛泽东的文章就被批斗,到老落得一身的毛病。“文革”当中我们两人在单位中挨批斗,我的女儿在家里发高烧,回到家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我女儿从此两条腿不能走路,现在已是人到中年,还是这样。我还不算家破人亡的,但一谈到“文革”化我就很痛恨。一次叶帅讲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尽管从道理上来讲,不会再出现毛泽东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就这样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会有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写文章。我小时候在杭州读师范附属小学,学校为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立着一块碑,我们每天进去就看到碑上的“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现在,如果文革博物馆建不成,建一块“勿忘文革”的碑,总可以吧!

郭道晖:关于“文革”悲剧重演,我认为已经没有“文革”全面出现的历史条件了。但是“文革”的某些元素可能出现,而且正在复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否定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而并没有否定“文革”的思维方式。

“文革”的基本要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以人为敌。第二,个人专制,对个人绝对的迷信。重庆唱红,这就是“文革”的早请示、晚汇报。第三,无法无天,踢开宪法、法律闹革命。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取消了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员会,但是1989年以后又恢复了。

张宏遵:最近我正在整理胡启立同志1982年去看望叶帅时,叶帅的讲话,讲得非常精彩。主要讲党内民主问题,怎么样不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再搞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在干部路线上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讲话”具有很鲜明的特征。据叶帅的家人讲,这是叶帅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就政治问题的讲话,今年正好是30年,对现在的形势有很强的针对性。

杨继绳:刚才几位谈了“文革”的几个要素,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文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两句话是“文革”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也是“文革”期间(特别是头两年)群众运动的指向。在一个官僚特权社会,这两句话很有号召力。当然,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只知道“腐败分子”就在党内。今天和1966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着、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毛泽东逝世36年了,可能这两句话今天还有号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响应的人一定不会少。这才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险。怎样防止这个危险呢?关键是要解决党内特权、党内腐败问题。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了

灾难。不用这个方式解决,就得政治改革,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因为腐败和特权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制衡。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的理解是,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一定不是大权力领导下的小权力,而是与大权力

相对等的权力。

权力制衡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个领导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胆识,而是看当时的社会合力。党的领导人是在社会合力的作用下行动。不仅仅是他应该做什么,还要看他能够做什么。

现在有多种思潮都想影响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够影响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种:一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即新民主主义),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中国模式”;三是搞宪政民主。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了。现在只剩下另外两种力量在博弈。我觉得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宪政民主。我们要多发出宪政民主的呼声,尽可能把社会合力指向宪政民主。

三、落实宪法,扩大言论自由

杜导正:当前,国内各种矛盾比较复杂,以此为背景,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重庆事件。在这个大环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跃,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都在强调政改紧迫性的问题,而上周有的媒体却发表评论,提出所谓稳中求进,其实就是维稳、维稳高于一切,把其他的声音叫做噪音、杂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在不同意见积极促进政改的人当中,有的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是故意的,也有些人虽然知道要改但又担心有风险。不赞成政改的言论,实际上是想击鼓传花,把难题传给下一任,这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当前的局面建议四条:第一,要彻底清除封建遗毒;第二,要彻底清算“文革”;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党政分开着手,先改变党权过

于集中的状况；第四，要给媒体松绑，让大家说话。总之，必须稳中求进，一味求稳是稳不住的，是要翻船的，只有着眼于进，而又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改革才有可能稳住大局。我们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了。

郭道晖：今年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以此为契机，可以讨论怎样宣传宪政精神，怎样落实宪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要落实宪法第35条有关于公民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要推动落实就要有具体法律，但现在没有。其实上世纪80年代我在全国人大的时候，找我们去讨论过。但是后来上边说《新闻法》《出版法》绝对不能搞，一立法，公民就可以依法申请办杂志、办出版社，就不好管了。我希望新闻出版立法早日实现，这是可以做的。不能永远用所谓法规、规章、红头文件来限制公民自由。在纪念宪法30周年的时候推动此事，很有必要。

何方：我建议在言论方面更放开一些。要讲民主，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放开言论自由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直接。为什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么强劲，而我们这里到现在还实现不了言论自由？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民主化是潮流，《炎黄春秋》应该有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要强调言论自由。这个是民主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要求。

孙旭培：《共产党宣言》诞生的160多年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变革进步，要尊重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过去我们总是希望干一些与前人创造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彻底决裂”的前无古人的事情，结果是把几亿人民投入完全没有把握的社会试验中。资产阶级创造的思想文明、制度文明不能一概抹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我国宪法上也有。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能决裂吗？决裂了共产党也没有了。

现在有人否认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东西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宪法实际上承认了普世价值。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泽东把言论平等置换成少数人专享的权力。他说，我国只准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准有资产

阶级的自由；把资产阶级置换成用思想标准划分；确立言论上也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经过这三个层面的置换以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言论出版自由。搞“文革”，刘少奇也没有言论自由。于是，你讲言论自由就被质问，你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很少有勇气诉求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公共报纸为主体，简单说就是把党委机关报以外的报纸逐步变成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国有民办的报纸。

钱理群：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第一是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二要求宪法的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诉求和民间的力量，是把他们看作是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理性引导还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阻力作为打击的方向，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动力，如果把这种动力再打压，另外一种动力就很可怕，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子，我主张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历史的旧案，可以马上给反右彻底平反，给反右彻底平反阻力不大。第二个就是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言论封锁实际上已经突破了，问题是敢不敢承认。第三个，网络时代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思想要跟上现代的传播技术。

张宏遵：现在中国的事情处在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思想都在一体化，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用。台湾、香港也是炎黄一分子，台湾选举这个现象不可小看，可以请专门研究台湾的人对台湾的选举做些分析。越南也可以借鉴。香港选举也可以借鉴。越南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可找专家写一点文章。■

（责任编辑 黄 钟）

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

○ 何 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存在着两条外交路线。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陈毅在接着召开的外事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更明确指出:外交政策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和做法,一条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做法。

陈毅对建国以来两条外交路线的划分,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只是颠倒了两者正确和错误的定性,也被后来党中央的决议所推翻。中共中央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指明,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等于从反面说明,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主张和意见是正确的。而对张闻天来说,自然包括以他为代表、受到批判的外交路线。

两条外交路线的基本区别在于:毛泽东认为,世界仍然处在列宁所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战争不可避免,革命必然到来;只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这种形势估计,他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全面准备迎接战争,即所谓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张闻天则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按他的话说,不但应当争取持久和平,还应争取永久和平),而且也并不存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对外坚持革命不能输出,把和平共处定为外交的总方针。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张闻天交代我给他起草一篇《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可是没让他讲(此文后来收入《张闻天文集》四)。简单说来,两条外交路线可以分别称为世界革命路线与和平共处路线。

建国初期,对中国外交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周恩来、陈毅和王稼祥。周恩来在思想上倾向张闻天,但在实践上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在那时的领导体制下,连张闻天也得在行动上遵循毛泽东路线)。陈毅则是毛泽东外交路线的忠实履行者。陈毅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他的基本观点:“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陈毅1965年9月12日举行的那次震惊中外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全盘照搬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所以陈毅的这些言论得到了毛泽东的全面肯定。他在1972年1月10日的陈毅追悼会上说,“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主张比较接近。例如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对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不赞成还要大反帝、修、反和大力支援世界革命,所以更遭到上面的严厉批判。1962年9月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他“三和一少”,说他主张对帝、修、反要缓和、对世界革命的援助要减少。陈毅这一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批示“很好”。

下面我们再对两条路线的内涵作一简单的归纳。

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是:首先应当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即大力发展经济;对外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搞好关系;推动国际形势缓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搞革命输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长处;同西方国家建交,不完全对苏联“一边倒”。这条路线的最大特点是对

当时民族主义国家的外交定位,就是把它们看作中国的直接同盟军,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反动势力和输出革命的主要对象。

世界革命外交路线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外交的任务和目标;主张输出革命,一有机会就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近邻的小国和弱国的内政;愿意看到国际形势紧张,不愿意看到缓和,有时甚至还制造点紧张;实行闭关自守,提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路线要打倒帝、修、反。其中的反,就是把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以印度的尼赫鲁为代表,都列为反动派。执行这条路线只能导致我们、事实上也确曾造成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孤立。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家长制,建国后头30年实际上执行的只能是毛泽东的路线,最后也只能以完全失败告终。

问题在于,毛泽东是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而列宁对国际主义有两条明确规定:一是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所以苏联就一直在输出革命,常年在帮助别国的革命和革命党的活动上花大钱。毛泽东也按这一条办。他还想参与世界革命的领导,也为别国的革命出钱出力。中国很早就参加了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基金会。苏联在里面摊钱最多,其次就是中国。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就靠这些钱开展活动。

毛泽东早就有领导殖民地和亚洲国家革命的想法。还在1936年7月,他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已经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革命得到全力发展,那么,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追随中国的榜样。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提出,他的这个理论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948年7月,毛泽东向联(共)中央派驻中国代表科瓦廖夫谈到同东方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建立关系的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米高扬提出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即东方情报局的问题。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苏联和斯大林多次谈话。在他7月4日递交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斯大林的回应

是,他支持这片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中国领导的想法。斯大林7月30日对刘少奇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帮助民族民主运动。他们这几次谈话,就在中苏两党之间确定了分工:苏联更多地关照欧洲即整个西方,亚洲、东方的事归中国负责。实际上就是苏联管发达国家,中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斯大林还说,“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这种分工。

中国要当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导并且发挥作用,很快就在1949年11月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南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会议上表现了出来。刘少奇坚持亚洲的工人和妇女组织应该开展反帝武装斗争。这个主张同与会的苏联代表产生了分歧。刘少奇会后向苏联驻华代办抱怨说,会议上的亲苏派对亚洲的特点了解不够。而科瓦廖夫则向斯大林报告,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清楚的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

其实,这时中国党在总的方面还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前面提到的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的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问题时就正式表示:“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国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所以当斯大林健在,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还不可能产生取代斯大林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有相当一阵子,毛泽东已经满足于“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的地位。就这样,中国要管的已经是一大片。而且就是在亚洲推进世界革命,毛泽东也是继续尊重苏联的统帅部地位的。朝鲜战争就是在苏联、中国、朝鲜都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打起来的。当然,首先是金日成想尽早统一朝鲜,当整个朝鲜的领袖。只不过他首先要看斯大林的态度:是否同意他出兵南朝鲜。而斯大林则要考虑中国在

这里面起什么作用。这里先不谈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战略策略考虑,毛泽东的想法却是很明确的:中国革命胜利不能到此为止,要把胜利成果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只不过一时还只能限于亚洲,首先是朝鲜和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太远,还够不着。

同为国际主义者的金日成和胡志明

也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下一步理应由苏联和中国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但金日成既看不起中国,也对中国有疑虑,所以一开始只想依靠苏联把南朝鲜拿下来,并不愿中国出兵相助。他在关键时刻不能不找中国帮助,也是在斯大林叫他这样办之后。毛泽东倒是早已准备挑起领导亚洲革命的担子。不光对朝鲜,对在越南推进革命,都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毛泽东带头在亚洲推行世界革命,多少有点儿一头热,起码比要帮助的对象热。帮助朝鲜是这么个情况。后来帮助越南,又是。胡志明也是不愿中国作战部队开进越南的。在抗法和抗美援朝中,尽管中国一再提出可以派军队去,公开声称愿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但越南没有答应,只接受大量物资供应和要求我们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部队。带有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越南也只要求我们派军事顾问,而没有要我们派出作战部队。罗贵波、陈赓就是那个时候作为顾问先后到越南去的。

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是要一路打下去。先帮助朝鲜后帮助越南,同时鼓励其他东南亚国家按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办事,搞武装斗争。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就是要贯穿一切,既管国内又管国外,而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续。毛泽东推行革命路线,对内对外相互配合,高度一致。他屡屡利用或者夸大外部形势的严峻和外



张闻天1958年出席布拉格使节会议时留影

部敌对势力的敌意或恶意,为他在党内国内加紧进行政治斗争打掩护、找借口。毛泽东1950年10月8日下了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心。两天后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在毛泽东主持下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刘少奇后来直接点明:抗美援朝有利于推进镇反。他在1951年5月23日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听不大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也正是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1951年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当然也难免出现不少冤假错案。

打朝鲜战争不光掩护了在“土改”、“镇反”、“三反”中的一些过火行为,还乘我们掀起的反美机会,大力进行了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

即如对民主党派来说,这也是让他们转变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对他们多少抑制一下的大好机会。志愿军大规模开进朝鲜后两天,周恩来就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并告诫他们:“一些人中存在亲美、崇

美、恐美的错误思想。”

抗美援朝期间,受过美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成批地被压了下去。在全国一片声讨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国观念的声浪下,1951和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专门发表文章,说自抗美援朝以来,大学教师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虽已“极大削弱”,但他们“仍浓厚地保存着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是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路线的延伸。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同样也是对内的和平建设路线相匹配的,只是其中没有借外部紧张加剧和制造内部紧张的谋略。

两条路线的区别在内政和外交的关系上表现得甚为明显。外交是为内政服务、为国家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还是内政服从世界革命的大目标,为此不惜做出民族牺牲。

既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或继续,那就很容易在对内政策上找出两条外交路线的根源。

第一,在国内是主要抓经济建设还是主要抓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毛泽东谈得不算多,劲头不大。他讲和做得最多的还是抓阶级斗争,搞各种政治运动,一直对发展军事、准备打仗的事情兴趣大。至于为争取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所搞的“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那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对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第二,关于如何搞经济建设,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先导还是以重工业为先导。毛泽东虽然在1956年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中排列了农轻重的顺序,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被他发动的“大跃进”和提出的“以钢为纲”给冲掉了。他在1960年7月还说过:“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为了准备打仗,国内产业布局是在内地建立“三线”,因为打起仗来沿海会成为前线。可是三线建设谈何容易?那儿没有基础,得从沿海把工厂和技术人员搬过去。结果,沿海地区不但得不到建设,有些重要工厂还得向内地迁移,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

不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使我们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么,积累靠什么?只能靠剥夺和欺负农民。他们没饭吃还不能离家逃荒。有些农民就因为逃荒而被打死。人祸(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的人数竟高达4200万,基本上都是农民。那几年既不开仓济贫,又不进口粮食(反而大买黄金)。只要两者择一,就完全可以避免饿死那么多人。全国普遍饿死是从“大跃进”后的1959年开始的。这一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500万吨,但出口却比那一年增加了一倍,达400多万吨,占当年储备量的24%,够3000万人吃一年。

开展对外关系,毛泽东也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连和当时亚、非、拉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兴趣大不大,也看在那儿输出革命的机会多不多。为此,有时连断交都在所不惜。“文革”时的1967年夏,出现了反对缅甸、“打倒奈温”的口号。当时毛泽东还公开说,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缅甸要是和我们断交就更好,我们可以更放手地去支援缅甸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缅关系还能不紧张?还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三年。输出革命、露骨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么建不成交,要么建交后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在东南亚,我们当时输出革命的办法,一个是直接派人去;另一个是指挥他们自己干,特别是利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些共产党里,主要骨干是华侨,指挥起来也方便。

直接派人去,缅甸是个典型。在抗日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缅甸共产党同后来的政府领导人昂山、吴努、奈温等本来是合作的,后来分裂了。不久缅共本身也一分为二,由“左”倾的德钦梭等一批人另组红旗共产党。缅共在领袖德钦丹东遇害后,接替的领导人是长期住在中国的德钦巴登顶。我们对这一派缅共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呢?派出军队在中缅边境缅甸境内为他们开辟了几块根据地,组织了武装力量。他们的一切供给,从粮食、服装到武器,都从中国运过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意见,停止输出革命。缅共当即失去供给来源,只好在当地种植鸦片换钱。中国停止援助后,靠种鸦片维持



1958年参观捷一工厂

的共产党力量,最后还是完全解体了。

指导当地人干的,例如马来亚和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本来已经有了和平局面,中国却在那里鼓动武装斗争。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本来已同当局谈判和平相处,我们却指示他们走中国道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才弄起来,1954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中共和苏共一起转而要马共走和平道路。可是过不多久,又指示马共进行武装斗争。1956年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还赞扬他们坚持武装斗争是英雄。1967年1月,毛泽东曾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说,1954年要马共改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请示过他。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复出后没过几年,中共又要他们走和平道路,而且随之停止一切援助,断绝一切联系。此后,马共也就再无声息。

支援印尼革命也过了头。我们和越南党联手,准备支持印尼领袖艾地把印尼拿下来,结果失败。印尼和中国断交23年。

在泰国,共产党也曾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但在中国停止援助后很快散伙。

在南亚,我们原来支持印度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1967年他们分为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这时我们已经不再插手,随他们自己去弄。但进行武装斗争的人员却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他们掀

起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声势浩大,武装人员达两万之多,至今已控制全国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输出革命,就要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一条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延续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好几年。1978年3月31日,一位领导人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还在讲:“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

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

世界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帝修反。打倒哪一个都有问题,尤其是打倒“反动派”。被列入“反动派”的面就太宽了,几乎所有非共产党执政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统治阶级和集团都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全都可以囊括进去。直接参与反对和打倒它们,那就是干涉它们的内政。例如咱们曾用船只偷运军火和粮食、服装等物资给泰国或马来亚共产党。我们那时和西哈努克的关系好,可以通过柬埔寨把东西运过去。

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的差别极大。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两个代表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大方向上的追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内都是要夺取政权,对外都是要推进世界革命。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任务还是在外交事务上,他们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毛泽东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世界上去不同,张闻天认为,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生活富足起来,这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同革命外交路线不兼容。其实在中国,和平共处首先是周恩来1953

年就中印关系提出来的,当时还把它说成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1954年7月6日却把“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说成是一个“口号”。他说,“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毛泽东明确表明,不能以和平共处而应以世界革命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他1957年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介绍他访苏时和苏联的争论情况。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引述,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样,他就把和平共处外交放到了革命外交的对立面。

张闻天正是把和平共处作为一条路线来看待的。他撰文把和平共处提到我国外交主要任务的高度。他1957年1月15日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不输出革命。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革命的经验,对别国只有参考的价值,机械搬用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口号和策略,应用范围不限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是长期适用于对一切国家的总路线。

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差别,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如何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对运动领导权的看法和做法上。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曾断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是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能取得真正独立。建国头几年,毛泽东还把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看成仍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承认这些国家已经独立,把那里的当权派视为帝国主义傀儡。当无法否认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独立国家时,却仍然继续把他们看成是他们国内共产党需要通过武装斗争取而代之的革命对象。后来更把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相提并论,成了“打倒帝修反”中的“反”即反动派,就不足为怪了。

张闻天则是另外的看法。他早就和我谈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意见,说书中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他说,过去我们根据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了,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并且经过新民主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战后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除中国等几个国家外,亚非拉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也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这里要有个转变观念的问题,不能要求别的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来搞新民主主义。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大不相同,我在《党史笔记》里曾作过如下的概述:“1,关于和战问题。张闻天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何方夫妇和张闻天夫妇

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张闻天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他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则倾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推翻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张闻天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建国初就曾专

门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同英联邦国家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经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曾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毛泽东、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毛泽东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他先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上世纪50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我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宪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提倡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闭关自守和国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曾使我们吃了大亏，建国后30年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反而倒退。后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也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张闻天和毛泽东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整节。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反对‘打肿脸充胖子’的对外援助。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取消五一庆典的检阅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通。因为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

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张闻天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不是没有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张闻天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外交上的两条路线也反映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个人的不同追求。张闻天是按他的认识做好外交工作,就是按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好中国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是内政、外交一盘棋,以斗为主,借助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份进而追求取代苏联的地位、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争取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争当世界反帝旗手,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不讳言。1967年11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说,“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11月3日他做出批示:“此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分别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代表的两条外交

路线,其影响在他们身后并未完全消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谈到这三位党的总书记的共同点或相似处。胡耀邦对世界大势和外交工作的看法,和张闻天就是相通的。胡耀邦事实上早就认为时代特点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他认为大战打不起来,不应该输出革命。他在十二大报告中为了不割断历史,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他对国际主义的诠释完全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他说,国际主义就是“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

当年张闻天、后来胡耀邦的外交思想与按国内特定政治需要来解释世界变化和各国政权更迭的毛泽东传统迥然不同。但是,时至今日,不论对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还是对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淡化它们国内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强调西方和平演变在这些变局中所起的作用,不还是一种习惯思维吗?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 崔 敏

上世纪80年代，“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在中华大地迅猛展开。它虽然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却以运动的方式进行，邓小平对它赋予了政治的意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于是，类似于建国初期“大镇反”那样的一场“严打”，便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严打”的发动

“严打”的发动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治安形势恶化引起中央领导震怒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1979年9月9日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案；1981年4月发生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5月发生卓长仁等6人劫持飞机事件；1983年又发生亡命天涯、沿途杀人越货的“二王”案件，这些案件震动全国，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彭真最先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

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彭真主持召开全国城市治安会议，提出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市公检法负责同志的汇报后说：“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从重从快”。

1981年5月，彭真主持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在会上有人诉苦说：“我们的干警不适应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有个持刀抢劫案件，我们抓到歹徒，也找到了犯罪工具，可是检察院说证据不全，不能起诉。那个歹徒抢了个皮包，拿出钱以后把皮包扔了。我们破

案只能找到刀子，却找不到那个皮包，这样证据怎么也找不全。”彭真说：“找证据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要求找到全部证据。我们可以这样规定：找到基本证据，认定基本事实，就可以起诉、定罪。”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就可以定罪处罚。在这次座谈会上，彭真明确提出要实行“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三）邓小平下令开展“严打”

最早提出“从重从快”实行“严打”的是彭真，但最终拍板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则是邓小平。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了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后来又发生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以及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6·16”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猖獗，必须给予严厉打击，并提出了打击的重点和注意事项；同时说明了公安机关人、财、物严重短缺的状况，要求党中央帮助解决。7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北戴河召见刘复之（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开门见山，指着公安部的报



当时的“严打”宣传画

告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不得人心。”公安部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求对各种现行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邓小平说：

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提出：

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战役打击一大批。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必须发动群众，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对刑事犯罪分子，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发出了开展“严打”的动员令。

（四）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活动的决定》

7月29日至8月3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重要指示，研究确定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行动的实施方案和具体部署。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提出：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要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二、修改基本法的三个重要决定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对基本法进行修改的三个重要决定。

（一）《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该《决定》对刑法做了重大修改，规定对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此外还增设了一个“传授犯罪方法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总之是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突破了当初限制死刑的立法精神。

（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该《决定》对刑事诉讼法做了重要修改。尽管只有两条，表面看来似乎只涉及办案时限，其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法律（后文详加分析）。

（三）《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

该《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作了修改，规定：“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此后，死刑

复核权长期下放,直到2007年才收回。

上述三个《决定》,对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做了伤筋动骨的修改,这就应验了邓小平曾经批评过的一种现象:“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三、若干配套措施

为了实行“严打”,公安司法机关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主要有三项:

(一)授权基层法院可以判处死刑

高法、高检和公安部于1983年8月16日发出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这段期间,中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决定把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这一通知改变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管辖制度,授权基层法院可以判处死刑。三个半月后,高法、高检和公安部又于12月2日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对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仍执行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尽管用语委婉,但总算是纠正了此前的不慎重授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

(二)对判决已生效的案件重审改判死刑

1983年8月28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劳改犯和劳教人员在改造期间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对于“在改造期间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要“重判一批,注销城市户口一批,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要坚决杀掉。”据此,将一大批劳教人员逮捕判刑,注销城市户口,发往边远地区改造,并从监狱中拉出一批罪犯,改判死刑处决了。

(三)对服刑期满者强制不予释放

1983年8月19日,司法部、公安部、高检、高法联合发布《关于对犯人刑满和劳教期满的人员暂停放回社会的紧急通知》,规定:“自文到之日起,对犯人刑满和劳教期满的人员,无论其家住城市或农村,均暂不放回,暂按留场就业人员对待。”这个《通知》把劳教人员等同于服刑的犯人,强制“留场就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实际上还是

“政策高于法律”的人治。

“严打”期间大量捕人,再加上对服刑期满的人员不予释放,致使监狱和劳改队、劳教所人满为患。那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监号竟关押三四十人,晚上睡觉很难躺下,这一现象前所未见。

四、连续展开的三个战役

“严打”启动后,从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接连开展了三大战役。

(一)第一战役

从8月上旬开始到12月结束,“严打”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全国共收容审查、劳教、拘留、逮捕108.29万人,处决了数万名罪犯。各大城市注销了一批犯罪分子的户口,向青海、新疆等地送去5000多名劳改犯和劳教人员。

第一仗结束后,稍事休整,年底又打第二仗,到1984年3月底告一段落,共收捕各类违法犯罪分子27.24万名。

1984年5月至7月底,除西藏外,陆续开始了第一战役第三仗。全国共收捕人犯20.23万名。

(二)第二战役

“严打”第二战役第一仗自1984年8月31日全面展开。9月10日夜至14日凌晨集中搜捕,三天内共抓获流窜犯与嫌疑人6万余名。这一仗,全国共抓获各类人犯12.16万人。

从1984年12月5日起,陆续展开“严打”第二战役第二仗,至1985年2月17日基本结束。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3.19万多人,收容审查1.76万人。

从1985年3月下旬到7月底,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开展了“严打”第二战役第三仗,共抓获各类犯罪分子2.85万人。

(三)第三战役

从1986年2月至1987年1月,开展“严打”第三战役。全国共逮捕刑事犯罪分子34万名,劳动教养7.6万名,少年收容教养4458名。

1983年启动的“严打”,接连发动了三个战役,持续三年,后来并没有宣布结束。1990年和1996年又发动了两次“严打”,前后延续了20余年。

五、“严打”的绩效评估

“严打”期间高潮迭起,在全社会引起巨大震动,一度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打”的成效逐渐减退,犯罪高发的势头并没有压下去,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严打”自有其正当性。谁能说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应该严厉打击?问题在于沿用过去搞运动的方式,很容易导致各种偏差。由于“严打”的矛头是针对严重的刑事犯罪,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因而在党内高层很容易取得共识。公安机关更是备受鼓舞,认为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1983年“严打”伊始,仅仅三个月时间,全国就拘捕了108万余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社会治安一度有所好转,因而在初始阶段,多数民众对“严打”持肯定态度。但是,随着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出台,大大突破了法治的底线,它的负面效应就突显了出来。最初,人们按照“矫枉过正”的惯性思维,对“严打”中的某些过火举动也觉得可以谅解。后来“严打”竟成为常态,广大干警也被拖累得极度疲劳,震慑犯罪的效果反而逐渐减弱。

“严打”前的1982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为74.8万余起,1983年的刑事立案数下降为61万余起(请注意:仅在三个月内就拘捕108万余人,大大超过了全年的刑事立案数,可见被拘捕者并不都是当年的罪犯)。到2005年,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达到464.8万余起,是1982年的6倍多、1983年的7倍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并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急剧增长。近些年发生的恶性案件,较之“严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也更为恶劣。实践证明:运动式执法尽管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并不能够遏制刑事犯罪,还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有损法制的尊严。

六、“严打”政策的调整

“严打”在道义上有正当性,开始时得到民众的拥护。但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严打”的成效愈来愈差,社会矛盾更加突显,人们才感觉到这种运动式执法似乎出了什么问题,进而研究如

何调整政策。

2004年7月,《公安研究》发表云南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的文章,他写道:“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这种新思维由一位公安厅厅长说出来,表明了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声称,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于是,“中国将彻底告别‘严打’”,成为一些媒体的醒目标题。

经过由上上下下的反馈和互动,逐渐达成了某些共识。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着从倚重“严打”转向了“宽严相济”,这是对刑事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20多年的法制建设,又走了一个“之”字形。

七、对速判快杀之“9·2决定”的检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3年9月3日同一天通过了三个重要《决定》,总的精神是增加死罪、多判死刑,尤其是《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要求速判快杀。这一《决定》的标题很长,读起来又觉拗口,一般简称“9·2决定”。虽然只有两条,从字面来看,不过是加速了审判的进度和缩短了上诉期限,其实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

从法理上来说,该《决定》存在诸多问题:

(一)剥夺了被告人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至迟在开庭7日以前将起诉书送达被告人,《决定》却规定送达起诉书的期限不受刑事诉讼法的限制。换句话说:在开庭的当天送达起诉书,就可以立刻把被告人拉过来审判,致使被告人根本不可能聘请律师为其辩护,直接违反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和“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的宪法原则。

在其后的13年间,硬是在不允许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判处了数以万计的死刑,冤假错案便在所难免。

(二) 侵犯了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至迟在开庭3日以前将传票和通知书送达当事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决定》却规定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意味着只要发一个通知,诉讼参与人都必须立即到庭,实在违情背理。

(三) 将“应当判处死刑”作为“迅速审判”的前提,本末倒置

按理说,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应当判处什么刑罚,只有在开庭审判以后才能确定。该《决定》竟将“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应当判处死刑”作为“迅速审判”的前提,这就把本末倒置了。在案件尚未送交法院之前,就已内定了“应当判处死刑”,这就不仅违背了诉讼原理,而且无异于剥夺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定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发现犯罪事实没有查清,证据并不确实或者并不充分,对被告人不应当判处死刑,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严格按照“应当判处死刑”去逆推,法院不判处死刑,岂不构成了“违法”——足见这样的规定着实荒唐!

(四) “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限制”的立法用语开了十分有害的先例

如果修改法律都采用类似用语,今天决定不受某条规定的限制,改日再决定不受另一条规定的限制,那就势必会造成有法形同无法,无异于自毁法制。

综上所述,这一《决定》不仅违反了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从法理上、文理上都讲不通,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五) 对照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类似立法

有人说,上述“9·2决定”所规定的速判快杀程序,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其实不然。早在1934年12月20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个决议,题为《关于反抗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案件的侦查和审判》,后来被增补为《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7篇第33章,共有5条,与“9·2决定”极其相似,原文如下:

第466条 关于反抗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行动案件的侦查,应当在10日内终结。

第467条 公诉书在法院审理案件日期的前1日送达被告人。

第468条 审理案件时无须当事人到庭。

第469条 对于判决不准上诉也不准声请赦免。

第470条 判处最高刑罚方法的判决,应当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此处所谓“最高刑罚方法”,是指枪决。苏联的法庭通常设在一座大楼内,地下室即为刑场。而“在判决后立即执行”,是指在判决宣告后即将罪犯拉到地下刑场执行枪决。这5条特别审判程序,在苏联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正是按照这些规定,既不允许当事人辩护也不允许上诉,甚至无须当事人出庭,就将成千上万的人判处死刑并当即处决,造成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这一段历史,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成为后来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之一。

(六) 不断曝光的冤假错案反证了“9·2决定”的失误

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必须严厉打击,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判处极刑应该有所节制,即使必须判处死刑,也应当通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以程序的公正来保证实体公正。像“9·2决定”那样任意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甚至剥夺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那还有什么“司法公正”?在缺乏起码程序保障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冤杀或错杀,就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例如,震惊全国的魏清安被冤杀案,就是由郑州市巩县(现巩义市)法院一审,在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一个毫无过错的24岁淳朴农民魏清安判处了死刑。郑州市中院二审、河南省高院终审都草率从事,核准了死刑。魏反复争辩:“这事我冤枉,我希望见见我的证据。”临刑前仍一再喊冤,竟无一人过问,迅即被处决。半年后,真正的罪犯田玉修被抓获,才使冤情大白。近些年来,一系列原先被认定已被杀死的被害人“复活再现”案,极大地损伤了司法的公信力,它对国家法制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算的。

鉴于“9·2决定”存在诸多弊端,造成了许多恶果,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将其废除,逐渐成为多数同志的共识。终于在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时,明确宣告将这一不成体统的《决定》予以废止。1996年4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谈及“9·2决定”被废除一事,很有感慨地说:“终于去掉了我的一块心病。”笔者当时在场,亲耳听到了王汉斌的这次谈话。

八、对“严打”中其他问题的反思

1983年开始的“严打”,不仅搞乱了司法程序,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对法制建设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

(一)死刑复核权的长期下放助长了有法不依
俗话说:“人命关天!”因而判处死刑理应慎之又慎。但是,“9·2决定”却要求速判快杀,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把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一放就是20多年,助长了有法不依,造成有法形同无法的状态。

(二)对原来未判死刑的罪犯改判死刑,造成国家公信力丧失

“严打”期间,根据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1983年8月28日的联合《通知》,将正在服刑的罪犯拉出一批改判死刑。司法机关自己毁弃了已经生效的判决,在服刑的犯人中造成极度惶恐,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它使国家失信于民,对国家法制所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

(三)对服刑期满的罪犯不予释放,毁掉了法制的信誉

“严打”期间,根据司法部、公安部和高检、高法1983年8月19日联合发布的《紧急通知》,“对犯人刑满和劳教期满的人员,均暂不放回,暂按留场就业人员对待”。这一非常举措违情背理,既没有法律依据,从法理上更说不通。它使司法机关失信于民,其负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四)大量使用收容审查,是对法制的蔑视和破坏

收容审查发端于1961年为对付“盲流”而创立的“收容遣送”制度。中共中央于1961年11月11日批转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规定“凡是自由流动人口,一律坚决收容起

来,分别处理”。1975年又将“收审”用于对付流窜犯。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并没有“收容审查”,但在“严打”中大量扩建和新建收审所,使之成为关押各种人犯的大仓库。尽管“收审”不算正式逮捕,但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与逮捕没有什么差别。大量使用“收审”是对法制的蔑视和破坏。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再呼吁取消“收审”,直到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才正式取消“收容审查”,消除了游离于法外的一大赘瘤。

(五)“两个基本”毁弃了证据规则

在“严打”中,司法机关将“两个基本”(“基本证据确实,基本事实清楚”)作为判断证据和定罪处罚的指导原则。由于“两个基本”含义不清,留下了任意解释的很大空间,降低了审查判断证据的标准。近年来,一些奇冤假案不断被曝光,究其源头,都是由于对证据降低了要求造成的。迄今还有些司法机关仍在遵照“两个基本”办案,可见它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六)“提前介入”更使刑事诉讼乱了套

为了贯彻“从重从快”方针和适应“速判快杀”的要求,与“9·2决定”相呼应,有关部门又层层加码,进一步倡导“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有两种形式:一是人民法院在侦查阶段就提前介入,尽早了解案情,为下一步“及时审判”做准备;二是上级法院提前介入第一审程序,指令一审法院对案件如何定罪与量刑,一旦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立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就把两个审级合二为一,等于取消了法定的两审终审制。这就造成了诉讼程序的混乱:一是搞乱了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分工;二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审级。由此必然造成办案粗糙,难免误杀、错杀以及轻罪重判、罚不当罪,种种弊端,不一而足。

九、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改革开放之初,治安形势不好,刑事犯罪猛增,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当时普遍贫穷,谁家也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自然就很低。改革开放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人、财、物

的大流动加上社会控制能力减弱,便出现了犯罪高发的势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只要存在产生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刑事犯罪就不可能“一网打尽”。试图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发动几次战役就把刑事犯罪压下去,是不现实的。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提法并不错,问题在于:惩治犯罪必须依法进行,要遵守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并且要有适当的节制,做到罪罚相当,罚当其罪,不能只是一味“从严从重”,更不能强调“从快”。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可以“从快”,唯独杀人不能“从快”。“速判快杀”必然导致草率从事,这些年来,一系列奇冤错案不断被曝光就是明证。

一度曾宣传“治乱世,用重典”,力主采取重刑主义,厉行严刑峻法。这是一个蕴涵着政治陷阱的荒谬提法:一面宣传“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提出“治乱世”,岂不自相矛盾?无异于否定了当前的大好形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从严治罪”并不错,但不能乱来,应当严之有理,严之有据,严之适度,不能抛开正当的诉讼程序,突破法治的底线。历史早已证明,严刑峻法决不是治国的良策。“严打”的最大失误就是舍弃了既有法律,突破了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舍弃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再次重蹈了“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和由党委审批案件的覆辙,对刚刚起步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更使人们

对依法办事失去了信心,其负面影响是持久而且很难校正的。

当初,在“严打”斗争发起之时,曾有“四个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信,对这种运动式执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只要遵照执行就是了,不必另来一套;认为从重从快是“左”倾法制思想,是重刑主义、威吓主义、惩罚报复主义;实行从重从快方针会扩大打击面,产生新的冤假错案;实行党内联合办公,会扰乱公检法职能、损害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这些意见颇有见地,但却与最高领导人的判断与决策不一致,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批判。以往习惯的做法,运动一来,就要求全党保持一致,不允许提出异议,这就堵塞了言路。实践证明,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在提出异议的少数人手中。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讲清楚同犯罪做斗争也要遵循客观规律是很难的,这就使纠正这一失误变得异常艰难。直到经过20多年的实践,几次大规模“严打”的成效愈来愈差,人们才感到运动式执法似乎不灵了,进而提出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20多年的“严打”,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为使未来的社会治理不再走弯路,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上接第56页)制止还是在鼓励打人?

其六,如果说毛泽东是出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像王力解释的那样,是考虑到“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的话,那么当时并不缺乏适宜的可利用物。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发出“十点估计”,“西纠”的若干通令也都包含有制止打人的积极内容。但没有见到毛泽东对这些出自部分红卫兵之手的、制止武斗打人的文件予以任何肯定和宣扬。在王任重印发了“十点估计”,希望借此来稳定局势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说:“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其七,另一个更说明问题的的事实是:破四旧刚刚兴起的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批转下发

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次日,又批转下发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报告。后一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这一条比什么都更说明问题的实质。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警察一律不得进入中学”的政策,这政策从哪来的?同月,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又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以谢富治的谨小慎微和紧跟,他的这个“我看”,恐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责任编辑 黄 钟)

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 尹保云

一、威权主义政体的特征与类型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中国知识界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了一阵讨论“新权威主义”的热潮。这次讨论主要是受到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影响,一些学者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来强调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但这次讨论并没有在学术上充分展开,对威权主义政体的性质与特征、历史意义及其前途等都没有很好地探讨,而是停留于字面的理解,所以也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西方学界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政体”。汉娜·阿伦特1951年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上世纪60年代后研究者越来越多。布热津斯基、林茨等给“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下了经典性的定义。极权主义的特点是:高度技术理性的统治权不受限制地被领导人个人操控,鼓动社会革命,热衷社会动员和控制,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等等。现实例子如斯大林苏联和二战时期的德国与意大利。威权主义则是另一种政体。它的专制程度远比极权主义温和,政治结构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具有不充分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理念混合,不搞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等等。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属于经典性的研究,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1960年代中期,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发生了右翼军人政变。这些军人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推翻了“低效率”和“腐败”的文官政府而建立起军人政府。70年代,一些学者在布热津斯基、林茨的“威权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对这些军

人政权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概念。奥唐尼尔在一篇文章中概括出这些军人政府的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强调理性化管理和经济规范化、压制工人运动、搞非政治化、经济上排斥劳工等特征。这些特征组成的分析模型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理论”。

“官僚-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基本是一个概念,指的均是一些搞现代化的发展型政权。被标上“威权主义”而加以研究的多数是军人政权,但也有少数文人政府,如1974年前葡萄牙的“文人独裁”,1981-2003年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无论是军人政权还是文职政府,作为“威权主义”,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个人的高度集权,有一个能够左右局势的“强人”领袖。此外,它还具有一系列“新政权”的特征:在经济上它追求高增长的目标以及经济秩序的规范化;在政治上它是在宪政体制下活动的,不搞单一意识形态控制,具备多党竞争、选举、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地方自治等民主的形式要素,走“专家治国”道路,建设法治秩序;在社会上它强调稳定,搞非政治化,反对动员民众和民众运动,采取严厉措施镇压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等等。这些“新政体”特点是识别一个政体是否属于“威权主义”以及它的“新”的程度的标准。

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讨论过军人政权。他没有使用“威权主义”概念,而是用“普力夺”(“执政官”)一词来称呼。他划分了“寡头普力夺”(流行于19世纪的拉美)、“激进普力夺”(1960年代兴起的拉美军人政权)、“群众普力夺”(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三种类型,并认为“群众普力夺”是最先进的,临近民主的门槛。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使用了“威权主义”概念。但是,他给它下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定义:“‘威权主义’……指称所

有不民主的体制。不民主政权或威权政权的具体类型指的是：“一党体制、极权体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以及类似的政权。”这个定义显然与经典的威权主义定义有很大区别。它把所有“不民主”的政体都划归“威权主义”，而不是仅仅指那些搞现代化的“新政体”。

国内知识界接受的就是亨廷顿的这个定义。它其实是一个很不严肃的定义，不仅把理论搞乱了，也把现实问题简单化了。亨廷顿把所有非民主政体称为“威权主义”，是为了强调“民主化”运动的重要，设计出“威权主义-民主化-民主化巩固”这样一条简单的发展路线。然而，世界的图像却是多样的。

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极权主义政体基本消失，完全属于传统性的政体也很少见，但是尚没有转变为民主制度的政体还有很多类型，比如：1)中东地区很多虽不能称为政教合一但却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2)非洲地区的一些部落氏族性政治结构的国家；3)脱苏联模式而没有进行民主改革的国家；4)以新加坡为代表的经典威权主义国家；5)以印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为代表的“初步民主”国家，等等。在这些国家中，即使最落后的政体，也多少具备某些“新政体”的特征。但它们并不都能被称作威权主义。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属于威权主义，有的在以往某个阶段经历过威权主义。作为经典威权主义政体，它具有特殊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意义，是不能简单地用“民主”与“不民主”来划分的。

二、经济发展的意义

目前流行的看法是把威权主义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威权主义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保证经济增长。这种认识虽不能说错误，却是不准确的和肤浅的。因为这种说法常常是在讲经济数字或物质层面的变化，而威权主义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政体”，它不仅追求经济数字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经济体制。

被视为经典威权主义政体的，大都是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是在二战前建立的。1939年前西班牙是左翼力量执政，左右翼的政治冲突发展为内战，右翼力量

的领袖佛朗哥在内战中取胜。从此到1974年他去世，佛朗哥始终坚持一套亲资本主义、亲美的政策路线。葡萄牙与西班牙类似，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军人独裁，然后是从萨拉查(1933-1970年)到马尔塞罗·卡埃塔诺(1970-1974年)的文人执政，这两个大学教授出生的独裁总统都是亲资本主义的右翼。拉美国家在1930年代后进入“民众主义”色彩的宪政制度。民众主义政府一边兴办国有企业走“混合模式”道路，一边许诺社会福利和提高工资来讨好民众而获得选票，工人则通过罢工等运动不断提出新的工资要求。这种局面导致拉美地区进一步资本积累困难。19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军人政变是针对这种“民众主义”路线的。这些右翼军人政权上台之后，禁止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禁止左翼激进思想传播，大力推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政策。韩国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政权也是同样。还有中国的台湾地区与新加坡的政府以及泰国的间歇性军人干政，都是站在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右翼立场。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政权经常被称为“保守的”或“右翼的”。

威权主义的这种“保守”倾向需要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作历史的分析。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很难在一个国家成长起来。它受到旧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抵制，因此，在成长初期它需要借助其他力量的保护或扫清道路。在西欧现代化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曾经受到绝对王权和贵族的保护，后来又依靠威权主义政府的保护。英国的克伦威尔军事专制(1653-1658年)、法国的拿破仑政权(1799-1804年)、路易·波拿巴军事独裁政权(1852-1870)、德国19世纪后期的俾斯麦政府，等等，这些出现在18世纪、19世纪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与20世纪的威权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这些政权本身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其“新政体”的特点也十分突出，尤其是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开辟道路、提供各种保护和支持。

二战结束后，经济落后国家除了自身存在的阻力外，还有国际上的两个不利因素。一是苏联模式的扩展及其影响范围的扩大，一是西欧国家进一步推行凯恩斯主义而转向福利制度。哈耶

克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曾指出：50年代的英国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了。这样的国际背景再加上自身的障碍，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资本主义的确十分困难。从二战结束到1981年“里根-撒切尔革命”开始，其间的几十年时间内，即便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落后国家，多数也都是在搞混合经济，企图把资本主义与苏联模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数字的重视远高于对经济体制的重视。亲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很少见的。

被视作经典威权主义的各政体之间也在改革决心、执政能力和客观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别。最坚定的要数韩国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政权和智利1973年上台的皮诺切特政权。朴正熙总统的政策是“国家扶植资本主义”，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个私营大企业（“财阀”）群体，这在战后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皮诺切特将军1973年政变时，智利同其他拉美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即庞大的国有部门、早熟的福利制度以及习惯于这种制度的民众，他上台后坚决遵奉货币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在十余年时间内把智利变成拉美地区最资本主义、最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

东亚“四小龙”中，除了香港外，韩国、台湾、新加坡在高增长时都是威权主义体制。“四小龙”1950年代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拉美地区的巴西、阿根廷的水平，但20年之后它们就反超了。主要原因是东亚“四小龙”依赖的是私营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或者培育起大型私营企业（如韩国），或者培育出中小私营企业（如台湾、新加坡、香港），这样，它们就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阶级，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技术创新力。拉美威权主义的情况则不一样。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用铁血手腕推动改革，把智利变成拉美地区的最透明、最规范的市场经济，从而由该地区的一个中不溜的国家一跃成为地区样板。原来的大国巴西、阿根廷则被它超越了。巴西、阿根廷1960-1970年代的威权主义并没有解决“民众主义”留下的各种问题，军人政权搞的经济“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而在国企私有化、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非但如此，这两个国家在威权主义时期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上升了。主要原因是政府决心不够、执政能力不强，



蒋经国父子三人(右起蒋孝勇、蒋经国、蒋孝武)

在此期间各级官员和政府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找各种借口不断地搞政府投资。类似的情况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他虽然也是明显的“右翼”立场，但执政时期（1981-1993年）却走了另一条路线。为了削弱华人经济力量而提高马来人的地位，他采取兴办国有企业和“阿里巴巴”公司（要求安排马来人的华人私人公司）等做法，虽然带来一时的高增长却扭曲了市场秩序，结果在1998年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

还有因其他原因而失败的例子。比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1965-1981年执政）同样以重视经济增长和亲资本主义而引人注目。但是，他的国家管理是特殊主义的，理性化的程度很低，政治家族和经济家族混合一起，各项工业化政策均被少数权贵家族所利用，结果菲律宾成了官、商混淆一体的“密友资本主义”的典型。还有一种情况是威权主义时期过于短暂，没来得及奠定自由经济的基础。希腊就是这种情况。希腊二战结束后独立并建立了王权国家，1967年军人政变建立起威权主义政体，1974年军人政府就垮

台了而转向民主,在经济上融入西欧发展福利制度的潮流。这样,希腊没有经历过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像样的产业阶级。这是它在21世纪的今天陷入深深债务危机的根源。

以上说明,作为“新政体”的威权主义,它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追求规范的市场秩序,这包括经济的自由化(私营化)、法治化和透明化。韩国和智利是这样的成功者的代表,台湾地区、新加坡也不差。相比之下,巴西、阿根廷以及东南亚的威权主义,追求市场经济的力度不够,它们得到一时经济增长的成绩,却没有留下持续发展的基础。至于那些不能称为经典威权主义的众多经济落后国家,多数都只能勉强维持政治稳定,对社会的控制并没有与有效的经济改革相结合。有些也喊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但也只是重视经济数字的增长,而对体制问题不敏感甚至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经常采取体制倒退政策。

三、政治发展的意义

威权主义在政治发展上的意义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威权主义就是牺牲政治发展以求经济增长”对人们影响很大。其实,威权主义的政治发展意义同经济发展意义一样重要。

现代化是人类的革命性历史大转变,它要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解体而进行新的社会整合。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的框架下,这一社会整合才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威权主义的政治发展意义首先在于维持一个基本的宪政框架,从而使政治组织、精英和民众在一个有约束的环境下不断地得到民主的训练与改造。

各个威权主义政体产生的背景不同。有的国家是在建立宪政时就带着浓厚的威权主义色彩,比如1880年代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所建立的宪政;有的是在建立宪政制度时发生了政治分裂甚至内战而转向威权主义,比如中国大陆时期的蒋介石政权、葡萄牙1926开始的军事独裁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等等,都是在早期宪政引起内乱、内战背景上产生的;有的是为了收拾

不可控的社会动荡,比如韩国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政权;有的则是在民主制度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需要用强制力量来推动经济改革,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均属于这类情况;也有的是在正常情况下出现了强人政治,比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等等。虽然具体历史背景不同,但它的共同理由都是为了应对宪政框架下的危机和冲突,或者为了实施大力度的改革。一般的情况是,在初期经历过一段军政府时期,采取军法管制或戒严令。然后,军人领袖脱下军装通过选举形式而转变为文职政府,恢复宪政机制。宪法和法律会在汲取以往的混乱与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而略略有所改变,但仍然属于民主的宪法。三权分立、政党竞争(包括党内竞争)、公民投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地方自治等民主的形式要素都保留着,但是会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比如,采取措施(包括修改宪法以延长威权总统任期、动用行政资源拉选票等等),遏制反对党力量扩展,打击政治激进的反对派领袖,监视工会以及民众运动团体,对罢工、罢课等抗议活动进行限制甚至加以镇压,等等。

这样的行为经常被反对力量(反对党和民主运动团体)指责为“独裁”、“专制”甚或“法西斯主义”,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经常站在反对的立场。然而,这在民主发展的早期阶段却是难以避免的。在民主的早期阶段,政党、社会组织、精英、民众等都不适应民主形式的要求,没有养成协商、妥协、依法解决问题的政治文化。政府、政党精英和各级官僚的很多行为招致社会不满,而另一方面,反对力量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常常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求助于对抗方式,如不断地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甚至采取各种暴力反抗行动,等等。在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背景上,持续的反政府运动容易诱发激进主义崛起,或者导致内战而国家分裂,或者导致“下层革命”而走向极权主义。这样,现有的宪政框架也就随之倒塌了。这样的教训在20世纪世界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它说明宪政制度在奠定之初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以免被内部的政治冲突所颠覆。这个力量就是威权主义。

除了保证基本的宪政框架不被颠覆外,威权

主义还有具体的政治发展内容：

首先是政党体系的建设。初期的宪政政治体系的特点是政党派别杂多，政治精英一盘散沙，派性权力斗争主宰政治生活。威权主义一方面保留着宪政体制的政党竞争格局，一方面采取各种具体措施限制和规范政党活动。在经历威权主义之后，政党的数量一般都大大减少了，一盘散沙局面也大大改观。西班牙在1936年内战爆发前的“共和”时期，仅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一大堆，整个国家也分为无数的

社会和文化板块。佛朗哥以严厉手段打击分裂主义，很多党派也随之消失了或联合了。韩国1950年代每届国会中都有十几个政党进入，还有大量的无党派议员。朴正熙时期禁止以无党派身份参选，大约1/3的议员名额按照政党得票率分配，这不仅在国会中消灭了无党派议员，也迅速地减少了政党数量并形成了两个大党的结构。威权领袖的集权倾向不能容忍军队和执政党的派性分裂，从而避免了执政党出现党官僚寡头制或元老寡头制的格局。同时，执政党积极推进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执政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人事安排的合理化、程序化及透明度，等等。执政党的这些变化时刻影响着在野党的发展，从而各个政党的组织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是国家管理的理性化。威权主义是“专家治国论”的实践者，强调国家管理的法律化和决策的科学化。虽然威权领袖的地位十分突出，但整个国家的管理却不是“人治”，而是严格甚至有些刻板的“法治”。威权主义总是以先进国家为学习榜样，行政系统也模仿先进国家，因而保持较小的规模。韩国的国家机构有2院（经济企划院、统一院），16部，6处，一室（政务长官室）。1988年，“职业公务员”（政府正式雇员）246236人，其中地方职230789人，国家职15438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57%。葡萄牙、西班牙、台湾地区

我们国家的道路

著者：（南朝鲜）朴正熙 译者：陈琦伟等

华夏出版社

等等也基本是这个情况。拉美地区略有区别，因为它们“在民众主义”时期学习苏联而摸索“混合经济”道路，导致政府机构也跟着膨胀。尤其是阿根廷，曾经把扩大公务员队伍作为扩大就业的措施。在威权主义时期，它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其三是民主因素的不断发展。由于有基本的宪政框架存在，威权主义体制下民主的发展并没有停顿。现代民主是由分权制衡、政党竞争、选举投票、言论出版自由、地方自治、法律体系等形式

要素所组成的形式系统，其中每个要素的进步都可以看作是民主的发展。威权主义在开始阶段比较专制，但以后逐渐扩充和完善民主的各个形式要素。韩国朴正熙在1963年脱下军装变为文职政府直到1972年，可以看作是很好的民主制度。1973年由于国际形势变化而推行“维新体制”又转向威权主义。但即便是这个“最独裁”的时期，也常有国会议员当面拍桌子斥责他。至于其他言论，除了禁止马列主义和讨论南北统一问题外，都是放开的。到了80年代全斗焕时期，马列主义也可以自由传播。台湾1949年到1987年7月15日是执行“戒严令”时期。但国民党一到台湾就在开始推进民主建设。1950年16个县、234个乡、78个镇实行自治。台湾在威权主义时期，民主选举的范围包括县市长和议会（参议会）、省议员以及增补“国大”代表。还有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拉美地区的威权主义，在其统治下民主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经过威权主义阶段，不仅政治体系中法理性因素得到增强，整个社会的秩序观念、法律观念、协商和妥协精神均有很大提高。这种政治文化上的进步也体现在威权领袖身上。经典威权主义的政体虽然不多，却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政治领袖，如蒋经国、朴正熙以及葡萄牙的萨拉查，他们的廉洁、自律、勤勉、负责的人格榜样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是难找的。

四、政治转型及启示

以上实际上已经说明,作为“新政体”的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并没有很大距离。它的政治转型是由“不充分民主”转向“充分民主”,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步骤。

亨廷顿认为“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上起步,这没有什么错。王权国家、政教合一国家、一党制国家、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等等,均可启动民主化。但应看到,由于起点不同,民主化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在所谓“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一些是威权主义国家,另一些是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凡属威权主义的,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台湾地区等等,它们的民主化转型都是很平稳的。尽管有些短暂的混乱,但很快得到稳定和巩固。相反,中东欧地区的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却经历了极大痛苦,它们或者发生内战,或者国家分裂。这一巨大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原来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苏东阵营的国家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于传统政体而属于“新政体”,但由于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建立在自由与多元化的基础上,仅靠党与行政系统的集权来维持一体化团结,因此未能发育出现代性的整合机制。

苏东国家的解体给中国留下深刻的记忆。尽管中国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但一直有很多人用苏东国家解体的教训来警告中国不能搞民主。这种看法是出于对威权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的知识缺乏。苏东地区的政治转型引发国家解体有各自历史上及文化上的原因。如果说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它们没有经历一个有效的威权主义阶段。由于苏联模式的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社会的原则,它很难直接过渡到民主制度。它的稳妥道路是先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的体制,在一个有控制的宪政框架下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而奠定一个水到渠成的民主化基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作是从苏联模式向威权主义转变。对照前面指出的经典威权主义的特征,我们能够找到不少相似的东西。这

说明我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经济上,我国国有企业占产值比重还高达48%。这说明经济改革的道路还很遥远。尤其是通过扩大投资、消耗资源而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巩固了利益集团的力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在政治结构上与威权主义的区别更大。威权主义是在宪政体制下活动,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宪政制度。我国虽有人大(政协)、政府、司法这样的与宪政体制对应的机构,但并没有在宪法上赋予的分权制衡的意义;各级领导班子的组成也有选举和投票,但参与投票的范围很小,比如市一级领导的选举由四百多名县级、副县级干部参加投票,候选人还是由上面提名的,没有竞选和竞争。这样一些稀薄的因素构不成宪政框架的形态。我们目前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一个苏联模式的政治框架的结合。这是一个畸形的体制,自然会导致各种奇怪现象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的鸿沟在国有企业庞大而政府又不断地搞再分配的情况下反而不断扩大,官本位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反倒日益强大,公务员队伍的学历不断提高而国家管理的理性化水平并无明显改善,如此等等。

如果抛弃这些年国内流行的不科学的、模糊不清的“新权威主义”概念,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目前的处境、问题和出路。我们目前的政体与经典威权主义的差距很大。准确地说,我国目前的政治体系是苏联模式的延续,在摆脱极权主义色彩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发展到威权主义,没有踏上一个符合现代化规律的道路,从而陷入一个社会矛盾丛生而又不能摆脱的困境。

这也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的道路和空间。民主化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仅靠一次民主化运动就能完成,宪政体制也不是国内有些人所担忧的一匹脱缰野马。每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经历多次民主化改革而完成的。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宪政体制而向威权主义迈进就是重要的民主化。它的经济发展意义和政治发展意义将会有效地解决在目前令人头痛的很多问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吴忠谈抓“四人帮”

○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整理者说明：本文由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1986年夏与陶然女士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不少同志问我抓“四人帮”的问题，说法不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抓的，华国锋不抓，就不会有人抓“四人帮”？不见得，也还会有人抓“四人帮”。是不是只有华国锋主持工作时才能抓“四人帮”，除此以外再不会有人抓“四人帮”？我不这样认为。另一方面，怎么抓的？我了解一些，全部情况不那么清楚。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活动很不正常，比较频繁。江青几次到保定，到长辛店，到团河农场，到昌平，清华的什么单位；王洪文到平谷。短短的一段时间，活动范围不是很大，显得频繁，很不正常，很有怀疑，究竟在搞什么？中央了解的情况更多，也在密切观察注意“四人帮”。中央考虑过解决此问题，办法就是把“四人帮”抓起来。

10月1号没搞大的活动，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搞了个小型活动，华国锋讲了话，讲完话站起来就走，会就散了，江青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看样子想说点什么没说成，也只好散了。我看是对“四人帮”做出的反应，不大理她，也没有安排她讲话。

此前倪志福同志告诉我，苏振华同志约我去密云水库玩，我简单做了一些准备，陪苏政委去密云水库，以为真的是去玩。10月2号，我打电话给苏政委，告诉他可以去了，我已做了准备；苏问我上午是否有时间，我回答有时间，他要我到他家中。去后苏政委说，中央现在的斗争情况你是了解的，他们要夺权，他们要掌了权不得了。苏没有明说，我知道是指“四人帮”；苏接着问，卫戍区的部队你能掌握得了吗？我回答没问题，掌握得了，我和杨俊生同志在卫戍区工作多年，注意教育部队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部队调动

严格遵照中央军委规定，其他的人插不上手，他们别说调动卫戍区部队，连一个班、一个兵都调动不了。苏说，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同志、陈锡联同志，吴德同志不用说，包括叶帅，对你绝对信任。我认为这不是虚话。我明白，秘书和倪志福同志说要去玩，实际上不是去玩，就是要告诉我这些话。

回家后我想，苏振华同志讲的，不可能是他个人的考虑，判断可能是中央小范围考虑与“四人帮”斗争问题，要和卫戍区领导透个气、打招呼；苏政委是我的老领导，文化革命中我在锦州也是保苏振华的，所以让苏振华和我打招呼，“串联”。这是我的判断。

抓“四人帮”，谁起主导作用？抓“四人帮”后不久，叶副主席讲，我们又有了英明领袖华国锋，并引用了典故“投鼠忌器”，说明打倒了“四人帮”，又没有伤害毛主席，所以华国锋英明。叶帅就是要说服我们对英明领袖服气；也可以看出华国锋在“四人帮”问题上起的作用。抓“四人帮”后，吴德同志曾说，邓小平同志讲过，华国锋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办法（把“四人帮”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自己回答，看来也只好用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再一个，中央领导小范围研究过解决此问题，要把“四人帮”抓起来，但什么时候动手，哪一天，我看没有定下来。10月5号，华国锋和陈锡联同志到唐山去视察，了解地震后安排的情况，从唐山回来后看到《光明日报》“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曲解毛主席的意思，陈锡联说，看来他们要下手了，我们要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促进了华国锋对此问题的考虑。我认为陈锡联的这个话与10月6号抓“四人帮”关系比较大。中央有准备，抓是必然的，但哪一天抓？《光明日报》的文章起了决定作用。再不动手，可能他们就要下手了。

这三件事：叶帅讲话，吴德谈话，陈锡联提出的问题，我看抓“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恐怕是主导作用，没有他的积极性，事情不会那样利索的。他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如果华国锋不是积极主动起推动作用，叶帅会讲这番话？不会。当时党的方面华国锋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政府方面他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军队方面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样，华国锋、陈锡联一起就是军政一把手。

抓“四人帮”。6号下午4点钟左右，汪东兴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五点半经东边门到中南海他的家里，有事找我。我告诉了吴德，他说到时候你去吧；后来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我告诉他汪东兴电话的事，他说你去吧，电话里不便讲，汪东兴同志会告诉你。我给陈锡联同志打电话汇报是必要的，他当时主持军委工作；告诉吴德也是对的，让他知道。从这二人的口气，理解到他们研究过这个问题，估计是“四人帮”问题，但没把握。5点半我准时到，汪东兴同志等着我，到他家中，是因为这件事的知密范围很小。汪东兴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我听了很高兴！决定是：今晚8点钟政治局召开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二是出版《毛选》五卷。以这个会议的名义通知“四人帮”到会，他们不会请假。江青住在中南海，用不着来开会，汪东兴同志就可以执行；张春桥、王洪文住钓鱼台，姚文元住外面，是卫戍区警卫。如果他们有觉察不来，属中央警卫团警卫的由中央警卫团抓，属卫戍区警卫的由卫戍区抓。汪东兴说，如姚文元不来，卫戍区去抓，到他家中宣布中央决定进行保护审查，交代搞阴谋活动的问题，宣布后就带走，对家中进行清查，清查后向其家属和工作人员规定几条纪律……

到8点钟，三人全来了，到怀仁堂，来一个抓一个。我在怀仁堂，华国锋、叶帅都在，找我布置任务，说一会儿耿飏同志来，接管广播事业局，给他派一个副司令一块儿去，我说派邱巍高，管警卫的副司令。我打电话叫邱巍高来交代任务，又打电话给警卫一师师长田占魁，告诉他姚文元的问题已解决，不必去他家了，要他去广播电台，把电台控制，待耿飏和邱巍高同志到后，听邱巍高

指挥。

等耿飏同志期间，叶帅问我，我给叶帅建议，“九一三”事件处理得好，严格保密，直到证实林彪摔死，还在广播“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保持了局势稳定，效果很好。叶帅听后很感兴趣，请华国锋同志过来，说吴忠同志讲得很好，让我跟华国锋同志讲讲；华国锋同志听后也表示赞成，说此事暂时保密。但保密没保住，传出去后群众高兴得不得了，奔走相告；感到消息泄露出去没什么坏处，就请示中央，群众问起来可否证实这个问题，中央同意了。大家都恨“四人帮”，保密没保多久，几天后就决定开百万人大会声讨“四人帮”，吴德讲了话。

耿飏接管，华国锋写了介绍信给广播事业局，还有邱巍高的名字；耿飏拿了介绍信，带着张香山和邱巍高走了，我也出来了。在走廊里，耿飏同志对我说，吴忠同志，你赶快把李素文、吴桂贤也抓起来，这两个人坏得很。我说，中央决定了才能抓，中央没决定我怎么能抓？他想得很简单，在叶帅和华国锋面前你怎么不讲？

回来后，我跟吴德同志汇报了情况，吴德同志说，还剩迟群、谢静宜、金祖敏，汪东兴同志说11点抓，不惊动别人。吴德同志要请市委秘书长周家俊（音）来，我打电话，说他发高烧，就未叫他来。征求我的意见后，吴德同志通知倪志福到吴德家里，研究抓迟群、谢静宜、金祖敏问题，决定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吴德办公室看文件。这时谢静宜在北京医院住院，迟群在清华，金祖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

布置好后我到吴德同志办公室，迟群接到通知很快来了，我叫他坐下，宣布：迟群干了很多坏事，上级决定对你隔离审查，要很好向组织交代。我叫卫戍区警卫处长张成（音）同志来把迟群带走。谢静宜，是陈一夫（音）同志去医院找她，用车接到市委，我告诉警卫三师政委陈先达，谢静宜一到，不用上楼，让她上你的车，换车带走即可。谢静宜换车后被带到警卫三师，她在车上就骂开了，说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你们就搞政变，你们受邓小平欺骗……陈先达制止了她。我带着张成去抓金祖敏，那时金祖敏是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准备当全国总工会主席的。

几天后，中央政治局请抓“四人帮”有功人员

吃饭,华国锋、叶帅、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五人参加,其他同志未到;我和张成去了。叶帅讲了几句话,讲到卫成区我和杨俊生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好作用。8341部队的同志发言,拥护中央决定;王张江姚专案组负责人于桑也发了言;李鑫也发了言;后来要我发言,我没讲,要耿飏讲,他也没讲。我想,请吃饭就吃饭,发什么言?没必要。我不愿意讲,是对汪东兴印象不好,他争功,计较。有一次他和我说,你们警卫一师还在搞纪念张思德的活动,张思德不在警卫一师,在我们警卫团嘛!我回去告诉警卫一师,汪东兴有意见。其实,8341、警卫团是从警卫一师调过去的,调过去没多久;汪东兴兼警卫团的负责人,太计较。我不愿意发言,就是不愿意恭维8341,你汪东兴有功劳。

叶剑英副主席在好几个会上讲汪东兴抓“四人帮”的功劳,也讲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过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同志这样讲,意思是让我们重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可以和建国相提并论。粉碎“四人帮”以

后不久,叶帅在一次会上讲,有的同志说还是要维持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三七开,叶帅伸出大拇指说:文化大革命是这一份的!不能讲三分缺点错误。我曾和吴德同志讲,这是什么意思?毛主席讲了三七开,缺点错误还不够分量。吴德同志说,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嘛!

两个“凡是”,华国锋是后来讲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草华国锋的讲话,与会同志逐字逐句修改,是根据另外一个老同志的讲话,凡是毛主席生前做出决定的一切问题都要贯彻执行。后来党内批判华国锋搞个人崇拜、两个“凡是”,没听说这位老同志出来解释。

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也是这位老同志搞起来的。当然华国锋也愿意让人崇拜:中山公园音乐堂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华国锋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我看了就不大舒服。抗日战争时华国锋是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全国解放时在湘潭还是县委书记。他喜欢到处题字,但毕竟“英明领袖”不是他自己封的。应该有人站出来说话。■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追忆朱厚泽

○ 杨继绳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

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约刊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在夹缝中开拓“三宽”

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

朱厚泽说,1985年8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议。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

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

朱厚泽说:当时的情况哪能“放火”?

是的,1986年政治形势诡谲。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较量,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滚滚。这种情况是不能“放火”的。但他不消极等待,而是采取了特有的开拓方式。朱厚泽介绍说:

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中央讨论通过后,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4月4日在光明日报社,4月21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月22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月2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

3月8日参加音乐家座谈会时,我拉上了周巍峙、高占祥一起去的,我是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一个食堂里讲的话,提到要为文艺工作建立宽松的环境。第二天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我讲到对待知识分子要“宽容”、“宽厚”。

1986年1月3日,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议的艺术家的时,发表了即席讲话。我讲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摆清事实,摆明道理,疏导思想上有疑问的同志。我讲了党委和大学生之间要经常交往、交流、交心,互相理解,建立真诚的、互相信任的关系。

我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

这些讲话,《文艺报》发表过,1986年7月15日和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过。新华社对这些讲话没有发表过,穆青按兵不动。我在上海讲话时,新华社一位女记者写了一篇稿子,送给我审,我压下了,没让发。

我问老朱:你讲“三宽”,如何与“四项基本原则”协调?他说,我是这样讲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有人说我把四项基本原则架空了。黄菊向中央问朱厚泽讲的对不对,向中央报告没有。胡启立说“他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我没有报告,胡启立主动为我承担了责任。不过,他也作了一点让步,在讲话中把“宽松、和谐”改为“团结、和谐”。

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致和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

人有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我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朱厚泽在政治“夹缝”中努力挤出“三宽”,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丝暖意。“三宽”虽然被“夹缝”挤杀,却永远留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中。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况

1994年,我正在写《邓小平时代》,对朱厚泽说:我正在写一本书,想如实记录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历史。请你谈一些你所经历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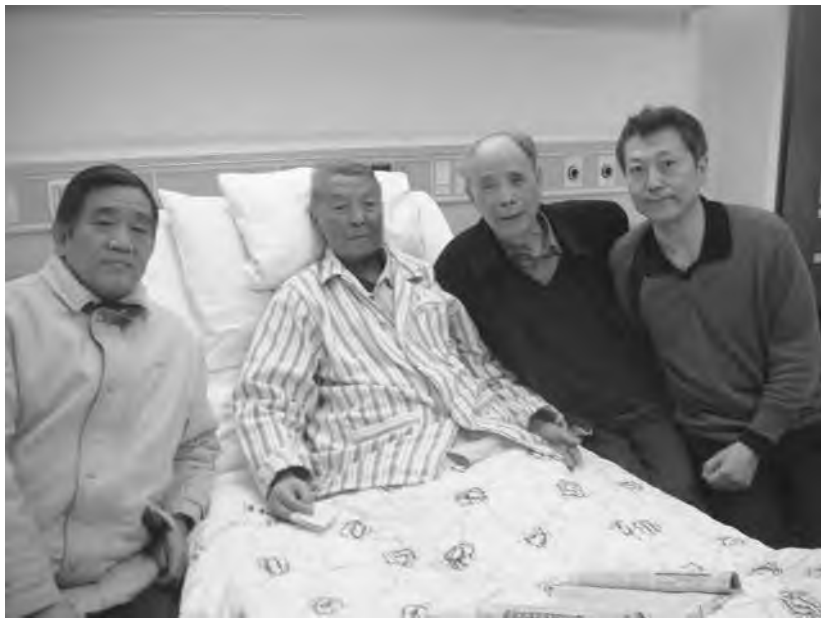
朱说:我1985年8月从贵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离开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后,我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每到形势宽松时,左派总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学潮平息以后形势不错,左派又挑起两件事,一是“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创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阳意见。”他们二人压下来了,没有引起一场大批判。“马丁事件”被新华社的《国际内参》和《经济参考报》炒了一下,也被胡、赵压下来了,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波。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更内部的是围绕“精神文明决定”的起草展开的。

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左派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并用这个机会整胡耀邦。一讨论就有分歧,一讨论就吵架。最终,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盘,陆定一发言引出了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的那段话。左派更得势了。从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风波;有了这场风波就有赵紫阳下台,这是连着的。

从北戴河争到北京。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出现了党的会议上少有的情况。在人大大会堂,胡耀邦念完了决议,准备举手通过了,陆定一站起

来发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陆讲完了引起了热烈鼓掌。在主席台右边的中顾委席上掌声最热烈。当时的座位是,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右边是中顾委委员。我到中顾委席上说:“你们这么大劲,闹不好可能帮倒忙。”当时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感到很难办。主席台上议论起来了。最后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强调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当时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不好传达。耀邦说,先不要传达,怎么传达,由书记处研究后再定。



2010年4月,杜导正、杨继绳、吴思在医院探视朱厚泽 (杜明明摄)

朱厚泽对我说: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一段时间的报纸。从1985年9月党代会(会议期间正好学生闹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怀仁堂作报告,扭转左的局面,到十三大。这两年间发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着讲他亲历的事情:

1985年9月党代会前在北戴河做准备。一是通过“七五”建议,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学生闹事,又加了一个议题: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过《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为准备这个文件,讨论了一年。党代会讨论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决。(1986年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讲要下来,国外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原计划十三大邓全退。这两年,一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办?二是人事组织工作怎么办?耀邦下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中。在这期间,改革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精神文明决定的讨论过程中有两期简报,耀邦亲自抓这个文件的起草。这个起草小组又接着搞初级阶段理论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没有写进“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给“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开8000名干部大会反腐败,涉及胡立教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叶飞的

女儿。后来抓不下去了。邓小平说,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搞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讲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当时的形势下,意识形态怎么搞?党组织应当选用什么样的人?反腐败怎么搞?这几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干部就会受到打击。晋江假药案是整项南的。因为项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坚决。“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银耳”。假药是银耳做的,不能治病,但无害。用银耳做假药是不好,但打击这么重,闹得省委书记项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12月出现了全国性的学潮。耀邦还是想按照1985年处理学潮的办法,即对话、沟通、协商的办法来解决,没有成功,还引起左派不满。1987年1月,通过“生活会”这种方式把耀邦赶下了台。

批评耀邦七个半天生活会,生活会后就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小平只让通过公报,不让讨论。只有陈云作了发言。我参加了这个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第一个发言是余秋里。邓力群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

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木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就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材,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云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面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这个会,至于背后还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后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邓力群带着王忍之到中宣部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紧接着说:“不要等历史作结论,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朱厚泽离开中宣部以后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席(主席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厚泽向我介绍了他到全总上任前赵紫阳和他的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一年多以后,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时候,朱厚泽承担了全部责任,当然也就离开了全总的领导岗位。

“四种试验”和“五个一般”

朱厚泽知道我一直研究改革的历史。他说,研究中国改革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只看这二十年,要放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大框架上分析。他说:

在20世纪初,列宁说的那些问题是存在

的。矛盾,冲突,战争,动乱。自由资本主义面临严重的危机,怎么得了?为解决这些危机,世界上出现了种种思潮、种种实践。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实践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有三条:一是政治上否定公民的宪法自由,反对议会民主,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二是在经济上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三是文化上否定人权,反对人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希特勒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政治出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并不是像电影中所表现的那种疯子。

第二种实践是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新政,他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政治上坚持民主宪法和议会民主制,坚持人权、人道和公民权利;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干预,通过福利主义调节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措施摆脱了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

第三种实践是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

第四种实践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第二国际的思想对这条道路有影响,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20世纪四种实践较量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被人类唾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体制曾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旗帜,共产党在一部分国家取得了政权,并建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能迅速动员资源,解决落后国家工业发展问题。但是,这种制度的危机日益加剧,最终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在一部分国家内得到实现。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西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经过一个世纪较量以后,这四条道路中,一个被消灭了。一个在一度辉煌之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另两种道路,即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基本合流。

当代世界有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罗斯福和北欧社会民主党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改

革,形成了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主体。这种制度在二战以后依靠技术革命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二战以后新的生产力超过了资本主义过去的100年。这一制度还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缓和了社会矛盾。革命的危机不存在了。第二股潮流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改革。改革的潮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一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受这股改革潮流的影响。

全球走向一体化。两股潮流将合流。全球化是大趋势。

谈到这里,朱厚泽问我:你对21世纪怎么看?我说:21世纪需要解决三个矛盾。他问:哪三个矛盾?我说:第一是全球化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这是指国际关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这是指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矛盾,这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关系。

我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朱厚泽就明白了。他说:我同意你对三个矛盾的分析,不过我觉得这三个矛盾最终会化解在“五个一般”之中。他认为,21世纪的大趋势是“五个一般”:

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20世纪反复较量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现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没有制衡非腐败不可。

现代公民社会一般。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20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一大灾难。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断强化国家也是不对

的。国家应当逐步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

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信息化、网络化为标志的新技术浪潮会波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20世纪是现代迷信的世纪,是造神运动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一元独断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在一些国家大泛滥。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造成大灾大难。必须弘扬当代人文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精神。

他说,这“五个一般”也可以称为“五个进入”:入关,即经济全球化;入网,上信息高速公路;进城,城市化;回归社会,解决国家主义问题;返还人间,建立人的主体地位。

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谁也避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实现这“五个一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种种摩擦和冲突。

听他说完了“五个一般”,我表示:你这“五个一般”具有历史的深刻,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不过我认为,“一般”必须和中国的民族基因对接,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

他说:是的。中国的民族基因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精神文明?

有一次,我们从起草精神文明决定那段历史谈到精神文明建设,谈到社会道德重建。

他向我介绍说,对于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民族精神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他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如果不清理旧道德中的伪道德,则年轻人认为所有的旧道德都是欺骗。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没有从道德意义上来肯定三中全会: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言论和行动相统一。这些不仅是思想方法上和唯心论相对立,而且道德上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相对立。现在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道德意义?

他认为,新道德首要一条就是言论和行动一致。道德重整的前提是恢复言论和行动的统。说真话,革除言行相悖的弊端。没有真话怎么办?

他自问自答:为什么共产党的言论和行动不一致?这和“铁的纪律”的党有关。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铁的纪律就没办法推翻旧的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党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在实现政权转移以后,要严格区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要促进民主化进程,领导、组织也要实行转变。高度集权的秘密组织是双刃剑,一方面,没有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战胜旧制度;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也会腐蚀人。由于我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们的国家和过去的国家既有区别,也没有区别。恩格斯对旧的国家的判断,也落到我们头上来了。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建立了国家;而国家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又成为社会的桎梏。为维持公共秩序进行某些必要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有组织地、系统地使用暴力手段,这就很危险了。

他自问自答:中国靠什么统一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要多元化。社会就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就是多元的存在。没有多元存在,要民主干什么?

关于新民主主义

2004年9月10日,国家体改委原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安志文看望了赵紫阳。9月16日上午(星期四)我到安老办公室看望他。安老向我介绍了他和赵紫阳见面的情况。

安老说,赵紫阳24小时靠吸氧维持。见了

老朋友,尽管鼻子里插着管子,还谈笑风生。他俩很放开地谈了两个多小时。安老向我全面介绍了他俩的谈话的内容,还说这些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看法。其中谈到如何启动政治改革问题。安老说,我们两人的看法是,当前启动政治改革的共识有两个,一是毛的新民主主义,二是邓的改革开放。在肯定毛的新民主主义和邓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克服毛、邓的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这样做可能推动政治改革。

我从安老那里回来后,向朱厚泽转述了赵、安两位老人的看法。

从过去的多次谈话中我知道,朱厚泽是很尊重赵、安这两位老人的。但听了我的介绍后他沉默良久,反而问我:你是怎么样看新民主主义的?我回答说:《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提出来的,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只求“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希望在政权中分一杯羹。如果那时毛泽东有独自取得全国政权的愿望和预见,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策略,是为了团结中间力量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政权已经到手了,他更是不准备实行“各个阶层联合专政”了,那时喊新民主主义的口号,更是一种策略,借此在经济上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尽快恢复经济。

朱厚泽说:新民主主义是有策略层面,但如果从理论层面说清楚,可能会产生误解。最近几年,不少人认为,1953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太快了,太急了,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1953年转早了,1963年转早不早?1983年转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只能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所以,我们必须丢掉新民主主义这个幻想。

朱厚泽这一段话使我如醍醐灌顶。众多有影响的、积极主张改革的老人还对新民主主义怀

“文革”殉难者邓拓

——纪念邓拓百年诞辰感怀

○ 袁 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幸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2012年2月26日，是邓拓同志百年诞辰，而他离开人世已有46年，百年生命，在刚过一半的时候就被掐断了。1966年5月17日深夜，他的生命之火黯然熄灭的时候，正是乌云满天，狂风遍地，那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成为“文革”十年中第一份黑色号令的《五一六通知》，正高速度地撒向神州大地，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将中华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叶剑英元帅曾经估算过“文革”十年中死难大约1000万人，如果按时间排列，最早的一个就是邓拓。他出生于福州的书香门第，在上海参加革命文化活动，抗日炮火一响，投笔从戎，从书斋奔向五台山抗日根据地。从此“笔走龙蛇二十年”，编报纸（《抗敌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编书（主编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了大量社论、报道、文章、诗词和学术论著，这样一位杰出的新闻家、历史学家、诗人、杂文家，竟成为那场大动乱的第一位殉难者。那年他才54岁，正是为国为民大展才华的中年，他的高风亮节，满腹经纶，都毁于一旦。他忍受着种种言词的诬陷、文字的侮辱、精神的摧残，坚持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传统信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铮铮铁骨。

1986年4月间，我曾多次拜访邓拓同志夫人丁一岚大姐，听她含泪回忆20年前那个乌云压

城、电闪雷鸣日子里邓拓的艰危处境和痛苦心情。半年前突然爆发的对吴晗所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的风暴。邓拓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感到这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又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前奏，却万万没有料到接着来的竟是对他自己在《北京晚报》上随笔专栏《燕山夜话》和同吴晗、廖沫沙两位好友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上合写的专栏《三家村札记》的挞伐，声势之大，调门之高，压得他目眩神摇。那帮无耻文人从文章中寻章摘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任意罗织罪名，甚至无中生有将“叛徒”的帽子扔到他头上，使他震惊而且愤怒，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又一场文字狱的祭品。前些天他曾同好友杨述一起议论过当前形势，都以为可能是他们所崇敬的最高领导人被一批心怀险恶的坏人所蒙蔽，并非出自他老人家本人的决策，如同唐初王勃在名篇《滕王阁序》一文中所写：“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在被逼得无路可走决定自己结束生命的时候，他留给北京市委领导的遗书中，坦率而恳切地表明心迹，要求党为他澄清种种不实的诬陷、还他以清白名声，最后仍然虔诚地写道：“我的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可惜，他们的估计都错了。邓拓临终的三呼万岁根本不可能被听到，听到了也必定

着深情厚意，朱厚泽却独树一帜地、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逻辑是专制主义。真是一针见血。这是他对新民主主义最早的看法，以后他对

新民主主义有着更深刻、更全面的批判，在其他朋友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记述，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 黄 钟）



1934年邓拓在上海

无动于衷，因为在“万岁”心目中，邓拓已被列入应该被打倒的坏人之列。那份《五一六通知》对当时政治形势就作了完全不符实际的概括：“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更亲笔增写了一段：“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未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话，今天听起来，还使人不寒而栗。

对邓拓来说，他的悲剧性的命运，如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其实早已逐渐形成了。老一辈人大都亲身经历，记忆犹新，建国之初，当人们兴高采烈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准备为新的时代献出自己一切聪明才智、也诚心诚意愿意提高认识、纠正自己不正确思想的时候，便接二连三遇到对电影《武训传》、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古典文学评论《红楼梦研究》等等艺术作

品的政治性批判。1955年春，对胡风的批判由文艺理论之争迅速演变成对反革命的大讨伐，一批批文化人陷身囹圄，更使人瞠目结舌，心惊肉跳。1957年全国范围的那场“丁酉之难”让50多万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沦为异类达22年。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风霜雨雪，五劳七伤，20世纪60年代初，紧接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几千万人饥饿而死的三年困难时期，又连续开展学术、理论、文学、艺术领域一场接一场的批判，知识分子都已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到了1966年6月1日，秉承最高领导人旨意，由一批刀斧手执笔的《人民日报》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一发，黑风陡起，天下大乱，摆在邓拓这样坚贞不屈、正直无私的人面前的，必然只有死路一条，他不过是早走十天罢了。

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一手策划那场既毁灭一切文化、更同革命毫不沾边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毁了两三代人，遗毒至今远未清除，它的种种危害，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至今也还未彻底清算，我们还能不时感到它的影响，也还有人念念不忘在“文革”中得到的名利，因而一直含情脉脉。巴金老人晚年瞩望建立两座馆——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为此再三呼吁，这是大家都长记心头的。由于中国作家协会几届领导和全体作家的共同努力，现代文学馆终于美轮美奂地屹立在首都，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和充实，可以告慰巴老在天之灵。可是巴老剖心沥血、痛切陈词，希望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尽管二三十年来有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吁请，至今还在我们大家的梦想里。幸而这些年出版了不少追忆“文革”、控诉“文革”的著作和文章，记下那个荒唐岁月的许多冤案、许多血淋淋的史实，无形中成为文字的“文革”博物馆，让千万读者记住那荒唐的年代，却也仍然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甚至振振有词的限制。如果忘却“文革”，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巴金老人？怎么对得起包括邓拓同志在内1000万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人？不必列举更多，就说紧接在邓拓去世之后五天，就有另一位曾被誉为“党内才子”的田家英，一样地含冤自尽。其后两三个月里，可以列出老舍、傅雷、姚溱、李平心、叶以群、陈笑雨等一长串死于非命的文化精英名字。那位被抛

出来为“文革”祭旗的《海瑞罢官》作者、历史学家吴晗，在受凌辱四年之后，1969年10月终于被迫害致死。我们不该永远缅怀他们的英名、永远诅咒“文革”的罪行吗？30年时光，冲淡了斑斑血迹，但是，成千上万人的伤痛，怎么可能轻易抚平以至泯灭呢？

在纪念邓拓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自己在哀痛之余感到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调来北京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成为邓拓同志的部下，在他领导下做文艺编辑工作，也在他的人品和文品的言传身教下为人为文。他带领全社人员认真而细致地贯彻党中央交下的各种宣传任务，重视调查研究，反映民情民意。他待人宽、责己严，从不摆领导架子；他尊重不同意见，从不搞一言堂。报社许多工作较长的同事耳濡目染，都有深切的感受，如坐春风，终生受益。1954年10月，我第一次接受他直接布置的任务，便是起草一篇支持两位“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当时只听说江青来报社传达毛泽东主席的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批评文艺界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我仓促受命，急忙忙赶写出来，经过当时文艺部领导林淡秋修改最后由邓拓改定见报，在署名时，他决定不用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而是署了我在报社用的本名。后来我才领会到，当时他同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一样，并不赞成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那种做法，对一本学术性文艺评论在《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批判，但是“上命”难违，就用一个普通编辑的名字发表，减轻些分量，也是用心良苦了。

他经常教育报社同仁不仅当党的喉舌，也要当党的耳目；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先用耳目，了解情况，了解实际，了解理论、政策，这个喉舌就会说错话，闹笑话，一个党也是这样。1957年春夏之交，正当最高领导人在盘算着那场他自称“阳谋”的大动作的时候，认为邓拓行动迟缓，按兵不动，有一次严厉斥责他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是“汉元帝那样的庸君”，甚至认为他参加中央会议而未能尽快地贯彻中央意图是白来参加会议，要支付板凳折旧费。面对这些刻薄而粗野的呵责，有如泰山压顶，邓拓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要求辞职又不被允许，他回到报社后除了神色凝

重之外，仍旧按时上下班编报。慎重行事，决不轻举妄动，保护了《人民日报》没有被打成“右派”报纸，也保护报社一大批干部没有戴上帽子。当时全报社大楼内一片肃杀之气，人们的内心几乎都站在他一边，都不能认同所谓“书生办报”的罪名，更别说“死人办报”，但是嘴上又不能说什么，只能默默表示同情，那个斥责是完全错误的！回顾一百多年历史，从清末民初现代报纸在中国创刊以来，“书生办报”一直就是优良的传统，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忧时忧世、爱国爱民、有德有才的书生在办报，才能出现一份份为广大读者喜爱、从而对推动历史进程发挥不可替代的威力。正是由于这些杰出的书生们殚精竭虑、耗尽心血，那些报纸才能在鼓吹共和、推翻帝制、反对列强侵略、号召奋起救亡、抨击专制独裁，揭露贪污腐败，呼唤民主自由、启发群众觉悟、组织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奋斗中，发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巨大威力，这是百年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没有一代代前赴后继、九死不悔而博学多才的书生，是办不好报纸的。无论党报或者民间报纸，无论大报小报，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勉强办出来，也不会受到读者欢迎喜爱，只能自生自灭。那些违背良心，不说真话，靠大话、空话和假话骗人，甚至如“文革”大动乱十年中受命于阴谋家、野心家的刀笔吏们炮制出来所谓“舆论”，只会受到人民群众的鄙视和唾弃。在纪念邓拓同志百年诞辰的日子，我们仍然应该以他为榜样，继承“书生办报”优良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扬光大。

1959年2月，邓拓同志奉调离开人民日报社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工作的时候，在报社欢送大会上念了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情深意切，感慨遥深。对其中“文章满纸书生累”一句，还略作注释，说前几天还有一位老同志说他“书生习气未能无”，言下似乎有一点自责，更有一点自许。我们坐在台下，想起两年来“书生”二字在报社大楼里几乎成为一个不祥的禁语，今天竟由邓拓同志本人以如此平淡的口吻

怀念诗人方然

○ 彭小莲

2010年8月25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叔叔去世。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女儿谢小玲翻出了他60年前的日记。小玲激动地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简直是在看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是你父母的？不是，是诗人方然和钱瑛的爱情故事呀！

听着蚕吃桑叶沙沙响，/蚕儿是把/她们底心血吐成丝，/然后搬出那/祖传三代的纺车，/深夜纺着。/那哑的难堪的声音，/回忆着那最不忍回忆的，/作着那最希望的梦……/而最后母亲是怎样，/抖动着那一束闪光的黄丝呵，/让给别人去做花衣裳。/贫穷的人呵，/你就是藏起一把丝线，/又有什么用处？

而到秋收的时候呀，/母亲们是怎样/苦痛撕碎了心肠，/被恐怖逼得疯狂……/

男人们把新谷，/一箩箩挑走了，/女人们在田里，/为着抢几十根残穗，/而彼此恶狠地咀骂。/然后又怎样，/伏在眼泪鼻涕与尘土里，/伏在豪门大厦底门槛旁。/门槛内是算盘珠子响，/门槛外是深深的池塘。/一个母亲，夜里，/还珍爱着，/那嫁时留下的一双绣花鞋，/把它齐整地摆在池岸上，/然后就拿生命偿还了，/那永也还不完的苦债呀……/一个吹箫人，/叫我听他在月夜里/低低吹着箫，/他说：/听呀，/落水的水鬼们，/在那池

边柳树下，/呜呜地哭了，/为着找到的替身，/又是自己的亲人！/……

2010年的11月，小玲拿着父亲的日记，在我家狭小的屋子里，激动地大声朗诵着方然的诗歌，听着其中的这几句，我被吓住了。方然——你岂不是在年轻时，就向我们暗示了自己生命的结局？诗人在1943年初，23岁时完成了《哀歌》，那会儿，他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名字不是诗人，而是与谢韬一起划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中。他热情地追求着诗的灵魂！那灵魂一直飞扬到谢韬叔叔的日记里。谢韬叔叔写着：“我将扬声地宣称，这与世界任何伟大的诗篇比，是会毫无羞愧的！五年来广大的诗坛中，这是第一流最伟大的作品！我没有多的话，诗全抄在这里，你就读吧！”

于是，小玲接着父亲的感觉哈哈大笑，说道：“诗全抄在这里，你就读吧！”

方然死了，成为一个纸页上的诗人，最后存活在别人的日记里，1966年他走时，片纸未留，具体的死亡地点，众说不一。谢韬叔叔更是全然不知。这日记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在1955年被捕时，成为罪证被公安部一起带走。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归还时，每一本上面都做了编号、划上了红线（需要重点审读），它们经历

写入诗句，不禁都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在报社食堂有个小型的送别宴会，我去敬酒时，他笑吟吟地说：“我不能喝酒，你写首诗给我吧！”我当时满口应诺，也真打算写，而且步他的原韵。不料一再蹉跎，到二十年后写出来，却已成了一首挽诗，不可能去请他指正，只能献到灵前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谗甘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时光荏苒，又是二十年过去。遥望云天，百感交集，欲哭无泪，只能在心底深深呼唤：敬爱的邓拓同志，你真是太累太累了，雨过天晴，在九泉之下好好地安息吧！你毕生热爱忧思的祖国和人民，经历了无数灾难，终久会稳步“举国高潮望接天”地走上康庄大道！■

（本文系作者在2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邓拓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黄钟）

了“文革”，在公安部里幸存下来。日记本身的经历，已经向我们展现了恐怖，上面弥漫着10年秦城监狱的气息、劳改15年的反革命印迹，但是这些残存的印迹，终于展现了这些反革命原本的面目，他曾经是如此地纯粹、如此地充满了激情在追求民主和自由！

谢韬叔叔的日记本就在桌上，指尖是那么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它，那里面正一点一点展现出一个美丽的形象：

钱瑛读了《哀歌》是激动得那个样子，朋友们这样高贵纯真的爱情，我就抄十遍也值得：

我整个的心被你那伟大的灵魂震撼得厉害。你知道你是蕴藏着那么多丰富的力量吗？那力量使我在受着复活的洗礼呀！方然，我感动得太多，然而可以告诉你的却又是太少了……

到此刻为止，我已经将那篇《哀歌》读了五遍，我真是被无数苦难的声音鞭挞着的。我怎能逃避？我怎能踟蹰呢？——为着来结束这世纪母亲们的哀歌！

从诗句中，读到你的那样可怕的诅咒、憎恨，我是如何地战栗着……我已经知道，对于一切敌人，是应该给予他们最深澈地诅咒和憎恨的。这样，我们才能给予我们的大众最深澈的爱呀！

1943年元月九日 星期六 晴

方然读了她的信，手有点颤抖，他纷乱了，这如何不叫他激动呢！

夜晚，他坐在椅子上不言不笑，蹙着眉，他又是在挖心挖肝地苦思结构了。我坐在火盆旁边，赤着脚在烤火。全宿舍的人都睡了，我们清楚地听到打一点钟。

1943年元月十日 星期日 晴

方然的信(片段):……今天我送那包东西给你，我在草地上徘徊了多久多久；为这我是在直面着人生一个严肃的问题。我终于送出去了；而今天我又是何惧怕着，而又终于拆开你底信。我无数遍读着你的信！你惊异我么？此刻，我自己也是惊异着哩。在阴冷而抑郁的家庭里，我长大，到如今二十三年了。我是第一次看着自己点起了火，是自己的灵魂这样炽烈的燃烧着。我曾为着初见到北方一个异样的土地而那样狂喜过，

我曾为着一个爱我的朋友她殉道而那样悲痛过，然而，我是第一次受着这样的磨难！……我底信不会扰乱你读书吧？什么时候考试？房间有人起来了，不写了。

这封信谁读了会不感动？这样的人不爱，你要爱怎样的人呢！这封信一定叫钱瑛好几夜睡不着觉。这信真是杰作！在发信以前，后面又添上几句：

我是“一块丢在墙角落的石头”。在你面前我是太卑琐了！而我到底没有撕掉这封信，我马上要送出去！这，我怎么不惊异！

小玲说，对，我马上要送出去！

我们都不再年轻，可是我们都还是为父辈的真情所打动。其实小玲连钱瑛阿姨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但是她有信心在杭州找到她。于是，在我醒来的时候，小玲已经悄悄地离开小屋，赶去看望92岁的钱瑛阿姨。我还是停留在那个1943年元月11日给方然写回信的姑娘的形象中，日记里记载着她的语言：“我拼命地叫自己相信那不是真的，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我只是一个极平庸的姑娘，孱弱而愚昧，是不配受你的爱护的。而你同你的诗句，确是多么丰富而超卓。我爱他们，更因为他们对人生表现了一样的刚毅与坚真。”

不管我们是否还记得过去，当谢韬叔叔的日记，展开了如此恣意的姿态在飞翔的时候，对过去的理解，我们在改变；曾经被修剪过的往事，即使被删改、涂抹得面目全非，可是那残存的文字，让我们看见了千年不变的年轻人的狂热，那一张张充满着朝气、阳光的脸，那些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一代人！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怎么方然和钱瑛的情书，竟然会出现在谢韬叔叔的日记里！小玲说，那时候他们的情感都是共享的！

只隔了一天，小玲就从杭州回来了，有点无奈地叙述着行程。她终于找到方然和钱瑛阿姨的儿子，孩子已经改姓钱，叫钱家栋。当小玲提出要见见钱瑛阿姨的时候，家栋觉得可以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在得到许可后，带着小玲上路了。他一再关照，还是不要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方然为妥，因为他们都爱继父，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进门的时候，钱瑛阿姨平静地接待了小玲。小玲试探着说在爸爸的日记里看到了一个很了

不起的钱瑛阿姨。她似乎就感觉到了什么，摇摇头，依然用平静的口吻对小玲说：“哪里有哦，那些事，都忘记了。我是用一生来忘记呢。”家栋说，继父刚刚不久前中风了，家里人都在为这事忙乎着。

才过了2011年的春节，小玲已将父亲1943、1944年的日记整理、打印成册了。她在年前曾把1943年的日记用电子版第一时间发给了家栋，可是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她还是不甘心，找我商量怎么才能让钱瑛阿姨看到它。我又把自己新出的增订版《他们的岁月》快递给他，希望能转交给钱瑛阿姨，找寻一个新的机会。依然没有消息。春节后，小玲终于从家栋的邮件里得知，钱瑛阿姨跌断了胳膊住院了，继父不久前去世……生活不是轻松的，更不是那么多人愿意重温这段“浪漫”的往事。

我一直想搞清楚，钱瑛阿姨什么时候和方然分手的？为什么啊？方然的朋友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他们还是把方然和钱瑛混杂一起诉说。大家最爱说的一句话：方然，多么有才的一个人啊！我去看望又一个“胡风分子”小顾（征南）叔叔，（他虽然已经86了，可是大家还是沿袭着“分子”的习惯称呼）他对我说：“那还是54年底左右，我们在上海召开华东戏曲会议，我看见一个年轻女的，轻飘得很。我问浙江来的编剧胡小孩，我说：‘这是谁啊？疯疯癫癫的。’他说，这是你们的老朋友方然的老婆啊！瞎说，钱瑛不是这样的。然后，胡小孩告诉我说，是方然刚结婚的……唉……”小顾叔叔叹气很久，一直摇头，感慨地说：“这事，是方然不好，是他的不好！”

可是在1943年元月15日谢韬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1943年元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阴

方然对钱瑛说：“我有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告诉你的。你知道，我这一生最为了我的理想与信仰而奋斗，我底爱情与生命都是属于我的信仰。因此，我一生将会是贫穷、流浪与迫害，我是一生不会幸福的。我曾为着爱情与事业而使我长久的苦恼。然而我能忍心叫我底爱人也一同去受苦么？然而我又深深地斥责我自己了。你一定也会是像我一样，我那样想对你会是侮辱，瑛，你说是吗？”钱瑛，头点得深深的，她痛苦而又

充满了一股内在的力量地紧紧抱着方然，坚定地说：“是，我愿意。你要是怎样去受苦，我就怎样去受苦。”

当年，金陵女大英语系的才女钱瑛和金陵大学的才子方然结婚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对绝配的夫妻。他们俩在大学附近的别墅里，租了底层的屋子，连着漂亮的小院子，成了金大学弟学妹的聚会点，钱瑛成了钱姐，她每晚都在那里接待着她的小弟娃（谢韬）。当年诗人曾卓跑了一次成都，回到重庆时，告诉大家说：“那群青年诗人的领袖人物是方然啊！”

学问、反独裁、向往自由，这些浪漫的情感，弥漫在这群年轻人中间。

钱瑛阿姨总是说：“他（方然）的家庭跟我的家庭不一样，他是一个官僚家庭，我家是一个商人家庭。”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受了“阶级教育”的一代来说，他们是同一个阶级的家庭。“可是，方然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全靠他的伯父把他抚养长大。他母亲守寡一辈子，依然没有能力抚养方然，他读书啦做什么事情啊，都是靠着这个伯父。因为伯父是国民党的参事，住在南京，也有钱。”又一次，我们会“迷失”在自己成长的经验中，“阶级”教育里讲的国民党分子，原来不是什么坏人？他肩负着那么多的义务，对自己的兄弟承担着无言的责任。我们就在这些混乱的认识和知识里长大。那方然和钱瑛阿姨呢？

方然在业余的时候，翻译出版了《斯大林论语言》。那时候，他是否知道，斯大林暴政的大清洗？

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微博，所有的宣传和新闻都是被封锁的。大家只能看见眼前的事实——那就是抗战胜利以后，人民依然没有自己的国家，只有国民党的党国，宋子文拿着国产在美国开私人账户，工人失业，市场上通货膨胀，金圆券比草纸还便宜。方然在《重庆晚报》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以老师的身份，组织并领导学生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

于是，我们的父辈，这些年轻、正义的学生开始向往着革命，一代理想主义是这样诞生的。生活中的境遇，被方然和钱瑛阿姨婚前的誓言说中

了,一生的贫穷,在流浪与迫害中生存着,钱瑛与他共同分担着苦难。

终于打听到了钱瑛阿姨住院的地址。于是,小玲重新赶到上海,这次我和她一起背上了谢韬日记,2011年4月17日,我们直奔杭州中医院而去,可是钱瑛阿姨不在,她去给她的后一任丈夫扫墓去了。夜晚,我和小玲在杭州的林荫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多想哭啊,为什么,那么轰轰烈烈、那么美丽的爱情,总是会破碎的。小玲说,方然和钱瑛生的两个孩子,都把继父当亲生父亲看待,他们非常有感情。那个家庭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最困难的运动中一起走过来的。钱瑛阿姨会接受我们的“礼物”吗?可是,方然的情感、谢韬叔叔的印迹,要有它的归宿,钱瑛阿姨,希望你是这归宿的港湾,也许这礼物烫得让人害怕,可是这是岁月的馈赠啊。一定要去见钱瑛阿姨,不管怎样,父辈的友谊在那里。

次日,赶到病房的时候,钱瑛阿姨早早就起床了,她在那里等待着。雪白的头发,是岁月的见证,可是她记忆依然是清晰的,反应仍旧是敏捷的,她紧紧地握着小玲的手,什么话都不要说了,此行没有错误!

1947年,3月5日,上海和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前往延安,重庆的《新华日报》被查封,是在灰烬的纸屑中,警察看见了方然的名字和住址,于是在5月31日方然被捕。

92岁的钱瑛阿姨清楚地说道;“有一天晚上,半夜里,他们就冲进来,搜查我们的屋子。那时候我就带着两个孩子,急得要命,每天去这里打听,那里托人的。那个时候,很多人,阿垅啊,他们都在,他们每天都来告诉我的。那个时候,抓的人好多啊,好在方然还没有吃什么大的苦头,没有什么受刑,没有打他什么的。在狱中,他坚决拒绝对方的威胁利诱。我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他南京的伯父,就这个事情怎么办啊。他的伯父给我寄来一张名片,叫我到卫戍司令部去找人。那里的人说,‘方然这次的政治问题很严重,我能不能够把他保出来,不一定的。’我说,那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他是伯伯的干儿子,感情很深啊。方然也不是什么共产党,就是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嘛。那人说他带着学生,是煽动学生搞学潮,是个头头。我说没有这种事情的,后来我

再打电报给他伯父,于是伯父亲自飞到重庆来接方然。那人对伯父说:‘我答应你放人,但有一个条件,你把你的侄子带走,不要在我这个地方捣乱,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离开重庆!’这样子我就跟方然,带着两个孩子,一起飞到南京。因为,伯父是和小老婆住在一起,他自己的伯母是在安庆老家,我带着两个孩子就在安庆住下了。方然留在了南京……”。

那时候的方然苦闷极了,他一身的热血没有地方燃烧。每天晚上,就是拽着诗人冀汭在南京的梧桐树下,来来回回地走着。(这份友谊,后来也作为冀汭叔叔划为“胡风分子”的依据。)那时候,他渴望去解放区,要面对面地和敌人斗争。

在这最无望的时刻,他去上海找到了胡风;胡风介绍冯雪峰见了他们。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似乎指出了一点方向。

这就是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姑父,一个国民党的军长,在他的帮助下,建立了杭州的“安徽中学”,后来中学成了江南根据地的中转站。那时候,方然的军长姑父已经退伍了,但是他和杭州的城防司令很熟,于是通过姑父,方然去见了好几次城防司令,他是帮助共产党与城防司令谈和平解放杭州的事情,这对杭州的和平解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的世界好像来了,青年人狂热啊,“你们不能想象,你们也不知道的吧!”这是钱瑛阿姨跟我们描述的。冀汭叔叔是这样回忆着杭州解放的日子:自古以来流传的“兵不血刃”,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又亲身迎来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方然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服,严肃地站在市民中间,也跟众人一样,忘记了饥饿,忘记疲乏,翘首等待大军到来。他不时回头看我。我们心里在激荡着喜悦感、幸福感,流着泪水相视而笑。此刻,我们都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验到“如醉如痴”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时间:1950年5月3日下午。地点:杭州中山中路方正大茶庄门口。

很快,到1952年冀汭叔叔看见钱瑛时,他一定是思考了很久,然后慎重地告诉她,“经常有个女的给方然写信”。钱瑛也回忆道:“我刚刚这才知道……后来他们同居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自己也有责任,当时只管工作……我们在一起

10年，53年离婚，我们是43年结婚的，整整十年。这个十年当中啊，前个五六年可以说是共患难啊，追求一个理想。解放以后，他虽然是在搞安徽中学，但是他的社会活动啊，他的安徽中学的校长是挂在那里，他实际上是文联的秘书，政协里头，他又是搞统战。我每次到政协开会，他都是在那里忙这个忙那个，他就是跟我点点头，我也是跟他点点头。”

小玲真是难受，“钱瑛阿姨，你怎么还说自己有责任啊，现在的女孩都要怨恨死他啊！”

“我告诉你，我只能告诉，我以后的感触，我当时的感触是说不出的，我想孩子还这么小，后来跟着他的这个女孩，也吃了很多苦，很快就离婚了。我始终，我对方然这个人啊……我是好几天晚上不能睡，我痛苦得要死，我好几次提起笔来，放下，又提起笔，做准备，我想要不要告诉组织上？最后，我什么都没写，什么都没写，结果还是没写。”

“我这个人呐，不善于搞化妆啊，思想没有用到那个方面去。我有点书呆子，好像觉得党交给我这个工作，我就是全心全意把它做好！没有想到其他的事情。他希望我无论如何成全他，他已经成为这个事实了。两个孩子，他说，他负责到底，绝对不增添我的麻烦，当时我是……我说，那你就走吧，我不愿意跟他多谈。他走了以后，我两三天都没有睡好，饭也不想吃。我就是躺在床上，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说‘你走吧……’他跟我谈这个事情，我伤心得都站立不住，他就跪在地上跟我讲。他说，无论如何你要成全我。那个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时候，胡风问题还没有出来呢，我也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你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我心想，我也想通了，什么东西也不好勉强的……”。

钱瑛阿姨平静地像在说着别人的事情，可是我和小玲连气都透不过来。人生，怎么会是这样变化着的？很快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了，方然是杭州首当其冲被捕的一个。新夫人走了、离婚了，就剩下方然的寡母带着方然和钱瑛生的两个孩子，那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啊，钱瑛作为杭州的“半个”胡风分子也被隔离审查，她要求把两个孩子交给自己在上海的老父亲寄养。钱瑛阿姨，只希望方然的老母好好活

着，她多不容易，一生就为了这个儿子活着，可是儿子被抓走了，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犯法的事情，没有想到，老母亲也被逼着要交代儿子的罪行，群众专政，你这个老太婆的沉默，不是在包庇反革命吗？一个老式妇女，哪里能理解什么“阶级斗争”理论啊，在举目无亲的屋子里，是邻居啊，听说是跟她讲，你儿子是反革命，你还想什么啊，大家都骂她，于是，她选择了悬梁自尽。

冀沔叔叔是这样描述方然在监狱里的日子：

57年的秋天，阳光灿烂。看守打开几间监舍，让犯人分别出来在大院里洗衣服。监舍就是排列在大院四周的一间挨一间的小房子。房内除了一张双层单人木床，一只马桶，余下的空地不过三平米，仅够犯人来回踱步。厚重的木门正中开有一扇小窗，食物和饮水从这里递进来，看守也是从这里观察犯人的动静，但平时是关着的。我一直单独在监禁，平日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浣衣的声音、泼水的声音，犯人喊“报告”的声音，总会情不自禁地走近小窗口，拨开一道缝隙朝外看。这天意外发现蹲着洗衣服的犯人中有一个很像方然。但是只能看到侧面，等他洗完衣服，等他站起。他终于站起来，将衣服晾在铁丝上。是他，真是他啊！他那么精瘦，脸庞那么苍白，全无血色。我立刻联想到自己：大约也是这副模样吧！心里一阵悲凉，眼睛也不觉模糊起来。我回到床边坐下。不多一会，听到方然的声音，那是多么熟悉的声音，而说出的话却又是多么陌生的用语：“报告国家工作人员，我进去了！”看守吆喝着：“去！”我忍不住又一次扑到小窗口透过缝隙探望。他进去了，看守锁门。原来他的监房就在我的斜对面，也是单独监禁的。我的眼睛证实，他和我竟关押在同一个院子里。打那以后，每次听到他叫“报告”，我便伏在小窗口探望，尽管不能见面，不能谈话，总算在探望亲密的朋友啊！

天冷了。

等到我理发的日子，行动相对自由的理发犯人悄悄告诉我：“你那个朋友吐血，送到外面医院里去了。”我心里一沉。方然的肺部虽然不健康，过去从没有听说他吐血。理发犯人称他为“那个朋友”，难道他已经知道我们的案情？于是悄悄探问道：“你怎么说他是我的朋友？”他嘿嘿一笑，

声音极轻地：“我听见所长向武装看守关照过，不能让你和他同时出来洗衣服、晒太阳。”原来如此。

方然在监牢里，能够想到的，只有钱瑛了，他发出去一封很简单的信：你……你能不能给我寄一点书看看。钱瑛阿姨说：“我那个时候，是摘帽右派，虽然摘帽了，还是右派。有什么事情，要跟组织上，不是组织，他有一个保安，专门管我的，治保主任这种的，要跟他汇报的。他说，你送点毛主席语录啊，一卷啊，你看过的，你可以给他看。我说，小说可不可以？他说，小说要看什么小说。我那里小说也没有什么小说，我忘记了。一本小说，两本毛主席语录，一本毛泽东选集，给他寄去，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写信。”

当年，方然的大伯还可以把他从国民党监狱里救出来，现在，就再也无法让他出来。监狱的铁窗，逼迫着父辈们，开始审视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许在这个时候，一个诗人，终于感受到一份渺茫的爱的力量，这力量会支撑着他走很远很远，他活下来了。十年的监狱铁窗生活。

1965年，冀沔叔叔也从监狱里活着回家了，他的妻子在那里等待着。

方然却无家可归。他只能在姑父家歇脚寄生……

2003年的冬天，冀沔叔叔刚刚动完脑手术，但是他还是坚持走到医院的后花园，要把方然的遭遇对我说完；可是说着说着，80多岁的老人，却像一个孩子那样，用手指不断地捂住眼睛，他不希望在我的摄影机前流下眼泪，可是通红的眼睛，那泪水一点都不能控制，渗透过指缝，不停地往下淌。

“方然出来以后，刚开始派出所叫他协助居民办墙报；后来介绍他参加街道组织的劳动，给一家小厂洗涤回纱，每月可以得到18元生活费，倒也安坦。‘文革’开始，一直斗到他和他的姑父身上，要将他俩一起遣返原籍，交给群众管制。方然健康情况又不好，回到原籍从事高强度劳动，还要接受没完没了的群众批斗，自知很难过关。他径直地走到公安部门，要求重新回到监狱。没有人搭理他，他孤立无援，走投无路啊！他对姑母说：‘一定要我回原籍，我只好投西湖了！’一天，他向姑母讨了一点零钱，带上病历卡

和四支香烟，说是去看病，再也没有回来！

“我还找到过去安徽中学的老同事，请他们帮助了解方然的死。一天，冯士清老师来告诉我，他从当年与方然一起劳动的老人那里知道：那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方然一个人留在最后，后来被人发现时，他已经在洗涤回纱的水沟里淹死了，说不清是自杀的，还是体力不支滑倒在水沟里再也无力爬起来……”。

1983年1月25日，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为方然举行平反追悼会，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只能放些他曾经用过的旧钢笔。

小玲终于将父亲的日记放在钱瑛阿姨的手上，她接过日记，说：“我眼睛不好，但是我会认真看的！”我们起身……该走了，她又提到了方然，她说：“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说到这里，她眼里涌满了泪水，我和小玲都低下头，太痛了，60多年来，她可能是第一次把这话说出口，我们怕自己的泪水会那么轻易地流淌出来。

后来，小玲收到钱瑛阿姨出院后的来信。

她说：“这次你和彭小莲来杭看我，给我带来了最宝贵的礼物——你父亲的日记，让我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能重温我美好的青春。这种幸福我想在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能享受得到的。我在这里要深深地感谢你和你的父亲，因为这份幸福实在太沉重，太珍贵了。”

“我生命中最璀璨的青春是和方然一起度过的，他给过我狂热的爱情。但方然毕竟是一个诗人，当爱情的激情在平凡的生活中逐渐转变为亲情时，我们的悲剧也就开始了。他是一个‘以爱情光荣生命，以生命证实爱情’的诗人，他一生追求的是狂热的爱情，他无法从诗的梦想中走向现实。我会宽容他的，特别是每当我想到他跳进西湖的那一刻，我的心总是刺痛得厉害。好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父亲的日记中却永远保留着我们的美好的时光。这就是我再三要感谢和你父亲的原因。”

钱瑛阿姨的信，充满了她博大的爱、充满了她刻骨铭心的痛，还有她的理想主义追求！我们还是要再在黑暗中，伸出我们的双手，理想还是要再在黑暗中飞翔，给我们带来希望。■

（责任编辑 黄 钟）

寻找张国焘墓地

○ 桑宜川

2010年盛夏,我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往多伦多,去参加母校北美校友会的年度聚会。其间,在两位学友的陪伴下,专程去寻找了张国焘的墓葬之地。多伦多市区周边的墓地很多,然而关于张国焘的下葬墓穴,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语焉不详。为了能顺利寻找到真实的墓地,出发前我们做了仔细的调研,查询了张国焘墓地的大致方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驱车出发了。

张国焘,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遭遇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批判,对于加拿大的张国焘葬身之地,据说过去许多老华侨也唯恐避之不及,几乎没人敢去看它。

张国焘的死因刍议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国焘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这座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辨,描述了与张公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其实,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三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国焘“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很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老人与妇

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国焘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失落,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洋洋大观的《我的回忆》,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更有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入行专业人士,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国焘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旗袍加身,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

张国焘去世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所谓张国焘最后因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一旦有人被冻死,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引发新闻,面临倒闭,并且承担巨额赔偿与法律责任。

我看你来了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了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这才知道张国焘墓可能就坐落在这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类似于时下的一幢豪华别墅,大厅里明窗净几,淡蓝色的地毯,雅致的鲜花与绿色植物,营造出了一一种五星级酒店的氛围。此时,柜台后面几位职员正忙碌着,见到我们的到来,便热情地招呼着。应客人的请求,按照办事程序,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开始了各种方式的检索,不厌其烦,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始终也无法查询到有关张国焘的中文

样,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据该职员回忆,近年来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这位张国焘先生的下葬情况,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姓名和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国焘的姓名,无果而返。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 Kai-Yin Cheung 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恺荫就是张国焘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润之即是毛泽东,博古即是秦邦宪,只是博古的字号在中国现代史中更为出彩,如雷贯耳,几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实姓名。

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张国焘之后,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远在无锡,他的家乡人为他而骄傲,为他立碑,修缮故居,献花拜舘,年年如此。家乡人从不忌讳博古或曾犯过所谓错误,更欣赏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怀。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的时候,何以因言因事毁人一生?目前,我们还可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发言记录文献,其中记载了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传为佳话,永泽后世。

话说回来,我们确认了张国焘的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000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我不由得惊叹,悠悠岁月,竟有这么多华人一生飘零,望洋兴叹,埋骨异乡,终究也未能落叶归根。

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步,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



松山墓园里的张国焘墓碑

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与墓园守望者的对话

因此,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墓园管理处,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帮我确认地理坐标,以便及时找到张公墓碑。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职员们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何以要如此执著地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亡者。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这或许可理解为忠于职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讨个风水吉利,中西文化的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是日,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奔走得精疲力竭。两位学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我告诉两位学友,这次我万里走单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颇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张公国焘”的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

隐姓埋名为哪般

近年来,鲜有见诸于报端,描述张国焘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



张国焘夫妇合葬墓

张国焘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由此也可见入乡随俗的影响之深，显然仅是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他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 DEC.9.1902—MAR27.1994。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国焘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那么，张国焘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国焘的身份，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褐色，全英文，上书字母 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国焘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国焘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时自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

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给力的精心设计与高明之举。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三顾茅庐”，去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西人 Black（布莱克）夫妇？西人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国焘夫妇合葬墓碑六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最为叫绝的是，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中文方块字？难怪来访的晋谒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国焘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人们只知有竖碑存在，殊不知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国焘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杨子烈去世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忽略的

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

走为上计

据现今可查阅的文献,早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出身豪门望族的学生领袖张国焘便在北大教授陈独秀的介绍下,与图书馆员工毛泽东握过手。多年后,毛还曾为此感叹“张国焘看不起我这个土包子”。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同会,张国焘被选为大会主席。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今四川小金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重大政治斗争。张深谙毛的作为,既是同党同志,又是棋逢对手,最后必有一场输赢。

遥想当年,张国焘有过关乎一生荣辱生死的两次出逃。

第一次是告别延安。他领导的红军主力在西进途中几乎全军覆没,侥幸逃生的部分红军将领,又相继被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污指为“托派”,遭到清算,所剩不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由此可见,张国焘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38年,张国焘借道去西安祭黄帝陵大典之机,告别延安,投奔设在汉口的民国政府,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真实的原因是王明给他带来死亡恐惧感。党史文献记录着: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第一领袖自居。张国焘曾多次挨过王明的整肃,对他表示冷淡,然而仍躲不过王明对他的刁难。当王明约张国焘单独谈话时,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这里指的李特曾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曾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王明这次大开杀戒,死在他的刀下的冤魂还有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三位红军高级将领,共计五人。他们皆为当年张国焘留学莫斯科列宁学院的同届同学,风华正茂的红军精英。

张国焘听到他最信任的红军将领们竟被处

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谴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当时的延安,已在酝酿筹备公审张国焘等人的党内斗争大会。

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2000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因果相报,大祸也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

但他这一走,导致他的众多红军部下受到极大的牵累,株连甚广,确实非英雄所为。倘若张国焘不逃离当时的困境,而是忍辱负重,虚心认错,留在延安,以及1949年后的北京,不知是否还能逃得过后来历次党内斗争的整肃?是否还能逃得过“文革”浩劫?

避乱于天涯海角

第二次是告别香港,远走天涯海角。1949年以后张国焘为避灾祸,从国内举家逃难到了香港,从此息影香江,住了整整16年,没想到在1966年世事又发生了沧桑巨变。当时,“文革”浪潮已波及香港,追杀张国焘的红卫兵大字报已贴满了中环、旺角一带的市中区街道,遂引得这块飞地也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知道明晨天亮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张国焘感到香港已非安全之地,呆不下去了,于是连夜决然出走,举家飞往加拿大。

从个人结局看来,张国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避乱于海外,最终寻找到了他栖身之地,身后也有一块宁静的土地。当年八宝山公墓及全国各地,被掘坟的红色先烈何止成百上千?让世人都看呆了。■

(作者为加拿大华裔学者)

(责任编辑 黄 钟)

“破四旧”的表与里

○ 米鹤都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的一页。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把它归咎于红卫兵的残暴。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破四旧怎么会成为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变对象,又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未出席。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毛泽东自己反而不参加。现在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外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与。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

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面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他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发生在1966年5月,而非始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动员”了第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第

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

国家机器的纵容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下，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等公安系统领导人也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因此，多数干警对破四旧持欢迎态度，甚至可以说红卫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很多干警开始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抄家就大规模地出现于京城了。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作用。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联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一位老师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



红卫兵抄家场景

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这表现出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背后的经济动因

1966年年底起，大量破四旧中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要求返回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8日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共10条，规定了10类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资本家在“文革”中被扩大化为阶级敌人，还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产主”列为阶级敌人的概念，也许是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产主被视为资本家对待，公私合营时其房产早已被改造过了。因此，这里的

概念理应是指小房产主、小房产出租者。但是，这批人在建国初确定阶级成分时应当被定为小业主，并不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中共的阶级路线，从来没有将小房产主、小业主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办法》中却将其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待遇。当然，可能为了避免被误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前缀。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现象。“坚持”意味着以前就“具有”，否则怎么坚持？但是如果他们以前不是阶级敌人，何来的“反动立场”呢？

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这些房产主如果以前不是阶级敌人，那么其反动立场只能是来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准确地说，就是对待破四旧、抄家和遣返的态度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类”，为何又会被抄家遣返？显然是与当年的住房紧张有关，从而导致对于收取房租、有剥削行为的房产主强行剥夺。第二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属于“黑五类”，怎样才能让红卫兵抄他们的家并遣返他们呢？这恐怕就应当归功于北京众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员会以及街道积极分子了。依据当年的理论，出租房屋的小房产主尽管属于轻微的、但依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渣儿”。其余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了。什么政治态度、反动言行、生活腐败、攻击“红五类”……那个时代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理由，也就构成了所谓的“反动立场”了。

另外，《办法》之所以强调了房产主，就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批量级的群体。他们即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名单上，也应当属于错抄、更是错误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们却成了抄家遣返的对象。当年的抄家遣返没有组织程序，不需要审批，也不是某一中学的某个组织可以做、别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做。说得极端点，甚至是三两个有红卫兵袖章的人一吆喝，跟上五六个人，就可以完成从批斗、抄家到遣返的全过程。说明这一点，也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之下实现经济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产主们遭到这样的打击，“黑五类”们的命运更可想而知。而且其打击面越宽，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就越大，这似乎是一种正比关系。当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

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因此，当年对抄家遣返热情最高的社会群体，恐怕倒不一定是那些红卫兵了。

《办法》的关键还在于强调了这批人遭到遣返并不准返回。但是不让他们回来在道理上又说不过去，于是给他们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帽子。“红8月”之后，那些被遣返的住户的房子，立即优先分配给了“红五类”的积极分子，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

另外，破四旧中被抄的家具、衣物等生活用品也均在1967年初前后，以极低的价格、以“抓阄”的形式卖给了出身“红五类”的市民。可以说，抄家、遣返除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原因外，内在的利益驱动也是构成破四旧迅速扩大成势不应被忽略的因素。红卫兵则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棍子和日后承担责任的债户。

舆论导向是破四旧迅速发展扩大的重要因素

《十六条》提出破四旧，倡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学生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到了破四旧以至打死人的“红8月”，《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中说到：“红卫兵上阵以来……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那一时期，这样的文章、讲话比比皆是。直到1966年9月17日，《红旗》杂志还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



“8·18”场景

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此外,这篇文章还学着当年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口吻,驳斥了那种认为红卫兵运动、破四旧糟得很的论调,实际把这作为划分革命与否的态度。不难看出,主导社会的成年人究竟要把红卫兵们引向何处。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不仅代表着中央高层对破四旧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和号令。

评王力关于破四旧的说法

我们再看看当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怎样说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认为,人们今天对毛泽东的态度产生了误解。他是这样解释的:“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相违背,不一致,不合拍”。“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的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的作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我跟陈伯达提过,我说‘四旧’这提法不科学,根据毛主席的思想,不应这样提。这口号很笼统,没有个界限。林彪的报告也提了‘四旧’,但他也没有叫人们对‘四旧’这样搞法。……林彪讲话有这提法,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论中也这样提了。林彪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号召破四旧,这讲话稿毛主席也看过,当时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大

的后果。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红卫兵8月20日第一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说好得很,新华社做了详细的歌颂性的报道。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不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次

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就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这段话,引导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毛泽东一不赞成破四旧,二反对打人,三打人现象一出现就开始纠正。而且,王力本人也不赞同破四旧,林彪虽然提了破四旧但并没有让人这样做。所以“文革”出现的破四旧、打人和毛主席的思想无关。

真是这样吗?

其一,“四旧”一词,首先见于《五一六通知》。这份纲领性文件也不代表主席的思想?另一事实是,林彪从“八一八”的讲话到国庆节的几次讲话,都是由陈伯达等代为起草、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再交由林彪念的。说毛泽东不主张、不赞同破四旧是背离历史事实的。

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并不一定赞同破四旧搞得如此天翻地覆,特别是转移了“文革”的大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王力的话可能是对的。但是说毛泽东不赞成破四旧,言过其实了。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破四旧的简报上批示:“已阅。(破四旧)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另一件是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写道:“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

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

吴德很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基本态度。

其二,把破四旧全面引向社会,固然像王力所言,主管宣传的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王力的话又很值得怀疑。“文革”前宣传口就是因为不贯彻毛泽东的精神,才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后,宣传口的新领导和继续留任的工作人员,还有胆量在这种极端敏感的问题上予以自由发挥吗?面对连篇累牍鼓动破四旧的文章,毛泽东即使不管不问也是一种态度。特别要指出的,上面引用的《红卫兵赞》,就是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重头文章。如果这不是来自最高层的精神,那么王力所言又出现了矛盾。

矛盾一,既然宣传不能自主,何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自主”地提倡破四旧呢?矛盾二,既然文章的精神不是来自高层,那么这篇文章为何署名“评论员文章”?矛盾三,哪怕就是《红旗》杂志自己的主张,王力总不能说这篇文章不代表他这个总编的观点吧?那么他怎么敢说他连“四旧”的提法都不同意,却还在9月中旬鼓吹破四旧呢?

其三,王力认为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开始纠偏,显然与事实不符。1966年6月北京的批斗会已经出现打人现象。北京大学6月18日打斗干部教师的事件已经很严重,北大工作组连夜向中央上报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刘少奇做了指示。但是,正是来自高层的指示将已下发的第9号《简报》撤销。这是哪里来的精神?谁又有这样的权威?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女生打死,此事当天被刘进和宋彬彬报告到正在参加中央全会的吴德那里。如果说毛泽东真有“一出现打人,毛主席就不行”的那种思想认识和言论,在6月到8月、乃至9月却没有从任何渠道传出来他的指示,哪怕是精神,实在说不过去。

相反,人们看到的是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要武嘛!”陈小鲁在受访时说: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

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

“君无戏言”。经媒体大加渲染,其后果不言而喻。毛泽东确实也说过反对打人的话。8月21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过“提倡文斗,不要武斗”,可同时他又说了:“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

其四,破四旧把打人全面推向社会,大面积的打人是破四旧的孪生兄弟。当时北京破四旧最大也是最核心的是抄家、打人的问题。要制止打人必须制止破四旧。可上引王力的话前面讲的是破四旧、后面讲的是打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这是两回事。

它给人的另一感觉,是毛泽东、林彪1966年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即在对打人纠偏。而林彪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都对破四旧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中央高层没有对破四旧正式纠偏,而且认为“做得对,做得好!”。“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红卫兵们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吗?北京市这期间打死了1000多人,毛泽东等人没有耳闻?他们不了解破四旧和打人的关系吗?

其五,“文革”中盛传是江青的一句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对打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话实际上倒是来自毛泽东的精神,江青不过学舌而已。江青1966年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是在(下转第22页)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 晏乐斌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

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

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凤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这

里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1959年9月17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

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工作组到这里来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其中,将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处决了事。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我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处长朱广臣立即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两位同志陪同我到

金沙县调查。金沙县的地理条件比湄潭县差一些。这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也是“五风”肆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县委书记赵广玉、县长王国民（彝族）不但紧跟省委，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将金沙县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县委办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赵广玉听说我们去调查死人问题，很紧张，他叮嘱这位办公室主任：不要讲得太多。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们便要求到平坝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调查。因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随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宋留友等3人，跟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叔成率领的省委工作组到金沙县工作了两个多月，认识平坝公社党委杨书记。杨约略地谈了他们公社饿死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个别访问和调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得知那三年饿死了8万多人，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送到金沙县大水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

动。1961年3月12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

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烂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握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

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中的悲剧

○ 杨崇诚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个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以言定罪。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择优。结果给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受命代笔获罪。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

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毛

泽东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

(作者为公安部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钟)

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道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随流签名获罪。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汇报情况获罪。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

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以隐私为据定罪。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被栽赃陷害。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荣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无端怀疑定罪。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

“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顶替名额。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按预定指标凑数。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无妄之灾。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军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血泪洒辽西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

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最严重的是饥饿。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

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回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

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燕山脚下的冤魂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1962年果树农场的空军难友劳动间隙休息时的照片

(1)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主席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2) 汪庆凯之死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3) 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4) 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箝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5) 杨静波之死

杨静波，原是空军第五速成中学政治教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在前所农场二队劳动。1958年年底，农场集中右派修建三队水库，任务是取土运土。劳动时，一大块冻（下转第80页）

听胡耀邦谈诗和民主

○ 张万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诗歌,作为文学领域最敏捷的轻骑兵,一举冲破十年的禁锢奔突而出。从1977年1月追思周恩来总理开始,整个诗歌界进入最活跃的创作期。1979年1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和《诗刊》编辑部在西苑旅舍,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有全国老中青三代诗人参加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会议一开始,诗人们就强烈要求思想解放的急先锋胡耀邦同志到会作报告。而刚出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耀邦同志有求即应。

1月19日下午,就是他主持召开的著名的中央理论务虚会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进会议大厅就发现:既无讲台又没有为领导人特设的座位,全场摆满了小圆桌和靠椅,大家随意就座。

不久,耀邦同志在作协领导人的陪同下快步走进会场,我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耀邦边走边说:“坐下!坐下!”走到我的邻桌边一个空位旁,将大衣一脱放在椅背上,随即掏出两盒香烟朝桌上放,便坐下端起茶杯喝一口茶润润嗓子,接着就开讲了:

你们这一行,我根本不懂。某种历史原因,把我推上宣传工作的前台,上个月18日报到,今天19号,一个月。看了同志们的6份简报和提出的问题,今天在9个问题上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请注意,不叫指示。个人意见,怎么叫指示?哪来这么多

指示!

一、人民对我们的要求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9亿多人口。建国以来,人民对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把生产好好搞上去,产品极大地丰富起来。什么产品?两种,一种叫物质产品,一种叫精神产品,我们这一行就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人类两种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物质产品劳动者需要精神产品,又提供精神生产的素材和原料。精神产品劳动者需要物质产品,又给物质生产者以鼓舞、力量和崇高精神境界的产品。两种劳动者是互为因果的,互相支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二、我们党领导文学艺术的根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精神生产,毛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这是个很正确的方针。可是我们有时候执行得好些,有时候执行得很不好,大家都吃了苦头。根本的经验教训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搞瞎指挥,自己不懂硬是装懂,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误;另一种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摧残精神生



1979年1月,诗歌创作座谈会与会人员合影(部分)

产,摧残整个民族的文明。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错误。但是,我们党确实不善于领导、指挥精神生产,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地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学懂精神生产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正确地指挥。当然,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但总要朝这个方向前进。现在,我们党既要学会搞“四化”,也要学会繁荣科学文化,这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任务。

三、三年来诗歌有了大发展,好得很。你们要把“四五”列为诗歌节,我大体上同意这么个意见。从“四五”开始,诗歌是又一次大发展,大繁荣。好在哪里?就是同党、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作品是不朽的。诗要画龙点睛,睛是什么?我赞成你们写诗要得出结论来。

四、创作的题材和形式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题材是无比广阔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事业是广阔的。不要轻易说“无限”,什么无限爱戴,白发三千丈也是有限的。延安时期,毛主席特别强调到农村去,那是那个时期的特点。现在的天地比那时更大,诗人要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到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去,到我们的事业中去!能不能到冷冷清清的山林中去?也可以去,为了冷静地思考沸腾的生活。到小天地去,是为了反映大天地。为了表现最高的精神境界,也可到最低的精神世界去一下。但光明与黑暗不能颠倒,人民喜欢的与反对的不能颠倒。

至于形式,我看是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人民最喜爱的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你来个七十二万变好得很。形式多种多样,万紫千红。但允不允许人民有偏爱呢?应该允许的,讲民主嘛,禁止人家有偏爱是不民主的。我也有偏爱,疲劳时爱听相声。第一,要允许偏爱,不允许是独裁。第二,不能偏废,这是“百花齐放”中的重大问题。

五、要不要审查?什么叫审查,审查叫鉴别。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逃不脱审查、鉴别的命运。比如松树,逃不了审查,木朽而后虫生;芦苇草逃不了风的审查,墙上芦苇草风吹两边倒;工厂的检验员就是审查。我们为什么怕审查?把作品、把人审查错了,审查者就要受审查,谁也逃脱不了。以后靠专家和群众路线来审查,多搞评议、评奖来区别作品的上品、中品、下品。最可靠的是人民群众,群众的公议,谁也逃脱不了。哪

个作品流传最广最久就是上等的。不以个人、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自己的主观为转移,是以千百万人民长期的爱憎为转移。

六、诗歌创作者可不可以组织起来?我看可以组织起来,叫诗歌协会?什么名字你们取,每个省都可以组织起来。但是不要搞官方非官方的。

七、发表和出版问题。印刷、纸张不够,诗没有地方发表、出版,这同国家底子薄、穷,有关系,只能一步一步改善,可以多搞一些诗歌朗诵会,诗走廊等。刊物尽量少赠送,我们这些当官的看不完,让刊物到群众中生根去。

八、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的风格问题。人民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要严格要求自己,对己从严,总会站得住脚的。任何时候对自己不放松,使创作精益求精,不以一次成功而自满,不以一次失败而丧气,百折不挠是最有出息的。对同行、战友要互相帮助,不搞互相轻视、恭维,好的就是好的,要讲真话,既不要捧场,更不要拆台。要写出高境界的作品,首先要有高境界的品格。

九、民主问题。民主问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为人们很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我们党是在被压迫中诞生的,打倒蒋家王朝推翻三座大山,都是为了民主。但是党内有些同志参加革命要求民主,当了官就不搞民主,败坏了党的民主,搞个人说了算,加上林彪、“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摧残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但是有少数青年脱离宪法,讲个人的民主自由,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搞示威游行,反饥饿、要人权,可能有坏人。但游行示威,首先是我们当官做老爷的不解决问题。其次,你游行示威好不好?生产、治安、工作秩序一打乱,“四化”不搞,大家都完蛋。华主席(华国锋)找我们开紧急会议,商量的办法是:一不抓人,二不点名批判,三是抓紧教育。■

(作者为新华社国内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黄钟)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

○ 熊先觉

自1952年7月开展的全国司法改革运动,是紧接着“三反”运动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之一,是新中国的首次司法改革运动。这次运动在中央司法部设立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从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抽调干部所组成,由最高法院委员会秘书长闵刚侯任主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王怀安任副主任,主持办公室的工作,我负责编写司法改革简报,是办公室的秘书,运动至1953年2月基本结束。

这次运动,首先学习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与1951年11月3日《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武装头脑。接着开展批判所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最后组织整顿,即在运动中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

在这里应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办公室的主要干部。主任闵刚侯是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重庆时期朝阳大学教授。多年来,他是沈钧儒老先生的得力助手,后来任过司法部副部长,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副主任王怀安一向崇尚民主和法治,抗战初期他是四川大学法学院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曾带领100多名爱国民主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被授予“延安模范青年”的光荣称号,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员。抗战胜利后他和夫人胡朝芝等又徒步从延安去东北,任当时东北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市法院院长。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委员、中共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

这次全国性司法改革运动的情况如何?

首先,一刀切清除了旧司法人员,一个都不留,违背了党的“区别对待”和“择优录取”政策。解放初期,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在这次运动前全国共有司法干部2.8万余人,其中就包括了留用的推检人员(旧法官和检察官)6000余

人,占总数的22%,他们大都做审判工作,在不少大中城市担任人民法院审判员,其中个别的属于反革命分子,应予惩办,但对其余大多数人员则应择优录取,即使不能继续当审判员,也可安排辅助性工作。

不仅如此,运动中还与政法院校系挂钩,开展组织整顿,有关教授一律不得开课,大都转业了,有的甚至还失业在家。

同时调进什么人呢?主要是转业军人和工、青、妇各界的运动积极分子。他们组成了法官队伍,但缺乏法律知识,有的还没有文化,更谈不上司法实践经验。这被看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一大收获”。

在社会上,也开展了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批判。究竟什么是“旧法观点”?是否读过法律、“一事不再理”等以及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保障人权之类的观点都属于“旧法观点”呢?什么是“旧司法作风”?当年狠批的所谓“坐堂问案”之类是否就是“旧司法作风”呢?可是不“坐堂”,又怎么能“问案”呢?这些批判否定了正规办案的程序规则。批判之后,还把人民法院的“传票”改为了“通知书”,把收票、押票改成了打条子,甚至有的人民法院还不用判决书而改成了填表,等等。这次司法改革运动,批判所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造成人们仇视法律的心理。

当时搞“一边倒”,采取“拿来主义”,学习苏联不顾国情地照抄照搬。如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所谓“同志审判会”,根本行不通,没人理睬,只好收场。还学习苏联设立铁路、水运等专门法院。至今还存在着这种部门法院。

而今,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司法改革方面还谈不上转型。有的地方长期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司法与企业不分现象,尤其是地方人民法院普遍地存在着地方化、行政化和部门化等问题,更谈不到实行“分权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 黄家南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自己确实没有参加过所谓“反团”,所以供认不出来。

后来,他们就采取串供的办法,请那些早已供认参加“反团”,写了“认罪书”,得到“解放”了的的同学向我透露他们供认的所谓“材料”。

为减少皮肉之苦,我也照他们提供的材料模式写了“认罪书”,这样才过关,并获得“解放”。得到“解放”后,驻都安高中工人宣传队还带我们(约40人)步行两天,到90多公里远的七百弄区弄程大队办一个星期的“受蒙蔽学习班”(其他所谓罪恶最严重的头头则被关在县文化馆,没有资格参加),听七百弄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蓝荣英忆苦思甜。回来后,又被继续关押审查。

据后来的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记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是广西“文革”中涉及面广、株连人数多的特大冤案、假案、错案。

制衡”原则和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等法律普世价值。1952年至1953年期间所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对这种现象负有一定的责任。

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我们办公室相当多的人员被打成“右派”,甚至有两人被划为所谓“极右”,一个被所谓“司法部反党集团”封为“军师”,另一个也被封为“干将”。这些“右派”被整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在这里还要说说朝阳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前身)。抗日胜利后,它由重庆迁返北

“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由来

1968年5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上报《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报告说,已捕获团长、副团长、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并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

这份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2月3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联,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5月20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求把侦破这一案件当作一个战役来抓,要指定专人,

平。重庆朝阳学院则改名私立重庆正阳法商学院,是朝阳大学迁返北平后新建的。凡在朝阳、正阳学过法律的人,都被扣上“六法堡垒”的帽子狠批恶斗。说起朝阳,在旧中国享有“北朝阳、南东吴”、“无朝(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是“法学摇篮”之一,它受害最大。

这些都是1952—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教训。■

(作者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黄钟)

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彻底侦破。

6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发动群众彻底侦破此案,开展所谓“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该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公告发布后,在广西全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风潮。

6月1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结合各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6月23日,《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六一七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的《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此后,“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逮捕关押和枪杀。

同日,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都安清查“反团”的经过

1968年7月21日,都安县革委会主任田长喜在县革委常委会上说:“现在的问题,对阶级斗争,有些反动的东西,还是弄不出来,反共救国的黑手,电台问题,还未具体弄出来,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应通过‘七三’布告,掀起对敌斗争高潮。”

8月17日至19日,县公检法军管会唐毓凤参加河池地区革委会召开的各县军管会主任和侦破组长会议回都安后,立即到高岭区去侦破“反团”线索。

8月29日晚,在县军管会召开的全县政法公安干警大会上,唐毓凤认定,发现高岭地区有“反共救国安民党”、“义和党”、“反共突击队”等反革命组织,在进行反革命活动。

所谓在高岭发现“反团”,是唐毓凤编造的第一起冤案。

高岭中学学生黄青健参加少数派(“四二二”),被多数派师生多次揪斗吊打。多数派为了把少数派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把黄青健拖去高岭街上看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的公告。在多次捆绑吊打、软硬兼施、刑讯逼供之下,黄招认参加了“反团”。唐毓凤得到这一材料后,就大吹特吹他侦破“反团”的经验。

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安公检法军管会向各区(镇)革命委员会、公安员发出《都安县公检法军管会关于在“文革”中发现61个反革命组织线索的通知》,通知说:“为了稳、狠、准地打击美蒋、苏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彻底地把‘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通通地摸出来,坚决将他们消灭……我会所掌握的各地反革命组织线索提供给你们……便于发动群众配合侦破参考。”

12月14日,都安县公检法军管会将“广西‘四二二’都安革命造反大军第一届代表大会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定为反革命组织成员的通知”(绝密)下发给各派出所、区公安员、县军管会各侦破组。通知说:“最近,侦破组搜出《广西‘四二二’都安革命造反大军第一届代表大

会代表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花名册》，经查对以后，证实那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反革命总后台覃向奇、黄汉祖直接培植的一批反革命家伙。……现将《代表大会的代表及第五期学习班的学员花名册》印发给你们……”。

据都安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资料记载：从追查“暗杀队”到后来的“反共救国团”，从上到下，从县到公社、大队、从政法公安办案人员到下面的民兵，都带有严重的派性，把不同观点的少数派和不同意见的老干部主观臆断地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来打击。所采用的方法，花样繁多。

第一、刑讯逼供。包括捆绑吊打，装进麻袋踢下楼，驱赶跑步等方法。

第二、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诱供。

一种是审讯人员事先把追问的内容写在笔记本上，故意让“受审”人看，使受审人照着招供。

一种是有意让受审者听到需要交代的内容，让受审者听到后照着交代。

第三种是指名问供。高岭中学黄青健被捆

绑吊打后，还不知如何交代反动组织名称，后该校老师韦俊带黄去看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六一七”公告，第二次审讯时，黄才交代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后再指名问供拼凑，黄便交代出“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都安纵队高岭支队”的名称。

第四种是拿追逼出来的假供词叫受审者照着交代。

第五种是组织所谓的“坏人”斗“坏人”以达到串供的目的。在旧文化馆学习班里的两兄弟吴祖浩、吴祖荣因“反共救国团”案被关，吴祖浩交代不出“反共救国团”的纲领，军管会唐毓凤采用所谓的“坏人”斗“坏人”的办法，让吴祖荣来斗哥哥吴祖浩，把“反共救国团”的纲领讲给吴祖浩听，这样吴祖浩就懂得如何交代“纲领”了。

这样造就的这起都安“反共救国团”冤案中，有17251人被揪斗，3341人被诬参加“反共救国团”，其中441人被迫害致死。在这起冤案中，被株连的亲属，则超过八九万人。■

（作者为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7、57733086、57733088；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高晶、文馨、伽悦（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人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人生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过弹指一挥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既有欢笑，也有悲伤；既有荣光，也有耻辱；既有宝贵经验，也有血的教训，留下的不过是日渐模糊的记忆。

作为历史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曾经刻骨铭心，曾经心潮澎湃。一幕幕、一件件，至今历历在目，难以释怀，成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心结。

把自己的人生轨迹、或重大人生阶段所产生的美好回忆以及思想感悟，如何世世代代传递下去，现在成了老人们的一块心病，不愿看到自己人生曾经的辉煌，随着将来的离去而长埋于地下……

把这一切忠诚的记录下来，著作成文字，留给后人，就可以世世代代流传，成为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专人代写、排版设计、出书，全程服务

贴心服务，关爱之至——您省心、放心！

24小时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08-8708

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咨询或登录网站查询详情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308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35038 57192223 传真：010-85785578

邮箱：bookzj@126.com 联系人：汪芳、顾娜、牛萍萍（编辑）

网站：<http://www.zuojia.com>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988年访美印象

○ 田纪云

1988年5月1日至22日,我率政府代表团对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三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代表团主要成员有外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国务院副秘书长袁木、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华秋等同志。在这里,我主要回顾一下访美的情况。

我对美国的访问是在访问墨西哥之后、访加拿大之前即5月8日至17日进行的,共10天的时间。访问是应当时的副总统布什的邀请进行的。1988年正是中共“十三大”刚刚开过,改革开放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的时候。“十三大”确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肯定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在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目标。在政治环境上更为宽松,文艺界,学术界,知识分子更为活跃。这时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寄予很高的希望,也存在相当大的幻想,认为中国有可能逐步向西方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靠拢。这时的中美关系空前友好,有人称之为“蜜月时代。”美方对代表团的接待隆重、热情、友好。

5月8日晚,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齐头并进。美国人十分赞赏你们的决心和勇气;并祝你们在完成现代化任务和人民生活水平过程中取得成功。”5月9日晚,布什副总统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布什副总统说,“美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不论美国今年大选的结果如何,对华友好都将是美国共和党与民



1988年5月,田纪云会见美国总统里根

主党的一致政策。”5月10日上午,里根总统在白宫会见代表团,他先与我个别会见,然后大范围会谈。会谈时他说,“美国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并对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充满信心。美国对华政策的坚实基础是只有一个中国,这一政策得到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广泛一致的支持。”又说,“我们高兴地注视着去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台湾海峡局势的新发展,欢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交往。这有利于缓和海峡两岸的气氛。我们希望这一进程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美国将努力促进这种发展的环境。美国的这一政策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从他们的讲话,可以看出那时的中美关系是何等之密切友好。

访问中卡卢奇国防部长、贝克财长、黑格将军、维里蒂商务部长、尤特贸易代表都分别与我会见,维蒂里商务部长还与我共同主持了中美商贸联委会开幕式。访问中还会见了美许多大企



1988年5月，田纪云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

业家、朝野两党人士和各界华人领袖。12日中午美中贸易委员会举行午餐会，邀请200多名经济界知名人士参加。席间除我发表讲话之外，与会者纷纷提问，诸如沿海发展战略、对合资企业的政策、金融保险业是否对外开放、人民币可否成为可兑换货币等等问题，我都作了详尽回答。12日晚，美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会见并宴请代表团时也邀请了许多美政要和大企业家，我发表了即席演讲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受到热烈欢迎。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5月10日下午，布什副总统与我一起乘车由下榻的宾馆前往白宫会见里根总统时（同车的除翻译外，还有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行车途中布什突然问我：中国青年对美国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多数中国青年人对美国印象都是好的，他们羡慕美国的繁荣和生活水平，但我认为他们对美国缺乏全面了解，他们对你们国家的阴暗面如吸毒问题、艾滋病问题、家庭解体问题，知之甚少，有点盲目地崇拜美国。不料，我讲完之后，布什伸出大拇指称赞我讲得好，讲得对。

在访美期间，除了到了华盛顿、纽约外，还特意到美国北部靠近加拿大的明尼苏达州考察了

美国的家庭农场。美国的家庭农场，一般有上万亩地的规模，夫妻两口经营，农忙时雇一两个工人帮忙。但机械化程度很高，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大小汽车俱全，农机具价值一般在200万美元左右。社会服务齐全，种子、肥料、防疫、销售等都与专门公司订合同，上门服务。在我国，由于耕地资源和发展水平的限制是难以做到的，但在耕地较多的地区，搞几百亩、上千亩耕地的家庭农场还是可能的。

顺便说一下，美国费城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纽约与我共进早餐，他们决定授予我该校名誉经济学博士，要我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到该校举行一个仪式，但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前往。1989年上半年，美方曾与中国外交部商酌，准备在中国的清华大学举行授予仪式，不久发生了“六四”风波，此事就未

再提起。

5月18日在代表团即将离美赴加访问时，我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记者发表了访美观感，现摘录如下：

记者：应美国副总统布什邀请，您5月8日到17日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美方对这次访问相当重视，接待热情，安排周到。访问期间，您会见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大企业家、朝野两党人士和各界华人领袖，参观了高新技术和农业项目，宣传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推动了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实现了出访的目标。请您谈谈这次访美的感想。

田纪云：主要有四点：

第一，美国号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恐怕还是名副其实，并非夸张。要讲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美国跟中国不能相比。但美国在短短两百多年时间，创造了雄厚的物资财富，灿烂的文化，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这是美国人民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的结晶。

我们国内有些青年人，来美以后只看到它现在多么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而往往没有思索美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怎样来的。要使我们国内的人民群众看到美国的情况，不是垂涎三

尺,而是励精图治,放眼未来,立足于干。要靠自己辛勤劳动,靠发展科学技术去创造未来。

我看我们国家只要沿着现在的路线走下去,小平同志设想的本世纪的目标和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国家不争气,又内乱,那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现在的美国社会,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我看来,美国社会也没有完全停滞,它还在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当然经济的起伏和危机是经常有的。

第二,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现在是处于稳定上升的阶段。从我这次接触的政界、企业界,直到一般工作人员,要求同中国友好,要求同中国扩大合作、做买卖,好像是人心所向。这股潮流同那种要卡中国、要限制中国的潮流相比,占压倒优势。

特别是在纽约举行的早餐、午餐、晚餐座谈会上,要求同中国扩大合作,要求同中国做生意的呼声,比较强烈。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找到门路了,另一部分人苦于不知从何着手。

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美国的华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养育他们的祖国怀有感情。其中既包括老一代,也包括近年来通过种种关系移居到美国的。他们有想办法为祖国办点事的愿望,他们也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在促进两国友好和经贸关系方面出点力。

现在美国的政界也好,群众也好,要求同中国友好,扩大合作,这是主流。对中国持敌意的,不希望合作的,不能说没有。两者比较,何者为主?从几天接触中,好像友好的潮流是主要的。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不管谁上台,在对中国的政策上没有大的分歧。

第三,中美之间合作的潜力很大。在一些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美国处于领先地位。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政府如放宽政策,估计美企业界阻力不会很大,企业界可能还会是促进美政府落实放宽政策的一支力量,在飞机制造、石油勘探、计算机、电子产品等领域的技术合作,如果搞得好的,都有可能在美国有所突破。

中国要实现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要实现现代化,贸易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入美国市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当然中国也是美国的市场。中美两国如果把优势结合起来,不仅是双边的,而且是跨国的,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得有耐心。因为几大角关系和政治上的因素,有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因此就失去信心,那是不行的,得有点耐心。而且看来得多渠道做工作,不要只面向政府。中国同美国的友谊真正要进一步加深,非从经济着手不行。如果我们真正抓住几家大公司,做好几笔大生意,而且做得很成功,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对推动整个经济合作产生巨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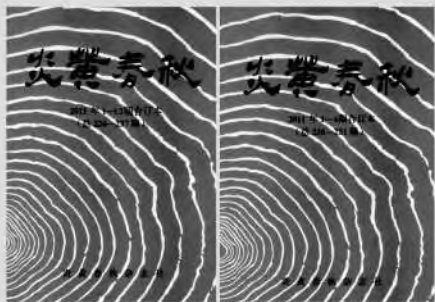
美国人人比较直率,办事比较认真,有敢于冒险的精神。

有的美国公司同中国做生意,并不是只看眼前,而且想到未来,有战略眼光,真正谈成以后,也真正敢干。■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炎黄春秋2011年合订本

最新推出



简装一册本 110元
简装上下两册本 120元

本社发行部是《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惟一正式发行渠道

合订本邮购免收邮费,订购者请通过邮局直接将款项邮寄本刊发行部。

务必在汇款单上填写清楚收件人详细地址、姓名、邮编、要求以及联系电话。

2009年、2010年合订本(均为上下两册,每年105元)存量稀少,如需要,请直接汇款购买。

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

○ 武健华

一、我专程赴北戴河安排非常时期林立衡的安全问题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这次会议,林彪在党内领导人的排列中上升为第二位。这就涉及对林彪的警卫规格问题。林彪的警卫工作,原先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应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为明确林彪处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派有关负责干部去同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办,听听她的意见。

叶群认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应由中央、军委两个警卫部门分管比较合适。最终叶就此去报告了林彪,林处的警卫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8341部队除北戴河原有的守卫部队,又从北京调去部分随卫部队,由姜作寿大队长带队,并派张宏副团长到北戴河主管这件事。

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了解的情况得知,原先林立衡并未随同林彪到北戴河,一直照常住在北京。直到1971年9月6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要她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以及为林立果选的美女张×马上到北戴河来,说要他们陪首长(指林彪)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前回北京。

9月7日上午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还有空军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处长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

刚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57号楼他的住地密谈。林立衡由此心情紧张,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林彪贴身警卫李文普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靠近他对他说道:“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

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林彪)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对林立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上要,我强行阻止能行吗?”林立衡见李这个样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林立衡又找到从总政治部调来在林彪处工作、挂名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谈。刘又同秘书宋德金商量怎么办。据宋德金说:刘吉纯把他拉到偏僻处,悄悄对他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动向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据李文普说:12日下午,我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办女儿参军当护士的事回到住地时,96楼的气氛就比较紧张,几个人问我到哪里去了?并称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这时,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一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我心中没有底,还是问她有什么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这事不好办。

12日晚饭前,林彪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礼,要李文普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接着说:“那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12日晚饭后,林立衡知道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正在林彪房里密谈。她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再到林彪门外细听。张恒昌回来告诉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话,一句是叶群

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8341警卫部队报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她自己带着杨森处长,穿过小树林,到了58号楼警卫部队值班室向张宏副团长报告。

林立衡跑得气喘吁吁地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

张宏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报告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总理。由此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藏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北戴河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北戴河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有利的条件是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生活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他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上车和北京站下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上,直接进入火车和离开公务车。在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林彪在侧

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等两人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当日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无事。

玉泉山,在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西。全国解放后,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这里盖了几幢平房,为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工作、开会、休养准备的。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进住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用餐。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上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陪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

二、参与清查林彪在北戴河和毛家湾的文件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我们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到北戴河的有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

和我三人。

我们是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的,当时林彪处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找他们接头,是由主管那里警卫的姜作寿大队长带我们到林彪住地96楼的。

为了准备党中央领导人去北戴河开会、工作、避暑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央警卫局就派人去北戴河开始经营。当时设置了一个小的机构,对外称“中直机关干部所”,对内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驻北戴河管理科。当时负责人是警卫局服务处副处长何明孝,他带领一批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勤杂人员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那里安置了二十多位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又经西柏坡随中央机关进城的红军老同志。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曾为党中央挑过文书档案,为中央领导人做过饭,饲养过马匹,做过大量的勤杂工作,为人民做过贡献。进城后因年纪大、文化低、身体有病等原因,不能继续分配工作,就被安置在北戴河,结婚成家,抚养后代,安度晚年。

何明孝在那里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设施工作。在北戴河海滨西区建设起中直机关避暑区。先后接管了旧社会外国人在这里避暑的“英国府”、“美国府”、“吴(佩孚)家楼”、“段(祺瑞)家楼”等若干楼房、别墅,进行房屋维修、道路铺设,完善水、电、通信设备及海滨浴场拉起的防鲨鱼网,并根据当时需要,又盖了部分平房。

1959年到1960年,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借北京建筑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在北京施工的队伍,在北戴河又修建了大会场、小会场、俱乐部、餐厅、电话总机、车库等公用场所。此后,又在联峰山下为林彪新建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编号为96楼,林彪就是从这里仓皇叛逃出境的。

我们进入室内,仔细查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厅、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柜橱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以至文印、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页、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林彪在叛逃时是多么慌乱的。

面对眼前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叶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

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的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地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驻96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件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北京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我们又把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中央办公厅。我们还在叶群用的保险柜里发现军队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等绝密文件。后来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几件绝密文件是叶群在9月11日,从毛家湾调来北戴河,准备把它带走的重要文件。

从某些信函中我们看到,我们军队中,有的高级干部的夫人,纯粹为了拉关系、套近乎、攀高枝,千里迢迢写信给叶群,恭维奉承林彪、叶群,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了,使人看了不禁心惊肉麻。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等,经我们清查后,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我们在北戴河十多天的清查任务也就结束了。

我们回到北京,已经是国庆节了。王歆因事换成中办机要局处长葛振基,国庆节我们没有休息就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大院分成西东两院: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所;东院是林办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除几间办公室外,文件、图书都在楼上。文件集中放在二层的一个大间内,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记、分类、编号,有序的分存在橱柜中。我们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印发的文件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印送参阅的各种文件基本上未动。只在日常办理的现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询异常的问题。对这样的材料,我们都是一个个筛过的。因为工作量大,要求急,我们不仅不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每天搞到午夜前后,在警卫部队食堂吃点挂面、馒头片、咸菜等,饱肚就可以了。

这时,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林彪专案组已经成立,专案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纪登奎和汪东兴。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我们拣索出来的文件,初时一件一件地送到专案组,后来

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其中不少是党内高层干部属于人际关系方面的材料。

我们在林彪处清查文件,时间久了,也看到、听到一些新鲜事。

奇特的办公方式

林彪同中央别的首长不一样,自己不看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电报等都由秘书选出来以后讲给他听。他则端坐在沙发上或在地毯上踱步。他一边听,一边手里摆弄着一盒精制的高级火柴。他擦着一根火柴后,立即将它吹灭,把刚熄灭了的还冒着白烟的火柴头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就扔在下边。然后他又擦第二根、第三根,地毯上、茶几上,他扔下火柴杆已有几十根了,然而他还继续擦。连在批件上划圈都由秘书代劳。这种办公的方式,在“林办”叫做“讲文件”。

“讲文件”有很多要求和规矩。选文件时,要选最重要的;有些可以积累起来,待材料丰富后再专题讲。讲文件时,只能讲大意,不能照文件念,如果照念据说林彪听后由于紧张而出汗,那就砸锅了。林彪听秘书讲文件,都是由内勤临时去叫,秘书不能擅自闯进去。讲文件,不要敬礼。林彪说:“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讲文件时间不能长,一天讲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庞杂的秘书班子

毛家湾内工作人员知多少?听起来并不算多:秘书有6人,林彪贴身警卫人员2人,医生2人,林彪内勤2人;叶群内勤3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汽车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二十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做诗及修改诗词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的(选美)、收集图书的、抄录整理卡片的、绘制图表的等,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借助图表学习,可以提纲挈领,加强记忆,比较符合林彪提倡的“走捷径”的一贯思想。至于后来把绘制图表弄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则要归之于叶群了。在一段时间里,叶群要求把许多学科的知识都反映在图表里。许多人分别在编写、绘制、裱糊,日夜忙碌着,简直在“林办”办起了一个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一次小组会

连续作业的小作坊。

林彪的卧室、书房挂满了字条

在林彪卧室大板床头部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卷装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自己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还有,林彪写给叶群已经裱糊好了的条幅: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据说后来查到,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了四条“克己复礼”。

1974年1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以及翻查卡片等,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林批孔用。

除此之外,林彪还根据他自身的“生活实录”,或从医书上翻到的,或从身边工作人员日常讲到的,用毛笔写了许多字条,横七竖八,挂满卧室、书房等处。

笑一笑十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吃鸡蛋会内热

吃芝麻可生黑发

喝茶叶会升高体温

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剑拔弩张的上下级关系

所谓上下级就是指叶群和她面对的那些工作



林彪和黄永胜(右二)、吴法宪(左二)、李作鹏(左一)、邱会作(右一)在一起

人员。叶群的为人,借用“林办”秘书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中的话说:归纳起来不外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好说假话、生活奢靡。

我目睹到她借着手中权力及“文革”混乱之机,大肆收掠图书、文物、组织学术班子,要人没完没了地抄写诗词、绘制图表以及无休止地“选美”等都可反映出她的这一秉性。

对于叶群,一般来说是在“林办”工作时间越长,对她了解越多,印象也就越坏。

叶群对工作人员的态度,正像张云生秘书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说的那样:我觉得太憋气,一个“首长”夫人,一个外界某些人帮助吹嘘得十分“谦虚”和“热情”的“林办”主任,竟是这样蛮横无理!

“你新来,还不适应。”老赵安慰我说:“这叫下马威,我们都经历过。你这还是小意思,我们碰上的比这还厉害,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有,你要做好准备。这确实叫人受不了,但有什么办法!咱们给首长当秘书,首长的地位非同一般,主任和首长联在一起,弄不好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我们忍一点也就算了!”

我刚才有什么错?主任发那么大的火,有什么道理?总得讲点理吧?

在主任面前,还能讲什么理?我们的经验是,不管她说你什么,你不能解释,不能和她争辩。你越解释、争辩,她对你越火,因为她认为你是不尊重她,不服从她。何必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老赵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虽然不能使我完全信

服,但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也确实不能不注意。久而久之,我也慢慢“适应”了。你叶群耍威风,我“惹不起躲得起”,避开锋芒,忍辱负重。真的,何必自讨没趣!

其实,张云生遇到的是一件不大的事。一天下午,赵秘书告诉他:等一会儿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来见主任,我去接待一下。你在办公室看文件听电话,办公室里千万不能离开人。

事情就这么巧!李讷来时坐的钓鱼台的小汽车,被叶群打发回去了,叶群把李讷留下来,想

和她好好聊一聊,然后用自己的专车送她回去。谁知李讷要走时,叶群的车外出加油还没回来。仓促间,赵秘书从毛家湾火速要了一辆车到人民大会堂应急,把李讷送回去了。这件事本可了结了,大家都从中接受教训,改进日后的工作就是了。可是,叶群偏要指责张云生没有管车子的事是错误的,是失职的,是临时思想等等,而张云生则认为这种强加于人的无理指责是无法接受的。

从许多类似事件看,这是众多工作人员一致的心声和共同应对叶群的良策妙方。

在毛家湾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到了1971年年底顺利结束了!我们清查以后,林彪处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楼去了。

三、清查处理林彪毛家湾的遗物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遗物。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汪东兴同志交代我把这件事抓一抓。

林彪在毛家湾的遗物,“九一三”之后,一直由负责林彪警卫的834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看管。现在要处理这些物品,少不了熟悉这些情况的同志。经研究,先后组成以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六中队指导员刘志升等同志参加的清查处理物品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组的人也有调整变化,但于仁堂一

直清处到底。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约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

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作卧室，两间作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室，还有一间“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

怪癖的林彪卧室

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满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沉。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卧室旁边，专门设计建造的“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大块进口的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

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的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6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林彪怕水，就连抽水马桶里的水声他都害怕，据说他听了流水声就要拉稀。这样林彪房间马桶的水就被封起来了。“林办”把侍候林彪、叶群生活的人叫“内勤”。林彪要方便时，“内勤”就在他睡的大板床中央，挖了一个圆洞，洞下安放便盆，每天林彪起床时，由“内勤”把板床上的圆盖拿掉，林彪就蹲在床上行方便，从不到厕所去。

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就放着一只比樟木箱略小的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乐音。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八只”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

在林彪书房中间，还摆放着一只大的蓝花瓷缸，里面插满一卷卷字画，就在我们移交前，工作人员还把字画放到书房的长地毯上展开，近距离

地观赏数次，大饱眼福，尤其是对《清明上河图》的那些生动描绘，更是牢记不忘。

贪婪奢靡的叶群卧室

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玻璃橱柜，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有古瓷瓶壶；有玛瑙翡翠；有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一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公尺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件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诡秘的林立果卧室

在叶群的卧床旁边，有一个床头柜，上面安放着一架红色的保密电话机。她经常紧闭着房门，和黄永胜打长长的电话。做儿子的林立果，便千方百计想要窃听他们通话的内容。在叶群的卧室外边一个隐蔽的屋角里，林立果另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林立果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无从查考。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帖耳。可是，林立果的如意算盘终究没有实现，这几盘被缴获的录音带，后来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成了黄永胜、叶群等人的部分罪证，也是他们一伙丑恶行径的最真实的自供状。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一架进口的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一千公尺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要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头，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

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个地方，接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林立果回来后，一按机

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录音。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玩意儿,所以类似这样的物件,后来都移交公安部技术部门参考去了。

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这里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睡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所以,他来来去去确实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除此之外,还有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处时,均保持原样未动。

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

(上接第64页)土塌了下来,杨静波被砸倒压在下面。死时年仅27岁。

(6)李德本之死

李德本系第八航校雷达教员,来农场不久即发现视力下降且日趋严重,请假求医,队领导认为他是借病逃避劳动,不批准外出。后来严重到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才获准外出诊治,结果查出脑部有瘤压迫视神经,随即赴京就医。在协和医院检查后认为治疗太迟,手术会有危险。结果1959年初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27岁。

摘帽之痛

在22年苦难过程中,曾在1959年至1963年先后摘去约110名部队右派的帽子。所谓的“摘帽”,对右派们是一场新的折磨。

当年摘帽标准是认罪态度好,劳动成果突出。认罪好的具体表现是要经常递交书面检查材料,对自己过去的右派言行有深刻批判,对其他右派的改造要有帮助行为。事实上当年谁也没有反党动机,想不通、感觉冤屈是普遍现象,要认罪只有昧着良心,编造违心谎言上交。再就是

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的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

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严格手续、亲自交接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事后,给汪东兴同志写了报告,汪看后又送请周恩来总理阅示。周总理最后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毛家湾林彪住地,最终于1977年3月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

(作者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在监督和批判其他右派时以激烈言行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是右派互斗的根源。劳动成果不仅与劳动态度有关,也与个人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巧有关,以劳动成果衡量态度是不全面的。定出这样的标准,实质是逼迫人们养成说昧心假话、喝他人血活自己命的兽性。

即便摘了帽,绝大部分人仍在基层劳动,工资、党团籍和人的尊严都未恢复,所以基层领导又叫他们为摘帽右派;1963年在右派学习班结束时,有两人平时说了两句真话,如说了“我们摘帽,除非等毛主席死了”即被拘捕加罪判刑,另一人重新戴帽被送去劳动教养,有12人仍戴帽送黑山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在未摘帽右派中,张景岩是条值得一提的硬汉。他1949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被划为右派后,偕60多岁的老母同来农场,但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从不交检查材料,一直戴着右派帽子在前所和黑山农场劳动了22年,1979年获改正,1980年才回北京。■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空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干事)

(责任编辑 黄 钟)

苏联灭亡的六个原因

○ 高 放

201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灭亡20周年。人民出版社适时出版了我的第10本新文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书中收入我自1951年以来发表的关于苏联问题的66篇文稿，共55万字。我认为苏联能够兴起、兴盛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有四大原因。第一，有艰苦创建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第二，共产党善于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第三，党能依靠群众适时掌握政权；第四，党能依靠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可是苏共为何只掌权74年就垮台了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决不是因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几个领导人的错误就能摧毁苏共和苏联的，而是有深层、深刻的原因的。我在书中细述了以下六个远因是如何逐步演变为近因的，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要竭力巩固政权，并且依靠政权逐步完成过渡时期的各项任务。首先要建设先进的工农国家政权，大力增加生产力总量，大力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大力逐步全面改造旧社会，不能急于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可是苏维埃国家在1918-1920年三年内战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外战中却急于把战争时期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措施。如不用货币，实行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取消市场，把农民的余粮都征收上交国家等。这样到1920年战争结束时就引起工农大众不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农民“拥护苏维埃，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列宁当即于1921年改正过“左”错误，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恢复货币流通与市场交易。这样苏联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23年列宁临终前还口授箴言，强调要完成新经济政策所承担的过渡时期的诸多历史任务“需要整整一个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

也要一二十年。”可是在列宁说这些语重心长的箴言仅仅六年之后，在欧洲革命推迟、中国大革命失败、国内生产力依然落后、工农关系紧张等很不利的情况下，斯大林却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急于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用行政命令手段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到1936年苏联宣布结束了过渡时期，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实际上苏联只是建成了生产力方面低标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歪标准的社会主义，给苏联社会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很深的后患。正是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超前的生产关系变革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二，共产党成为全国唯一执政党后，要保有长期持续执政的能力关键在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党的领导人决策失误和作风败坏，一旦出现问题也能依靠党内民主及时妥善解决。为此列宁创立两项重大制度：其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定下的规矩，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把党代会作为党的权力中心。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权力中心。在党代会上凡有不同意见中央决策者可以在大会上作副报告或者提出批评意见。党代表真正是由各地方组织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会上就党的重大方针进行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多数决策如果不当，通过实践检验，由下一年度党代会重新审议，及时改正。其二，从1921年起设立中央、地区和省三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各级党委是平行权力机构，其职责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此外列宁还采取清党措施，以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1年第一次清党，经党组织审查，就有

159355名不合格党员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可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这两项重大制度都被斯大林破坏了。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例如1939年开十八大,1952年才开十九大)。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总书记个人成为党的权力中心。从1930年十六大起,在党代会上充满对领袖的歌颂,不能真正自由民主讨论党的决策。1934年以后中监委改为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其职责是监督各级党委是否执行中央决定。清除不够格党员的清党变成为对被认为不忠于领袖的异己分子关尽杀绝的大清洗。斯大林时期被处决、囚禁的干部达370万人之多,约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苏共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由民主政党开始变为极权政党,使得党内外都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正是过“左”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一个大矛盾。

第三,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因为他有四个缺点:“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列宁还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的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的原则,其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比,差距不得超过五倍。由于沙皇封建专制制度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促使后来斯大林逐步背离了列宁确立的上述政治制度和原则。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加深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等。斯大林开始推行高薪特权制,到

20世纪30年代中期高低工资差别已达30倍,50年代初期达50倍,70年代进而相差100多倍。正是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最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这个官僚集团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二大矛盾。

第四,要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才能促进多民族联盟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沙俄帝国没有海外殖民地,却是“民族大牢狱”,残酷剥削压迫国内各个非俄罗斯异民族。列宁在革命前高扬民族自决权大旗,打倒沙皇专制统治后主张由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十月革命胜利后,愿意分立者成为独立国家,如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大部分愿意留下的各民族联合组成联邦共和国和共和国联盟。1918年制定第一部宪法时国名定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为便于克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922年苏俄在国名中删去“俄罗斯”,改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可是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实行过度中央集权制,各异民族的自立自治权力备受限制,大俄罗斯主义依旧盛行,多次开展批判、清算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唯独从未切实有效反对过大俄罗斯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占据主导地位。1939年苏德签订密约瓜分东欧,1940年斯大林又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用策动内部革命方式重新并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口出现少数叛徒、内奸硬把几个异民族全部迁徙异地。正是斯大林时期加深的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异民族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的第三个大矛盾。拖延到1991年,民族矛盾的激化成为苏联解体、灭亡的导火索和引爆点。

第五,不发达国家首先探索社会主义之路,筚路蓝缕,异常艰辛,必须经常总结实践经验,及时调整政策,逐步改革体制,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活力。只有改革才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重要动力。列宁从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的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否定市场到肯定“以市场为基础”的转变,就是生动的实例。列宁在临终前《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郑重提出“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如果不

实行这种改革……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列宁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实行党政分开,扩大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防止官员特权,强化人民对领导的监督,坚决克服官僚主义,根本改造国家机关,厉行法治等很多内容。后来斯大林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官员特权制、控制选举制等,使得苏联社会缺失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使得政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进行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表面上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实际上依然承袭斯大林的体制。总之,沙皇封建专制的深远影响以及对极权和特权的贪恋使得苏联几任领导人长期拒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死路一条,终于导致苏联灭亡,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被人民永远抛弃了。

第六,不发达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理应对外开放,善于与发达国家和平共处,尽可能汲取发达国家的各种现代文明成果,又必须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污秽的侵袭。列宁于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提出的名言公式是“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说到做到,良策兴邦。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伊始,就把国家资源和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引进资本、管理、技术、人才,以加速发展生产力,达到互利双赢。从1921—1926年度,苏维埃国家与外商签订合同达135项。1927年以后逐步减少。1929年斯大林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1930年苏联政府废除租让制法律。20世纪30年代苏联基本上是关起门来独自一国搞建设,与西方只保留有限的贸易关系。“二战”后社会主义已由一国扩展到欧亚十三国,苏联更是长期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处于冷战对峙状态。斯大林更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搞两个平行市场。随后苏联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60年代美国带头掀起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新科技革命浪潮后,苏联愈益显得落后。到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对西方转向开放,但是不重视引进先进科技与管理,多次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不断退让,未能防

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到1991年终于垮台。实践证明,优胜劣汰,不开放或者开放后未能在发展科技和生产方面迎头赶上,势必因滞后而被淘汰。

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建成,可以说是开路先锋的试验、试错进程。上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三大矛盾和三大缺失,本来可以通过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大致取得共识,既坚持又发展马列主义,既维护社会主义又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革除旧模式、旧体制的弊病,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使社会主义经过凤凰涅槃得到新生、永生。可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几任领导人因迷恋极权与特权,沿袭旧模式、旧体制,一再延误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苏联终于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这时党内高层形成三派,分别提出三种对策: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固守有严重弊病的苏联模式,拒不进行重大改革;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温和派要把党改为社会民主党,转向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要取消共产党,转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这三派三种对策方案都不能对症下药治好苏联的重病,最后终至苏联于1991年8~12月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可见苏联是自我葬送的,而不是被外敌灭亡的,也不单纯是被西方和平演变的。这令我想起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名篇中的警世恒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所以他才认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这位大文豪颇有辩证唯物论思想,他能认识到人民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所以他才认为:楚、燕、齐、韩、赵、魏都是因为不关爱其人民未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而自灭的,而不是被秦国消灭的;秦国统一天下后,照样不关爱人民,所以最终也被人民联合起来推翻了;秦人来不及自我哀伤,却是由后世人去哀伤它,后人哀伤它而不引以为鉴,这就使得后世的人再哀伤现在的人。由此可见,当今切实明鉴苏联兴亡之道,是何等重要和紧迫啊! ■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钟)

违心的报应

○ 何琼玮

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11期上胡治安先生写的《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一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读再思，一阵阵自责和良心的拷打油然而生，我痛苦地回忆着，反思着……

那是1957年7月，我在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期间，突然接到一个重要通知，命我参加“章乃器专案小组”。我顾不得会演中即将演出由我创作的温州乱弹（现为温州瓯剧）、长达200多分钟的六场大戏《高机与吴三春》，抱着对党无限忠诚，对反党分子章乃器万分愤恨的动机，急忙忙赶赴青田，采访撰写有关章乃器借回乡视察之名行反党之实的揭露批判文章。在途中，我也自问：章乃器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坚持抗日，拥共反蒋，建国后，在上海帮党克服经济危机，在粮食部部长任上，也是做出过贡献，怎么会是一个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呢？难道他是一个伪君子？因为世上的确存在着一些伪君子。这些疑问，均被我对党的忠诚与信任而释开了。

到青田后，我造访了青田县委、县人委有关负责人，说明这次来青田的采访任务，是搜集有关反党分子章乃器回乡视察的罪行。县领导指派邢副县长陪同我一起采写。先由县公安局提供章乃器于1956年6月间在青田视察的一些资料，然后按图索骥地随同公安局人员去小源等地走过场。我是遵循我国大文豪的名言——“有罪之人，言者有罪”的教诲，去撰写青田人民揭发章乃器的罪行。不一日，文章写好，主题是：“借视察之名，行反党之实”，副题是：“青田人民揭露章乃器罪行”，全文共分四节，即“章部长‘察访’，反动派吐气”、“大赞特务‘功绩’，为犯罪人乞怜”、“猫哭老鼠假慈悲，煽动农民投‘炮弹’”、“群众擦亮眼睛，一致声讨罪行”，共计1200多字。很快，新华社发了署名通稿，除中央大报头条通栏刊登外，省报也都在显著版面登载全文。文稿见报后，我收到了不少稿费，还沾沾自喜，沉浸在为党做了贡献的幸福之中。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我做党的驯服工具，揭发章乃器罪行见报的七个月后，即1958年的春天了，全国反右运动宣告结束时，

本单位20多人中，已划出包括二、三把手在内极右分子4名，反革命分子2名，而领导仍嫌不足，还要深挖。于是，我这条小鱼也在“补课”中被钓了出来。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上级领导考虑你在反右运动中表现良好，如揭发大右派章乃器罪行等，所以对你从宽处理，不批斗，不戴帽，但有个前提，你要揭发你们集团另一核心人物殷某某，还要具体罗列你们反党集团的大罪行。我当时大吃一惊，全蒙了，便问，什么大罪行？领导拉长了铁青的脸，说，那问问你自己，如复辟资本主义，如篡党夺权等都可交代。我吓得几乎瘫倒了，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好好想想。领导说，好，是要好好想想你的政治前途和你的家人。谈话结束后，我没有回家，竟到东南剧院去看戏。到午夜，我才回家，见单位里的反右健将坐在我屋里。他们见了，便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走了。我不解地问，你们等我？他们说，我们以为你自杀了呢！我说，我为什么要自杀。他们说，那好，那好，我们何时来拿你的揭发交代材料？我说，不要等，现在我说你记。于是，我像编戏一样编造了吴林叫我去民主党派活动，与党分庭抗礼；编造了吴林叫我去筹办资产阶级机关报等等“罪行”。他们听了，十分满意，临走时，对我说，明日是批斗你们集团的核心人物殷某某，领导叫你在会上揭发他，叫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于是，在那次批斗会上，殷某某交代了一些如党性不够强等鸡毛蒜皮的事。领导正色地说，殷某某不老实，负隅反抗，现由其集团成员何某某来揭发他的罪行。我便应声而起，说：殷某某，你是我们反党集团核心成员，你还不承认？话未落音，只听“砰”的一声，殷某某瘫倒了。（其实，殷某某早已调离本单位，到宣传部当秘书。）

当时，我为什么违心地瞎编罪行栽赃于人呢？除了奉命外，便是借机立功逃命。但是，命中有你的，逃也逃不了。没多久，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送到丽水林场劳动。从此，我被打入另册。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曾被变相监狱关过4次，短的1个多月，长的7个多月，关我的罪名繁多，先是说我是郑伯永黑线人物，后擢升为周扬黑线人物；为胡风分子叫屈，为彭德怀翻案。“文革”中，先说我为“走资派”摇旗呐喊，后又说我是勾结“四

人帮”的双皮老虎；甚至连蒋介石从台湾放来的热气球中的反动传单，也是由我接收发放的……

20年的漫漫岁月，使我这个从十几岁就参加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的少年，经短暂的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了，这是为什么？不能怨天尤人，只恨自己写了违心文，说违心话，自己酿制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下去。如果，当时我也像章乃器那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能跪着活”，情况可能不一样。更宝贵的，章乃器在批斗时说的那句话，对我来说，更是振聋发聩的名言：“我不愿意颠倒是

非以对人，也不能泯灭是非以对己。”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现实。我直到1979春天右派改正后，刚过知天命之年，接到老首长李铁锋的来信，叫我先学会做人，再学会革命。从那以后，我才在思想上稍有点滴觉悟，才觉得做人的真实意义，不管如何，决不能突破做人的起码底线。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了，再不能说违心的话了，再不能写违心的文了，我要说句良心话：“章乃器真不失为‘七君子’中铁骨铮铮真君子，而我这个斯大林所说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却是个脆脆软肋的凡夫俗子。”■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温州市文联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28.00	7.00
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	王 凡	36.00	7.00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窦应泰	3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	杨奎松	48.00	8.00
走出腐败高发期	高 波	58.00	8.00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陈天璇	32.00	7.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	46.00	8.00
黄埔恩怨	王晓华	38.00	6.00
国共往事风云录(全四卷)	尹家民	146.00	14.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净土	马亭瑶	2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五套)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目《档案》栏目组编	144.00	14.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兵团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尚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望九頌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中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代购代邮

《可操作的民主》 中国人要民主要了上百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血的代价。假如民主有一天真的来临，我们该如何拥有呢？我们该如何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我们又该如何尽到民主的义务？这个时代不可能截然地分为没有民主的黑夜和拥有民主的白昼，在夜与昼之间，如果我们不进行学习，未经培训，那么民主的曙光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张立宪对本书的评论。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那一场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本书将带你回到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底：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生百态，一个个知识人群的命运磨难……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这是一段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更是一段民族的命运史。

《我的母亲杨沫》 一位母亲的真实一生；一个女作家的里里外外；一段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一组巨变时代的百态写真……本书直击人性，讲述一个真实的母亲，写出了造成亲情泯灭、母性淡薄的原因；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后的影响。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

《烙印》——“可以教育好子女”的集体记忆 1949年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他们带着屈辱和创伤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被施以暴力或遭受凌辱；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使他们因家庭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历尽坎坷……

本书分别记述了他们不同的身世故事，表达了对抗遗忘的集体意志和社会变革的共同渴望。

《苏共亡党十年祭》 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

○ 侯宜杰

我在拙著《“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的前言中写道：“过去我对义和团从未做过研究，在论著中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人云亦云，不作他想。”这里所说“人云亦云”，表明我过去亦曾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前几年考察了相关的资料和论著后，我的观点随之改变。

一

表面看来，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确实充满了反帝爱国精神。但判断口号的真假，不是看其说得如何动听，主要是看其实际行为。在中日战争和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时，见不到他们抵抗列强武装侵略的影子；在八国联军之役之前，他们也从未将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列强，例如把列强的势力从割让的领土上、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中驱逐出去。其所从事的贯彻始终的“灭洋”活动并非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打洋教。

义和团如何打洋教？有关记载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仅举几例。

1899年11月至12月，团民抢劫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十几家。其中勒索教民赵蓝田、郝丙义两家京钱40吊，徐长明、李达两家银40两，宋彦臣家京钱20千，王鸿庆等6家银83两、京钱41千，王京坤等6家京钱120千，李秉贵等3家京钱120千，马存盛家银80两，曹文霞家京钱25千。抢劫教民郑继先等3家钱文、衣物，牵去牛马，砸毁器具，烧毁郑继堂家草房3间；朱宴阶、朱永玉两家粗重器具；李公堂家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烧毁房屋10间，掳去其父与弟，用京钱20千赎回；丑玉福、丑学礼两家粮食、衣被，牵去驴头，并将丑玉福掳去；陈大礼等7家粮粒、衣物、器具，烧毁房屋4间；李王氏家衣服、粮粒；李玉安家衣服、耕牛，用银赎回。抢勒

陶李氏等家。抢掠平民郑继清等4家粮食、衣物；孔兆凤、孔兆吉、关禄兴、魏贞银、房庆台5家钱文、衣物，砸毁器具，并将关禄兴之弟捆绑，逼去银两，牵走魏贞银骡驴；刘存榜家车辆、衣物、器具，掳去其弟，勒令用银200两赎回，殴伤工人张希苓等。勒索张立伦家银80两。抢勒马庆荣等家。1900年，团民声称赵蓝田、赵希功曾习洋教，将2人杀死。声称平民曹文贵习洋教，劫去其家衣物、钱文，房屋烧毁，并将其绑架，勒令用钱赎回。抢劫平民金云凤家。《长清县志》记载说：“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索，河西被害者不计其数。”

直隶一些地方，“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青县团首王之臣率万余团民进入沧州，“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

北京“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

天津的团民“初犹勒民供给，并索官饷，久之众谤沸腾，不能自立，乃欲示威于民，杀戮日甚。……旋以示威不足以充囊橐，乃肆意抢掠。”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时，依然“抢掠商家，勒索财贿。”

义和团为何要打洋教？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鄙俗的贪欲”就是对义和团“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索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团民打洋教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时有大量并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还有官署、官员;其行为就是抢掠、勒索、敲诈钱财,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粮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连犁、磨、锄和锅碗瓢盆等粗贱之物也在抢掠之列。绑架人质更是为了勒索赎金,不遂所愿,则“撕票”继之。焚烧杀人同样如此,“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以焚杀为敛财之具”。用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的话来说,就是“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

义和团头目们就是以“发洋财”诱惑煽动团民跟着他们行动的。景州的义和团在各种旗帜上都写着“助清灭洋”,而实际的动员口号则是“打洋人,发洋财。”拳首刘胜先也以发洋财动员同伙:“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指教民)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张三等人供称:他们这一股义和团分立红、黄、蓝色旗帜,旗帜上写的是“保清灭教”,真实目的则是“练成出外抢劫,得钱分用。”山东大刀会的头目在群众中公开扬言打洋教就是为了发洋财:“咱羊山的穷哥儿们不要怕,咱们是占团地的,肉肥汤也肥,我们吃肉,大家也能喝汤。”团民也是为了“发洋财”跟着头目们行动的,如通州坛口镇的团民就集体“公议,定要把本村和贾家疃天主教人完全灭尽,均分他们的财产。”更有许多头目和团民供认,他们打洋教就是为了掠夺钱财。

最著名的张德成也最贪婪,“初在居民处苛敛,以作用度,次则蔓延四处,又在河道私设关卡,凡过往船只,肆行讹索,否则以借查奸宄为名,肆意劫掠。”他到天津并不是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觉悟,而是更加疯狂地抢掠。即使在清军与联军激战之际,他仍率人将三井洋行抢掠一空;将萨宝实洋行掌柜及其兄弟子侄9人擒去欲杀,经人说合,罚银1万两,才饶他们一命;又将仁记洋行抢掠一空,擒去伙计7人,罚银5000两。天津陷落前夕,他“亟席卷所有逃去”。其后仍然疯狂地聚敛财富:“每率众拳匪向各号讹索银钱,或数千两,或数百两不等,有不从者,则指为奸细,焚杀抢掠。”最后终于因为贪得无厌,勒索巨款,被王家口镇的绅民乱刀剁成肉酱。曹福田也参与抢掠了天津各洋行和恒庆

钱局。

团民最恶洋货,但“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何以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惟一对象。”为了发洋财,团民在战场上也拼命争抢敌人故意散布的洋钱及其他物品,不顾丧命;向逃难的人们出卖“护照”;有时各坛之间大打出手。

团民拼着性命抢掠得来的钱财用于何处?当然都私分肥己了(笔者仅在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一个团民说过把抢来的、穿不完的鞋子分给村里的穷人)。一些团民的供词证明了这一点。如大头目朱红灯等供称:1899年11月,他听说山东巡抚毓贤不咎既往,令他们解散,“遂将连日所得银钱,按人均分,拟暂分散。”没隔几天,他就“因分赃不均,被同伙砍伤头颅数处,并身受枪伤二处”。拳首邢兆陆供认:先后抢劫11家教民,杀害教民2人,绑架3人勒索。所劫衣物、粮食、牛马,“分别存留变卖,得钱分用。”拳首李从善供认:“抢得钱物,用车载回俵分。”大刀会头目陈萌雪供称:领人强讹教民、平民,“所得钱文,均先后俵分花用。”



义和团拳民

当时直隶普遍流传着一首歌谣：“义和团，快上法，瞅瞅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北京流传着一首童谣：“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这些均反映了社会上对义和团掠夺财富最直接最本质的认识。甚至连团民都直言不讳，不以为耻，公然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

正因义和团所从事的活动就是抢掠钱财，大饱私囊，那些饥饿穷困的农民见他们发了大洋财，便眼红起来，纷纷加入到义和团抢掠的行列。“乡农见村人自贼中归者，卤掠所得，囊橐甚丰，相率辍耕从之。”

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即使极力庇护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也无法掩饰，他曾亲自提审大头目朱红灯、心诚和尚及于清水，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匪首”，“胆敢纠胁人众，抢劫各处教民财物，放火杀人，波及平民，复抗官拒捕，伤毙勇丁，实属形同土匪，不法已极”，将他们斩首示众。

一些盗匪闻知义和团“何人打死洋人、教民，其财物均归何人所得”，也“起意假冒拳民，搜杀教民，得财均分”。这又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义和团的性质。

只看“灭洋”的口号，不去正视或故意回避大肆烧杀抢掠这一最基本的事实，自然看不到义和团的真相和本质。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用法律遏制人们与生俱来的贪婪和私欲，维系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正常社会秩序。除了野蛮社会，从无认定烧杀抢掠无辜人民是正义的文明国家。决不能盲目推崇暴力，对非法的暴行一味赞扬。

二

肯定义和团打洋教就是“反帝”，其前提只能是被义和团烧杀抢掠的教民和平民均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否则，“反帝”便无从谈起。被烧杀抢掠的平民并非帝国主义的走狗，大约没有异议，下面专论教民。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中国的基督教徒有 80

余万，多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他们入教的动机各种各样，其中确有坏人。问题不在于有无坏人，而在于坏人在全部教民中有多少，是否均罪恶滔天，理当受诛。

考察史实，绝大多数教民皆为安分守己的良民。理由与证据如下：第一，184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有 20 多万人，此时非但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教民反因政府禁教而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代一代秘密地传下来，可见他们并不是企图依仗洋人的侵略得到特殊利益和欺压平民的坏人，均为虔诚的信徒。第二，据《清末教案》所载 1842 至 1861 年各省封疆大吏 8 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发现教民有不法行为。第三，广大教民是爱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如中法战争时许多教民站到了反侵略的爱国军民一边。第四，许多地方的教民皆能与平民和平相处。这说明教民没有劣迹，融入了平民社会。第五，教徒中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革派以及同情他们的先进人士。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民教纠纷，从法律角度看，绝大多数属于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或口角微嫌，属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问题。笔者或许孤陋寡闻，尚未发现教士教民无理杀伤平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等等刑事犯罪。对做了坏事的教民，也应看属于什么性质，不能统统视为“反动”；即使“反动”，也未必罪该至死。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肯定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正义，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以直隶一省来说，据总督李鸿章奏称，全省被杀害的教民“多至数万丁口，所毁房屋多至数十万间。”有学者估计约有 2 万教民被杀。但从未见哪一位论者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被杀害的教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均罪该至死。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除了 1899 年 12 月卜克斯遇害外，山东的洋教士在袁世凯的极力保护下未有一人丧命；直隶的洋教士死亡人数未见到准确的统计，估计不会超过 20 人。而两省教民被杀害的却有 2 万多人，此外尚有无法统计的平民、回民和官员，财物被抢掠焚烧的人更多。事实说明，义和团打洋教或“灭洋”并非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烧杀抢掠无辜的同胞，这一场斗争几

乎可以说完全是在中国人民之间进行的,怎能称为“反帝”呢?如果称作“反帝”,这里所指的帝国主义显然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中国被杀害抢掠的2万多教民和与帝国主义毫无关联的无数平民、回民和官员。

基督教不是侵略者的宗教,传教士不等于侵略分子,亦未主动拿起武器杀害中国人民。不分好坏地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亦称不上“反帝”。

至于抗击八国联军,首先应该看到,义和团原先没有预料到打洋教会招致列强出兵干涉,没有打算同洋兵作战;其次应该看到,战争开始以后,绝大多数团民仍在到处打洋教,没有投入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再次应该看到,投入战斗的一小部分团民也没有做到真正抵抗(参见拙文《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在清军与联军激战之时,仍然烧杀抢掠。总之,贯彻运动始终的是众多团民参与的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打洋教,不是抵抗联军;少数参与抵抗联军,并非头目们的初衷和主要目的,亦非运动的主流,并不影响对运动整体性质的认定。

认定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遵循的是这样一个逻辑推理:列强是侵略者,派出的传教士是侵略工具,传教士吸收的教民都是“洋奴”、“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反过来,烧杀抢掠教民,就等于反侵略、反帝。

这个逻辑不是根据大量的审查过的历史资料得出的正确抽象,而是将个别或少数例子视为普遍现象,以偏概全,得出的错误抽象。

洪秀全是在鸦片战争后接受洗礼的基督教信徒,并依照该教教义和仪式创立了中国的洋式宗教拜上帝会,广泛吸收教徒,领导起义,占据半壁江山,与清政府对抗。

孙中山15岁开始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17岁加入基督教,是个笃诚的信徒,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他自己曾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教徒者实多。”仅他领导的兴中会中有明确记载的基督教徒,即有陆浩东、区凤墀、郑士良、左斗山、王质甫、何启、赵明乐、赵峰琴、苏复初、苏焯南、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吴羲如、练达成、宋少东、毛文明、黄旭升、邝华汰诸人。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乙未(1895

年)九月广州之役,大得其力。”“庚子(1900年)九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之役,参加的……均属基督徒。”赞助革命的传教士和教徒更多,不少教堂和教会学校成为革命机关。

按照上述的逻辑推理和思维方法,若说拜上帝会、兴中会、同盟会均是由基督教创立并领导的,教徒都是革命者,为太平军起义和辛亥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基督教非但不是从事侵略活动的宗教,反而大大有功于中国,亦言之成理。孙中山亦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士有功于革命,他在1912年说:“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

洪秀全和孙中山笃信洋教,与义和团的“灭洋”不共戴天;孙中山的“排满”和洪秀全要诛除的“满妖”,同义和团的“扶清”水火不容。如果说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是值得称赞的反帝斗争,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时就该被处死。因为他不仅笃信洋教,而且在1900年夏天领衔致书香港总督,“呈请助力”,“平匪全交”,即请洋兵帮助剿灭义和团,中国允许列强“分沾利权”。其后也一直争取列强的支持,主张保护教堂、教民,是个地地道道的“二毛子”、“洋奴”、“汉奸”。若论“反动”和“罪行”,不知要比一般教民严重多少倍。

可是,某些论者大讲特讲团民烧杀抢掠教民正义,却对洪秀全、孙中山的洋教徒身份讳莫如深,反而歌颂他们为起义和革命领袖。评价同一性质的信奉基督教,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不能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搞实用主义、机会主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本刊启示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美国的党争

○ 董郁玉

美国政党之间、政党内部的斗争,似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党争。但其实可能并非如此。

“最激烈”的印象,既是美国党争——无论是政党之间,还是政党内部——公开进行的结果,也是美国媒体自由报道的“结晶”,当然,更是美国事务——不仅是党争——成为世界事务的现实衬映。美国党争的结果,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调整,也常常关系到全球的利益调整,因而总会引起美国以外的人们的关注。

公开性约束了党争“坏的一面”

最能体现美国党争的地方,无疑就是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了。自从共和党出身的总统尼克松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后,美国的党争也和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此后,在历任总统的竞选过程中,中国问题总会成为美国党争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水门事件”,让身处“文革”当中的中国人开始知道什么是美国的党争以及党争的后果。从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房间的一个窃听器被发现起,到号称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黯然辞职,美国式的党争,让通过“文革”这样波及全中国的政治运动,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中国,有了一个可资进行比较的党争样本。

与世界所有地方的党争一样,美国的党争是权力之争、政策之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由于权力所代表的利益“体量”巨大,所以,党争的残酷程度也确是世上少见。不过,美国党争的激烈也好,残酷也罢,都必须公开地进行,都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来我往”。

公开进行的党争,实际上就是斗争的双方或多方公开进行政策辩论,公开摆明利益所在,公开进行政治动员,从而凝聚支持力量的过程。同

时,这个过程,也是观看党争的人们分辨斗争背后的利益,比较党争各方的政治光谱,进而确定各自利益代言人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公开的党争,就不会有经过公开承诺因而值得信任的政党利益范围,也不会有来自因公开而产生的实现利益承诺的压力。

在上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因为涉及人群广泛、受益人口众多,所以成了其在党争中争取民众的“吸票”利器。但是,在取得此一轮的党争胜利之后,奥巴马并不敢以国会反对势力强大、尤其是国家财政难以负荷而对此食言。因为党争胜者取胜的根据,就在于民众的支持。

由此可见,党争的公开化,逼迫各自政党或党内斗争者都必须“拿出”自己“好的一面”,去与其他政党或同党内的斗争者竞争,以争取支持者,扩大利益群体,在斗争中胜出。在公开进行的党争中,斗争的公开性本身,就是对斗争各方的一种严格的道德约束。公开性加之媒体的传播,既约束了斗争参与者的斗争方式,也约束了斗争参与者在斗争过程中的言行以及对“好的一面”的遵行。因此,党争的公开性,是“阳光政治”的必备前提。

如果说公开进行的党争,是政党和政党斗争参与者须以“好的一面”来彼此竞争的话,那么,不公开的党争,暗中进行的党争,则几乎肯定是斗争者彼此“比坏”的竞争。在不示人的党争中,谁的想法离奇、出格,谁的招数阴毒、无常,谁最无视政治规则,谁最蔑视人类道德,谁就最可能是这种肮脏龌龊斗争的胜利一方。

18世纪以前,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由于媒体传播的有限性,美国党争的许多方面存有大量公开性难以触及的阴暗角落。党内大佬对政党资源的把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限性,都是产生政治腐败的“溃疡部位”。在当代,传播技术手段

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进步,使得既有宪政框架下的公开性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在如此传播条件下,参与党争和准备参与党争的人,最先放弃或不得不放弃的,恐怕就是自己及自己家人的隐私权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公开性之于党争,无异是为党争参与者在“洁净度”方面进行的“资格”审查。人品、政品有“污点”的人,并非绝对不可以参与党争,但必须经得起公开性的反复“查验”。

民主框架下的党争

美国的党争,是在民主框架下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政党之间通过彼此反对来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政党合法活动的一部分。在党争中,执政党以保住权力为斗争目的,在野党则以“颠覆”执政党手中的国家权力为斗争目标。即使是党内的斗争,也是以执掌国家权力为最终指向。

“反对合法化”是美国政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此,“反对合法化”既是多党存在的前提,也是政党存在的目的。民主制度下党争的实质,是不同利益的合法表达和竞争,是给予不同利益主张的“试错”机会。但是,这种“反对”却不是无原则的。“反对”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主张,一种动员。而且,“反对”者所反对别人、别党的地方,其表现必须与被反对者相反或相对立,必须如自己所主张的那样。这样,“反对”的根据才能够成立,“反对”的理由才令人信服。如果攻讦别人那么干,自己也那么干,这种“反对”在公开的政治活动中,无疑是自取其辱的方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政党也是通过对立党派的合法反对,而保持党的凝聚力和“纯洁性”的。

反对党的存在,促使各政党内部要不断地“自清门户”,而所谓“自清门户”的办法及其根据,也同样是党内的“反对合法化”。不论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相互“反对”,还是政党内部不同代



托马斯·杰弗逊

表人物之间的相互“反对”,“反对”的有效性就在于反对者是否遵循了“欲正人,先正己”的原则,是否在“反对”与主张的问题上言行一致。

从美国党争的历史看,“反对合法化”机制的存在,用当下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话说,不啻是一个不用动用国家财政成本的“纪律检查”机制。这个机制,在对立政党彼此盯住对方的缺欠、瑕疵方面,不仅不用国家财政成本,而且还动力十足,从不懈怠,很少失职,甚至还往往无事生非,没事找事,“鸡蛋里面挑骨头”,更不用说紧紧盯住对方那些“见光死”的部位了。

事实上,美国党争所导致的相互“盯梢”机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纠错机制。在美国历史上,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不检点乃至涉嫌犯罪之举,常常首先由对立政党发现线索,而后才导致国家司法介入。这样的“发现—处理”机制,也在相当程度上节省了国家财政的支出成本。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其“拉链门”的来龙去脉,就印证了这一过程。而在此事件上“扒粪”最力者——来自共和党的时任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后来也因婚外与其他女子有染,而反过来被民主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国会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后,只能辞官还乡。直到10年之后,在自认为洗净污垢之后,方才出马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此,公开进行的美国党争,成了政党政治清洁机制最有效率的部分,也成了美国公众明晰政治是非,通晓政治常识,判定党争胜负的过程。尤其是在党争的过程中,除了在总统、国会议员竞选等与国家政治活动相关的政党活动,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少许补贴外,其他一切政党活动经费,都与国家财政没有任何关联。尽管在某些时候,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的党争,其实有利于整个国家政治的清明,并且也确实与国家利益有关,但是,只要是政党的活动,就不能染指国

家财政的原则仍不能触碰。

国家民主与党内民主

美国政党的发展历史,在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美国是先有国家和政府,而后才有政党;先有国家民主制度,而后才有民主制度下的政党。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是代议制度的一部分。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政党的性质也不例外。所以,美国的党争,实际上是美国民主的体现。政党与政党的斗争,是国家民主的体现;政党内部不同代表之间的斗争,是党内民主的体现。

不同政党的存在,就是对不同利益的承认。政党内不同代表的存在,就是对更细分的不同利益的承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国者们曾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利益之争会分裂国家、分裂人民、也分裂政党,从而“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但是,也许是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使然,这些立国者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怕”而回避政党政治的现实,也没有因担心而回避党争的现实,而是在国家制度设计上最大限度地“渠化”党争。曾经说过“如果不参加某个政党就不能进天国的话,那我宁愿不去天国”的杰弗逊,后来不仅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也成了美国最成功的政党领袖。

所谓党争的“渠化”,就是以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规范政党的发展,以宪政制度约束政党的活动,把党争限制在不损害国家民主制度的范围之内。从宪政制度上讲,公民个人自由,结社自由,都从各个方面防止了政党或党争控制一切国家政治活动的弊端。在美国,从工会到各种各样的行业组织,从各种权利促进保护组织到公民自愿组成的慈善组织,都是政党在党争中所极力争取的组织,都是政党所要极力要为之代言的组织。由于人手一票的平等性,多如牛毛的各式组织,从方方面面约束了政党利益表达的范围,限制了党争的随意性,并通过党争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最终形成。

美国的党争也从另一个侧面为人们展现了国家民主与党内民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政党的集团属性,以及保持效率以在党争中获胜的压

力,都使政党存在集中权力的自然倾向。但是,在美国,政党组织的松散性,从根本上制约了政党活跃分子在政党内部形成“独裁”的可能,而受国家宪政制度保护的“选票跟着利益走”的“组党”方式,也限制了少数人操纵政党、瓜分政党利益的操作空间。上世纪70年代卡特赢得民主党内预选,并进而最终赢得总统选举,就是拜普通“党员”所赐和中间选票所赐。同样,从好莱坞演员工会主席开始从政的里根,也正是凭借非核心党员的力量,险些掀翻在共和党内树大根深的福特。

这种现象说明,国家民主制度,是逼迫政党在党内实行民主的最大压力。并且,在国家民主制度的框架内,一个政党,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论民主程度如何,都可以参政,都可以参与党争,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政党利益表达机制的民主程度,与国家民主程度有所差异的话,那么,这个政党就等于自动在党争中败下阵来。在国家民主制度下,一个参与党争的政党,不民主,即失败。因为民主的利益表达方式,一定胜过独裁的利益表达方式,这不仅是实行民主的信念,也是人们基于人性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落实在选举上,就决定了党争的胜负。

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如果没有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约束,所谓政党的“党内民主”也一样不复存在。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民主化的国家体制中,既有可能存在党内也实现民主制度的政党,也有可能存在党内不实行民主制度的政党,但是,还找不出在非民主化的国家制度内,存在(执政)党内实行民主制度政党的例子。民主制度可以容纳不民主型的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只要参政,就必须使党内的规则“接轨”国家民主的规则,否则就不能参加民主的“游戏”。

公开,合法反对,民主,是美国党争拳击场的三条围绳。这个拳击场,可能不乏齜齜之处,但是,(在野)政党的存在,却是制约政府权力的必要前提。党争,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替公民监督政府、监督执政党的工具,在“围绳”圈定的范围内,其正面作用远远大于其负面作用。在现代国家,人们正是从党争中,看出和悟出了政治的门道。■

(责任编辑 黄 钟)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2年第2期孙旭培《新闻立法的历程和思考》一文,写得很好,作者见解,发人深思。但美中不足,有一处说到“1986年11月,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拿出过《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与新闻法研究室和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两个《新闻法》文稿并称为“三个新闻法草案”,与史实有出入。1986年上海并无新闻法起草组。孙氏所提到的“规定”,是当年胡启立到上海提议上海先搞一个有关新闻工作的地方法规,市委宣传部布置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起草,完成后提交上海市政府法制处,后来以配套法律法规尚未具备为由,未列入议程。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成立于1987年,是按当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新闻法起草组组长王强华要求建立的“影子小组”,独立起草一个新闻法文稿提供给王强华领导的起草组作参考。这个小组于1988年7月起草了“新闻法征求意见稿”,呈交新闻出版署。所以上海有两个文稿,前一个文稿是按地方法规程序走的,后一个文稿是给国家起草组提供参考的,所谓“三个新闻法草案”,应该是北京的两个和上海的后一个文稿。孙氏文章是回顾历史,所以希望在贵刊作一补正,以求全貌。

读者 魏永征

我理解的中国人民或中国站起来了

贵刊2011年第11期发表胡新民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站起来》一文(下称“胡文”),驳斥了茅于軾先生《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下称“茅文”)中的“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的观点”,他认为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在人民的主体被‘抛弃’的时代,恐怕不能说他们站起来了”。“胡文”尽管说他只是引用了“在中外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两本台湾和美国华裔学者的权威之作,以及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的有关内容和资料,但是“胡

文”一开始就已经明确地表示了“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可以认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并没有站起来,就是胡新民先生的观点。

在中国现在来争论国家、政权、政党、公民、人民之间的关系,大概是最为无聊的事了。“茅文”说的是“人民”,“胡文”标题是“中国”,我们也只能姑且认为是一码事了。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茅文”所说的中国人民显然只能在毛泽东宣布“站起来”以后才能站起来,抗战胜利后应该继续趴着才是。站起来的只能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政人员。1949年新政协会议后,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但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地富反坏右,邪教会道门,应该都被打趴下了。至于“胡文”引用的徐中约说的“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恰恰……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地发挥”,用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证明只是毛泽东时代才让他们站起来的,显然有把宣传当真理的倾向。徐中约先生的所谓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天才和没有“被抛弃的主体”地位,莫非就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来动员参军和国民政府打内战,然后,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压榨农民,为工业化和备战以及政治运动提供积累?从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农业户口,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农业学大寨,没有一样是可以看作农民站起来的标志。如果按照胡新民先生的这个标准,绝大多数的农民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不仅是抗战胜利后站起来与否的问题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也还是没有站起来。

至于中国是否站起来的问题应该相对简单,那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主权是否独立。按照这个标准,茅于軾先生的抗战胜利后站起来的说法没有错。至于用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说事,我想只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对比,就可以得出哪个政府站得腰更直了。国民政府宣称“一边倒”了吗?没有。中苏两国之间定有友好条约,苏联使馆是最后一个(从广州)撤走的。杜聿明因为不服从史迪威命令遭到美国政府谴责或蒋介石贬斥,打成右派、反党分子了吗,没有。国民政府没有收复列宁口头答应归还的不平等

条约失地,有内忧外患的客观原因,“老大哥”让我们收复了吗?还是没有。 读者 平乃彬

也谈中国人什么时候站起来

以笔者浅见,国民是否站起来关键是看国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如何。特别是政治权利,即使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个体最起码能够依靠国家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于经济权利,每个个体要有自由之身和能够自主支配的私产,不因经济上无法独立而受制于人。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谁都别想真正地站起来。国民的站起来,不是哪个重要人物喊几句口号就能完成的。

另外,国民是否站起来和国家是否站起来是有区别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秦灭六国厉害吧?秦国站起来了,秦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元朝厉害吧,但元朝中的汉人站起来了吗?国家站起来,国民跪下去是非常可怕的情形。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日本人告别了军国主义,建立了更加成熟的君主立宪制度,只用了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帝国倒下去,日本人民站起来,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无论是国民的站起来还是国家的站起来,都需要一个过程,有谁从娘胎里就能一下子站起来?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巨变。民国时期,逐渐实行了民主选举,私人可以办刊办报,有了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平等自由的观念开始被国民所接受,私有财产也受到保护,国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比以往有了质的飞跃。从满清末年的改良到民国建立,中国人其实正在慢慢地站起来,尽管站立的还不是很稳当,毕竟在朝好的方面发展。

胡新民先生说中国的抗战胜利“主要是当时国际上强权政治交易下产生的副产品,也更是被美国作为战略棋子摆弄的成果之一……”说中国“这种靠强国,主要是美国双手扶持的站立,一松手就会跌到……”。胡新民先生引用郭廷以、徐中约的有关论述,依照某些人在某个时期的某些说法、某些做法,说“没有美国这个棋手的动子,中国这颗棋子想要自主动弹一下也是难之又难

的事情,又怎么能独自站起来呢?”

胡新民等人的这些观点及论证办法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

首先,胡新民等人混淆了互惠合作与任人摆布的区别。民国政府在当时情况下其实面临多种选择,并不是非要与美英苏等国合作不可,汪精卫就是例子。民国政府和美英苏等国合作明显属于各取所需,绝不是任人摆布。如果胡新民等人非要说民国政府是美国的“棋子”,那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算什么?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算什么?苏俄的援助就是援助,美国的援助就是别有用心,这是什么逻辑?

其次,胡新民先生把“站立”理解为“独自站立”有违常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站立,互相帮助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特点。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人不依靠父母,不依靠亲友的帮助,能独自站立起来吗?一个没有道义的国家能长久站立吗?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站立当然主要靠自己,但不能因此而拒绝帮助。不知道胡新民先生所强调的“独自站立”是一种什么情形?

再次,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分歧,有争吵,说些过头话,甚至不欢而散,互相贬低很正常,结果比过程更重要。如果几句话就让一个人一个国家失态甚至崩溃,那么这个人这个国家是不成熟,是虚弱的。个别说法并不代表全部,即便是美国总统的某些说法也未必就代表整个美国。

徐中约说:“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恰恰就是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胡新民先生据此认为:人民的主体(农民)被抛弃的时代,不能说中国人站起来了。

农民问题的确是中国的大问题,但毛泽东建国后搞的各种运动非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还让农民的处境更加悲惨。把一个文盲农民抬高到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并不能真正改变全体农民的命运,更谈不上站起来。

读者 赵平江

四月是清明，出书祭先贤！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 自传编写很容易：

清理书信和日记、翻检照片与影集、写出感悟和经历…

📖 家史百年最相宜：

走亲访友问家史、编写百年大事记、苦难辉煌重点写…

📖 自己不写帮您写：

身手不适勿用急、上门服务必须的、您口述我来代笔…

📖 音像制作也可以：

个人拍摄人生录、家庭制作家族史、精神形象传百世…



出版著作
传承文化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892 0399 6252 5116

编印单位：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100080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 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4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 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 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 010-58608409 投稿邮箱: 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吴忠谈抓“四人帮”

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

寻找张国焘墓地

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美国的党争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